

# 炎黄春秋

第 **5** 期  
2008 年

**朱厚泽：提倡宽容的文化精神**

**红卫兵运动兴起亲历记**

**笔谈“两会”：推进民主是第一要务**

**王若水在人道主义与异化争论中**

**裴多菲俱乐部真相**

## 目 录

一家言	
1	中国需要提倡宽容的文化精神……………朱厚泽
3	改革把“工具”重新变成“人”……………冯东书
往事录	
4	“迎丰公社反革命事件”始末……………戴安林
10	毛泽东号召“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阎长贵
14	李政道同江青的一次辩论……………施宝华
群言堂	
19	推进民主是第一要务——专家学者笔谈“两会”
	彭迪 袁鹰 杜导正 资中筠 何方 杜光 冯健 高放 钟沛璋 辛子陵 章立凡
亲历记	
31	红卫兵运动兴起亲历记……………刘晋
35	山西分社“清查”厄运追记……………马明
37	我知道的翼社和中国托派……………汪文郁
怀人篇	
42	夏明翰就义八十周年祭……………汤益民
45	王若水在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争论中……………张显扬
49	杨立三的经济实践与经济思想……………李琴
沉思录	
54	解决三峡工程遗留问题还任重道远……………鲁家果
访谈录	
58	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的大饥荒……………任彦芳
忏悔录	
64	我打谷志有……………王克明
海外事	
68	列宁时期党内民主是如何被破坏的……………尹彦
73	裴多菲俱乐部真相……………侯凤菁
编读窗	
79	读者来信摘登(五则)……………马国征等

顾问: 杜润生 李昌 于光远 李锐  
编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俊义 方实 冯征 冯健  
冯其庸 曲润海 朱厚泽 李普  
李一鑫 李冰封 李维民 杨继绳  
杨天石 吴象 宋木文 苏双碧  
张岂之 张文彬 张荣华 何方  
杜导正(召集人) 范敬宜 金冲及  
钟沛璋 徐孔(副召集人) 袁鹰  
凌云 萧蔚彬 曾彦修 彭迪  
韩钢 雷颐 魏久明  
社长(法定代表人): 杜导正  
副社长: 徐孔 杨继绳  
常务社长、总编辑: 吴思  
执行主编: 李晨 徐庆全  
社长助理兼编辑室主任: 赵友慈  
社长助理兼办公室主任: 胡竞成  
理事长: 杜导正  
副理事长: 莊其環 李琼  
理事: 白建钢  
秘书长: 徐孔  
副秘书长: 杜明明  
主管、主办单位: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本刊常年法律顾问:  
张思之 (吴奕赵阁律师事务所 010-68083211)  
步凌云 (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 010-85869163)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国外发行代号: 1274M  
国内总发行: 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订购处: 全国各地邮局(所)  
网络电子版全球总代理: 龙源期刊网  
网址: www.qikan.com  
印刷: 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编: 100045  
本刊电子信箱: yanhcq@sina.com  
电话: 发行部: 010—68532048  
编辑室: 010—68534879 68523512  
办公室: 010—68522852  
传真: 010—68532569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0296号  
出版日期: 每月4日  
定价: 5.80元

# 中国需要提倡宽容的文化精神

朱厚泽

1985年我从贵州到北京，在中宣部工作，有半年吧，我没有敢讲话。耀邦同志问过我：来后有什么反映？我说：听到的就是（这个人）不见动静。他说：是吗？逐步放开一点嘛。

那半年，我到处与学术界、文化界、新闻界的同志们接触，认识人，交朋友，了解情况，听取意见，也听到一些尖锐的争论和一些反复多年的争吵……

这样，在我的头脑中逐步形成了一个看法，就是：要树立一种比较宽容的文化精神，建构一种协调融洽的人际关系，形成一种宽松和谐的文化氛围和社会政治环境。不然，人们相互之间，或怒目相视，圆眼睁睁，或疑虑重重，坐卧不宁，或左顾右盼，不知所云……那日子怎么办？怎么能互相对话，切磋琢磨，相互理解，互相信赖……那就更不要去谈什么社会的“长治久安”了。

到1986年了，我开始讲了点话。就像我们今天这种小座谈会样，即席发言，随便讲点，交换意见。在上海看望电影创作会的朋友，讲一点；在天津约见几位作家，主要请他们谈，也讲一点。大概是3月8号，听说中国音乐家协会的全国理事会在万寿路开会，我约了文联、团中央和文化部的同志一起去看望他们，在中组部的餐厅里见面，他们让我说，我也讲了一点。后来见出版界、发行界，什么报纸的记者会，……也都讲一点。因为都是即席发言，个人随便讲，属于征求意见的性质，我都不叫大报发表，连地方新华分社的内参稿我也扣下了没有让发。只有全国文联的《文艺报》和三联的《读书》登过两篇要点。

在各省市委宣传部长座谈会时，参会同志们的讲话与材料，我们只作为参阅材料，而不发会议文件，把摘要记录发给省市委的宣传部长们，继续征求意见嘛。

但是不久就听说有一位领导人在地方批评指责。那时领导人到地方视察工作，地方都有记录上报。我们收到记录看，又没有指责内容。而且我们还是几乎每周都见面的，也从没有向我说过。可是以后越传越多，越传越神，不知是怎么回事。

以后，文化部开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约我去听座谈发言。高占祥同志让我讲点意见，我就联系文化厅局长们座谈中提的问题，正面重申并进一步阐述了我上半年讲过的对文化问题的那些意见。

当时我说：

今年（1986年）是“双百”方针提出三十周年；“五一六”通知发布二十周年；“文革”结束十周年。把这三者叠加在一起，好像有点荒唐，但实际生活确实是这样的，我们的路就是这样走过来的。这使我们看到，生活不像长安街一样笔直，它是曲折的。而这个曲折道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信心，就是真理终究会战胜谬误，人们终究会从具有某种盲目性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即经过实践和反思，走向自觉，达到更加成熟。

我着重地说：

文化要发展，各行各业要发展，推而广之，要使一个社会充满生机、充满活力，有一件事情恐怕值得引起我们注意，就是：对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看法，与传统的东西有差异的观点，不要急急慌慌做结论；同时，对积极的探索、开拓和创新，要加以支持。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不注意，恐怕不仅是思想文化的发展，其他方面要发展也是难以想象的。

有篇文章，讲到宽厚、宽容和宽松。三个“宽”字，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对于我们原来的想法不太一致的思想观点，是不是可以采取宽容一点的态度；对待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是不是可以宽厚一点；整个空气、环境是不是可以搞得宽松、有弹性

一点。

完全刚性的东西是比较容易断裂的，它不能抗冲击。而社会生活中的冲击随时都会有，会从各个方面来。介质一点弹性、柔性，不但有利于发展，也有利抗“冲击”。多少带一点弹性、柔性，这对于处理我们的思想文化问题，经济政治问题，小至家庭、夫妻、父子、母女，大至国家大事、民族关系，都会好一点。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是可以把握得更妥善一些。

这些话说了以后，发生过一些什么事情，许多人都清楚，我今天不说了。

从说这些话到现在，又是二十二年过去，我早已经年老离休了。

今天，年轻同志们又在这里开会，讨论创建中

国新文化。你们再让我说，我说什么呢？

如果允许用简单的语言表达，我仍然感到：

我们的古老民族，我们的现实社会，我们的当今时代，需要建设一种宽容的精神文化。或者说需要一种宽容的文化精神。

只有宽容的文化精神，才能容许并激励文化艺术的繁荣、思想学术的探索、科学的发现、技术的革新、经济的发展、制度的创新。并使人权得到尊重，人性得到发扬，人格得到提升。从而在人类祖先长期进化的基础上脱离野蛮，一步一步地穿越蒙昧，朝向永无止境的文明。

(2007-11-03 即席发言录音稿，摘录重整)

(本文作者系中共中央宣传部原部长)

(责任编辑 杨继绳)

(上接第3页)走，给人家干去！”意思是给干部们干去。他们在阶级斗争的压力下，不游行，不示威，不吭气，但是他们有自己的一手，出工不出力，人没到齐，大家都在地头站着、坐着、等着。干部不去，大家就提前在地头晒太阳或歇凉休息。

过去有个很天真的想法，以为全国都按统一指挥去干，生产不就搞好了吗？其实不然。你越不尊重人，想通过阶级斗争，用强制的办法统一大家的行动，最后是只有形式上的统一，千百万群众自有办法对付你。

早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全国着实宣传了一阵让人当驯服工具的道理，不仅农民当劳动工具，工人、干部，包括领导干部都要自觉当工具。就是叫你干啥，你就好好干啥，不要胡思乱想。当时有些人不理解，不服劲，认为工具就是工具，人就是人，人是创造工具，人有自主意识，有人格的，怎么说成是工具呢？都是工具了，谁是使用工具的人呢？那时还扎扎实实作了一阵“思想工作”。好在那时任何人都没有自由择业的权利，自己端不住自己的饭碗，再加上思想上的批判，不服也得服，大家也就“想通”了。

农民不想当简单的劳动工具，他们可是厉害得很。一个农民的力量是十分有限的，全国几亿农民的合力就不得了。他们是全国人民的衣食父母。他们放出自己的“原子弹”——磨洋工，软磨硬泡，搞得全国生产上不去，结果是粮也紧张，油也紧张，肉也紧张，菜也紧张，搞得全国人民的肚皮受不住了。毛泽东有一句名言：“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一下子，是农民教育了我们共产党。这种紧张现象时间长了，党内的有识之士就

看出来，再按极左那一套搞下去，实在是不行了，只好被迫改革。改革都是被迫的，被人民群众所迫。舒舒服服过得好好的，要改革干什么？农村改革的核心，就是尊重农民意愿，把土地分到户，联产承包，让农民有自主经营的权利，让农民自己为自己生产，让农民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农民也可以经商办企业。农民觉得饭碗端在自己手里，这才感觉自己当了主人。这一下，我们才真正找到了发展生产力的关键。农民成了自己的主人以后，干劲大得不得了，个个都活了起来，磨不推自转，不仅两只手解放了，几亿人的脑子也转动起来了。他们的创造性发挥出来了。北方过去一亩地打400斤小麦就很不错了，现在在普通的地方也要打七八百斤，好的地要打一二千斤。他们养虾也会了，养鳖也会了，养蟹也会了。马上，全国的粮也多了，肉也多了，水产也多了，油也多了，菜也多了，果也多了，以至多得卖不出去，没库房放了。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时，中国大地上有两句话：“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改革以后，又有两句话：“极左路线把人变成工具，改革把工具重新变成人。”

极左路线把人变成工具以后，在改革开放中可暴露了极大的副作用。改革了，开放了，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了，放手让人自由投入市场去干了，这时有的人痛苦了。原来当了二十年工具，脑子退化了，现在没人指挥，没人开动，他们竟不会自己走路了。

(本文作者系新华社高级记者)

(责任编辑 杜晋)

# 改革把“工具”重新变成“人”

冯东书

有人在八十年代初曾对我说，中国在极左路线年代生产力所以发展慢，主要原因是“人”太少。当时我挺纳闷，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怎么能说生产发展慢的原因是“人”太少呢？他说，“人”是思维的动物，会创造工具，会使用工具，全国只有领袖在那里动脑子，在那里“创造”。从“人”的本义上来说，中国当时不是人太少太少了吗？因此当时的中国是活“工具”多，而“人”太少。一个国家只有个别领袖能动脑子，能发挥“创造性”，社会生产力怎么会发展快？

这话有些尖刻，但细想起来，有点道理。

我们这些跑农村的记者们，在改革以前，千方百计地宣传报道如何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期农民能提高劳动效率，能提高劳动质量，能提高农业产量，解决中国的吃饭、穿衣问题。但是，年复一年，我们的宣传报道总见不到效果，农民就是不好好干，出工不出力，干活不讲质量，种地不种满，不种足，犁地时不犁透，锄地时不锄净草，收获时节，产量本来不高还到处抛撒，不收净。

怎么回事呢？那时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认为这中间的根本问题是阶级斗争的问题，是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是一部分地主、富农和他们的子弟，以及不愿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富裕中农对人民公社不满，在那里作怪。毛泽东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于是大家都以为这下抓住了解决问题的要害了。可是，大家年年、月月、日日抓阶级斗争，抓了好多年，还是不灵，生产仍然上不去，吃饱肚子成了全国的一个最难解决的大问题，简直使人有点悲观了。

改革完全打破了我们过去思想上的枷锁，我们的思想解放了才恍然大悟。原来过去我们搞了二十几年，解决不了吃饭问题，关键的问题是极左路线对“人”的态度不对，在农村就是对农民的态度不对，得罪了农民。在1955年到1956年办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期，强制全国农民“自愿”入社，1958年又强制农民“自愿”

入人民公社。经过这两次强制“自愿”，全国农民就从有自主人格、自主生产、自主经营权利的人，变成了简单劳动工具。当时报纸上没完没了地说他们是人民公社的“主人”，有这个权利，有那个权利。但是他们自己觉得自己除了有听从指挥去劳动的义务以外，没有感觉到自己这个主人有什么权利。

他们要一切行动听指挥：早上去哪里干什么活，上午去哪里干什么活，下午去哪里干什么活，都是分派的。新媳妇想回娘家，队长不让，自己走了，回来要挨批判，说这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有时检讨了还要扣工分。小伙子没准假，上街办私事去了，回来也要检讨自己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人民公社社员干完活，记多少工分，有的地方还评一评，大多数地方评不了，干部说给谁记多少分就记多少分，经常是干多干少干好干差，记差不多的工分。到收获季节分粮、分油、分菜，干部拿着大权，分多少，吃多少，分什么，吃什么，社员没自由选择权。社员养猪养多了，养羊养多了，是在搞资本主义，要割资本主义尾巴。晚上他让你早睡就早睡，不让早睡就开会。“选举”干部，叫社员选谁就选谁，民主形式都有，民主的权利没有。山西省沁县有一个老县长对我说：“什么民主选举！村里干部都是我们定的。”农业生产是从上一级一级计划下去的，什么作物种多少，什么时候种，怎么种，生产队长也没多少权，作不了主，他也是执行上级计划的工具。原来社员家里还允许保留一小块自留地，“文化大革命”中也收归集体了。这样，农民就只剩下了服从命令去当劳动工具的“权利”了。

中国农民过去最高兴的一段时期，是土改以后，合作化以前，他们认为那是他们最愉快的时期，是黄金时代。因为那时，他们是自己经营在土地改革中分得的土地，有自主经营的权利，劳动产品是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因此干起活来好像不觉得累。现在一下子把他们变成简单的服从命令干活的劳动工具，当时的农民虽然文化不高，但他们毕竟是“人”，他们觉得当劳动工具很憋气，上地的时候互相说：“（下转第2页）”

# 迎丰公社反革命事件始末

戴  
安  
林

四清运动为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创造了条件。在四清运动中，湖南是表现最积极的、也是开展运动最早、时间最长的一个省份，特别是运动期间在益阳县发生的“迎丰公社反革命事件”，对全省四清运动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波及全国。为此，本文试对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作一番述评。

## 一、背景

1963年5月2日至12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了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讨论四清运动。会议期间，毛泽东高度评价湖南省前一段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向与会者推荐中共湖南省委写的《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第二次报告》、《关于树立贫农优势和建立贫农、下中农代表小组问题的报告》和宁乡县花明楼公社党委写的《花明楼公社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文件。毛泽东赞扬说：“这几个文件很好，看到了问题，抓起了工作，正确地解决了大量的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敌我之间的矛盾，政策和方法都是正确的，因而大大地推动了农业生产，可以作为各省、地、县、社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的光辉的榜样，应当组织干部学习这些文件。”这次会议还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前十条》列举了9种“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的表现，指出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地主、富农，总是企图复辟，打击贫农、下中农，拉拢腐蚀干部，篡夺领导权，进行恢复封建的宗族统治的活动，利用宗教和反动道会门欺骗群众等等，“有些社、队的领导权，实际上落在他们手里，其它机关的有些环节，也有他们的代理人”；反动分子的各种破坏活动（破坏公共财产，盗窃情报，甚至杀人放火）多处发现；在商业上投机倒把的活动很严重，有些地方这种活动很猖狂；雇工剥削、放高利贷、买卖土地的现象也发生了；“在机关中和集体经济中出现了一批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同地主富农分子勾结一起，为非作歹。这些分子是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一部分，或者是他们的同盟军”。《前十条》引用中共湖南省委一个报告中的话：“政治上和平共处，组织上稀里糊涂，经济上马马虎虎，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进而得出结论说：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阶级斗争，进行两条道路的斗争，这是决定我们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根本问题”。《前十条》强调“依靠贫农、下中农，是党要长期实行的阶级路线”，并且“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一直到进入共产主义以前”都如此，强调要“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狂进攻”。《前十条》规定“团结95%以上的群众，团结95%以上的干部”，以教育为主，以惩办为辅，实行“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的方针。规定干部要认真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因为“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来说，是带根本性的一件大事”，认为不这样，“势必出修正主义”。《前十条》还特别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

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多少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5月22日至6月5日，中共湖南省委召开了三级干部会议，学习讨论《前十条》。会议对全省的阶级斗争形势作了不切实际、过分夸大的估计，并决定按照《前十条》部署开展四清运动，先进行试点，取得经验，然后全面展开。



“四清”中批斗地主富农

## 二、酝酿

按照中共中央《前十条》的精神，1963年8月，中共益阳地委组建四清运动工作队，抽调地委、行署各系统干部400余人进行集体学习，要求工作队队员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前十条》的精神，到益阳县迎丰公社开展四清运动。

迎丰人民公社地处资水北岸，距益阳县城15公里，位于沅江、益阳、汉寿三县交界之处，公社管辖20个生产大队，224个生产队，4658户，20254人，全公社一共有干部1072人，党员307人。

8月30日，以地委书记为队长，地委办公室主任为副队长的四清工作队进驻迎丰公社，益阳县委也派出政府办主任带领20名干部协助工作队开展工作。四清工作队一到迎丰公社，立即组织干部群众学习《前十条》，成立贫协组织，层层清理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帐目、仓库、财务、工分。工作队清理的结果，认定100%的公社干部、94%的大队干部、86%的生产队干部有经济问题。被干部利用职权，多吃多占，贪污的粮食有181611公斤，现金有75369元，另外还有一批实物票证等。被认定有严重问题，是阶级异己分子

和蜕化变质分子的干部有394人，占干部总数的23.7%。被认定有严重问题，是阶级异己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的党员一共有135人，占党员总数的44%。

工作队完全凌驾于公社党委、大队党支部之上，一杆子插到底，访贫问苦，扎根串联，成立了贫协小组、贫协会组织。然后，工作队利用贫协组织对公社、大队和生产队干部的工作进行协助和加强监督，发动群众开干部的批斗会、算帐会。工作队运用土改对待地主的办法来对待干部，开展所谓对敌斗争，严重混淆了敌我和人民内部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工作队还利用贫协组织作为打击干部的工具，而有些贫协组织成员的思想素质极低，揭发出来干部的许多所谓“问题”，往往无不纠缠着个人的历史恩怨、意气 and 成见，甚至还有弄虚作假，夸大事实，无中生有，捕风捉影的，但却被工作队上纲上线，一律以阶级斗争问题来对待处理。造成了基层干部和群众、工作队、贫协组织的尖锐对立。这种对立情绪的积累和加深，就孕育形成了后来的“迎丰公社反革命事件”。

至同年11月30日工作队撤离，整个运动历

时了3个月。在运动中被行政开除的干部有15人,受到其它各种行政处分的有3人;被开除党籍的有46人,留党察看的有7人,撤销职务的有14人,受到其它党纪处分的有1人。受到党纪处分的党员占党员总数的22%。

工作队离开后,在运动中积聚起来的矛盾开始激化,有些被整过的干部对贫协组织进行报复,实行“反清算”。这进一步加剧了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对立,为“迎丰公社反革命事件”的发生埋下了伏笔。

1964年1月,中共益阳县委召开县委扩大会议,部署全县学习中共中央的《双十条》。根据县委扩大会议的精神,迎丰公社于2月19日至20日召开了三级干部会议的预备会,公社党委书记匡爱国传达了县委指示,会上,公社党委委员黄月藻为他在前一段四清运动中挨过整的问题发了一通“牢骚”,许多有过同样遭遇的大队支部书记在会上也出“怨气”。匡爱国批评他们说,有意见、有怨气,只能讲到今天为止,明天在大会上不要说了。

2月21日至26日,连日大雪纷飞,地冻天寒,迎丰公社三级干部会议召开。参加人员有公社三级干部、全体党员和在四清运动中建立起来的贫协会负责人一共有360人。会议的主题是:进一步学好中共中央《双十条》,巩固四清运动成果,掀起春耕生产高潮。会议由匡爱国主持。这次会议是在传统的春节期间召开的。由于前一段搞运动留下的后遗症,会议开始时普遍存在着几种思想状况:一是厌烦。听说这次会议是学习中共中央的《双十条》,大部分人感到厌烦。二是盲目乐观。有的人认为通过运动,已经一劳永逸地把一切问题解决了,可以高枕无忧了。三是有怨气。少数干部对工作队在四清运动中的所作所为有意见,满腹牢骚。四是对会议有误解。一些干部怕又要“洗澡”,放“包袱”,故意躲避。例如:柏荫村大队烟墨塘生产队队长龚雪枚,听说公社要开会,就躲到岳母家里。他说:“去年开会搞四清,这次开会恐怕会搞八清,当家三年狗都嫌,从今后我不当队长了,任你九清十清。”五是怕困难。一部分党员干部,看到大雪纷飞,天寒地冻,有畏惧情绪,不想来开会。

在会议讨论发言中,一些干部纷纷指出四清

运动中出现的偏差和问题。意见最多的是认为在运动中对干部大搞逼供信,整狠了、过头了、经济退赔多了。有几个生产大队的干部,在讨论中发了一通牢骚,认为干部是运动中挨整的对象,因此,不愿继续当干部了。而参加会议的贫协组织负责人感受到会议的气氛对自己有压力,认为是针对自己来的,抵触情绪也很强烈。讨论中双方形成了严重的对立局面。匡爱国为了完成县委领导交待的任务,达到搞好团结的目的,分别做了干部和贫协负责人的思想工作。24日,匡爱国被县里抽调去李昌港公社进行四清运动,26日的大会总结,由社长张锡祺主持,他在总结报告中说,会议开得很好,会议期间大家的情绪越来越高,思想越来越明,干劲越来越大。

### 三、形成

中共益阳地委和县委了解到在迎丰公社三级干部会议上有一部分干部、党员和群众在思想上对四清运动存在强烈的不满情绪和抵触情绪,于是得出结论,认为迎丰公社的四清运动是不成功的,是一次严重的翻案事件。5月下旬,中共益阳地委、县委联合组成“迎丰事件”专案组,进驻迎丰公社,开展大规模的调查,搜集整理材料。

6月上旬,一位中共湖南省委候补书记来益阳,听取中共益阳地委有关迎丰公社四清运动情况的汇报,汇报中反映迎丰公社四清运动后出现阶级斗争新动向,劳动力外流;赌博、投机倒把现象猖獗;少数干部不挑担子;有些人对四清工作队有意见;个别干部反攻倒算翻案等情况。他认为这一问题十分严重,必须严肃查明处理,并指示把情况报告省委。6月中旬,迎丰公社四清工作队队长赶快写出一份《益阳县迎丰公社社教运动后出现的问题》的调查报告,由地委办公室打印出几份,供领导人参考。一位地委副书记将一份调查报告邮寄中共中央办公厅,一份调查报告于6月12日送到中共湖南省委。7月21日,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和一位省委候补书记,路经益阳沙头,中共益阳地委书记和县委书记向两人汇报迎丰公社四清运动后出现的问题,两人当即指示,迎丰公社的问题实际上是对四清运动的反扑,一定要严肃处理。责成地委、县委继续调查。

这时又传来了刘少奇7月“郑州讲话”，说反扑四清的事件要作现行反革命案件处理。这就使迎丰公社发生的事件的政治色彩越来越浓，阶级斗争之弦也越绷越紧。中共湖南省委将刘少奇“郑州讲话”的原文印发给中共益阳地委。地委认真学习领会刘少奇讲话的精神后，派出一名地委监察委副书记和益阳县监察委的干部共同组成地、县联合调查组，到迎丰公社进一步展开调查。他们调查后认为，这是一起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的反扑四清运动的严重事件，并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公社党委书记匡爱国，将他打成是“一个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反扑的典型”。

8月8日，刘少奇偕夫人王光美到长沙，留湘期间，专门听取了中共湖南省委领导关于“迎丰事件”的汇报，并且看了相关的材料。10日晚，刘少奇在接见省委常委时，对“迎丰事件”作了明确具体的指示，认为“迎丰事件”是一起现行反革命事件，是对四清运动的反扑，因此，必须反击。省委第一书记随即对益阳地委书记说，“迎丰事件”是现行反革命事件，刘少奇已经点头，并要求益阳地委书记以地委名义向省委写报告，益阳地委书记当即要求有关部门将报告赶快写出来。8月11日，《中共益阳地委关于处理益阳县迎丰公社以匡爱国为首的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大反扑的反革命事件的决定》和《关于益阳县迎丰公社以公社书记匡爱国为首的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大反扑的反革命事件的调查报告》，送到中共湖南省委。中共益阳县委听取地、县委联合检查组的调查报告后，县委常委会进行了3次讨论研究，写出《中共益阳县委关于迎丰公社党委书记匡爱国反党、反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报告》，送给地委和省委，并且对“迎丰事件”中的当事人作出严厉的处理。

匡爱国：原公社党委书记，是这次反党、反社会主义革命的首要分子，给予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并定罪法办。黄月藻：原公社党委委员，是混入党内的反革命分子，在运动前办了许多坏事，运动中表现不好，运动后又进行了反革命活动，现已开除党籍，开除工作，还应追究刑事责任，定罪法办。张锡祺：原公社党委副书记兼社长，参与

## 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 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  
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

### 通 知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党组，军委总政治部，

中央政治局召集全国工作会议，讨论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并写出了讨论纪要。现在把这个文件发给你们。中央过去发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如有同这个文件抵触的，一律以这个文件

- 1 -

匡爱国、黄月藻的反党活动，支持他们翻案倒算，并且擅自撤换运动中培养组织起来的革命队伍，让坏人重新当道，运动后又搞新的“四不清”，新的男女关系，影响极坏，予以开除党籍，行政上撤销社长职务，工资级别降一级。周建秋：原公社党委委员，公社武装部长，积极主张在三级干部会上大出“怨气”，到处煽风点火，捏造是非，诬蔑工作队，是这次反革命活动的成员之一，予以开除党籍、开除工作。廖长生：原公社党委委员，公社副社长，参与匡爱国、黄月藻的反党活动，支持投机倒把，支持翻案倒算，企图复用运动中清除出去的地主分子，不受理贫农、下中农正当的申诉，品质恶劣，予以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工资级别降一级。廖伏生：原公社党委组织监察委员，对匡爱国、黄月藻等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革命的言行，不但不斗争，不向上级反映情况，反而企图混水摸鱼，为自己的儿子翻案，这次检讨较好，予以撤销公社党委组织监察委员及贫农下中农协会主任的职务。

在中共益阳县委对匡爱国等人作出处理决定的同时，益阳县公安局向被隔离审查的匡爱国、黄月藻签发拘留证。

8月14日，中共益阳地委向省委写出了《关

于益阳县迎丰公社以党委书记匡爱国为首反扑社教运动的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8月15日,中共湖南省委以题为《迎丰公社反革命事件的严重教训》一文,将益阳地委的报告转批全省,并报送中共中央。9月2日,中共中央在《关于转发湖南迎丰公社反革命事件的严重教训和江苏淮阴地委张景良同志在省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两个文件的批示》中指出:益阳县迎丰公社“是进行过社会主义教育试点的公社,在运动中,初步地发动了群众,也解决了一部分问题,是运动搞得较好的地区。但是工作队和地、县委都没有彻底革命的精神或不够坚定,贫下中农和其它农民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运动搞得不深不透,必须处理的干部问题没有完全处理,因此,在工作队离乡后,发生了很大的乱子,留下了很大的后遗症。以公社党委某些负责人为首,纠集那些犯过严重错误的干部及其坏人,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疯狂的反攻,实行倒算,对许多贫下中农和运动中的积极分子进行严重的打击报复,企图摧毁上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成果,并且严重地妨碍和破坏了生产。湖南省委批语说得对:‘益阳迎丰公社所发生的事件,是一个严重的反革命事件’,必须按现行反革命事件来处理”。中共湖南省委的批语指出:“益阳县迎丰公社所发生的事件,是一个严重的反革命事件。这个公社以匡爱国为首的反革命集团,有计划、有组织地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了疯狂的反扑。他们对广大贫下中农和积极分子,进行反攻倒算和打击报复,对党中央和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进行恶毒的诽谤,对工作队大肆谩骂污蔑,他们的反革命活动是经过精心策划的,他们利用所窃夺的公社党委的领导地位,召开一系列的会议,进行组织准备和煽风点火,从而在全公社范围内形成了疯狂的反攻倒算、打击报复的反革命逆流,蜕化变质分子和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出笼,疯狂地向社会主义进攻。省委认为,迎丰公社事件,绝不是什么‘思想认识’问题,也不是什么一般的出‘怨气’的问题,而是一个严重的反革命事件。这一事件告诉我们,迎丰公社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不彻底的,广大群众,特别是广大贫下中农,没有充分地发动起来,敌人没有真正被打倒,蜕化变质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照旧把持着党的领

导权,并且受到他们的根子从上下左右而来的同情和支持。这一事件告诉我们,越是革命不彻底,就越有可能出大乱子,奉劝那些不敢放手发动群众,进行彻底革命的同志们,认真研究迎丰事件的教训,仔细想一想:如果我们不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让大大小小的匡爱国把持我们各级党委的领导权,会搞成一个什么样子?他们把持一个公社,这个公社就改变颜色;他们把持一个县,这个县就改变颜色。由此类推,将会出现多么危险的情景!”省委批准益阳地委对匡爱国的处理意见。在处理以匡爱国为首的反革命集团事件时,应召开全公社的贫下中农代表大会,表明党和政府的立场,给贫下中农撑腰,充分发动贫下中农,团结广大群众,反击反革命势力。为了有力地组织反击,建议益阳地委派出强的工作队,到迎丰公社重新发动群众,整顿干部队伍。在充分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对于公社和基层干部中有反攻倒算、打击报复行为的人,作深入地具体分析,实事求是地重新处理;对于支持他们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根子,一定要追查清楚,作出处理。”

由于“迎丰事件”已被中共湖南省委和中共中央定性为现行反革命案件,中共益阳地委和县委同意将匡爱国等人逮捕法办。9月10日,匡爱国、黄月藻二人被捕入狱。

## 四、扩大

为了彻底搞清楚“迎丰反革命事件”,中共湖南省委派遣一位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率省委调查组来到益阳,并且指示中共益阳地委将以前参加迎丰公社四清运动工作队的干部抽回来再搞一次运动,对迎丰公社“反扑”四清运动的反革命事件进行全面“反击”。

9月12日,以省委组织部副部长为队长、地委副书记为副队长的四清运动工作队一共有510人,浩浩荡荡再次进驻迎丰公社,开展声势浩大的“反击”。工作队广泛搜集迎丰公社三级干部“反扑”四清运动的“罪证”,对所有干部采取既进行背靠背的酝酿,又展开面对面的揭发批判,在调查取证时,采取高压政策,实行跟踪看管,搞逼供信。

10月13日,新组成的迎丰公社党委会在驻社四清运动工作队包办授意下,向中共益阳县委递交了《关于对迎丰反革命事件有关人员的处理问题的请示报告》,当天,中共益阳县委向益阳地委呈送了《关于对迎丰反革命事件中公社有关人员的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10月14日,益阳地委向县委发出《关于对迎丰反革命事件有关人员的处理批复》,对有关人员重新加重了处罚。原公社党委副书记、社长张锡祺,是以匡爱国为首的反革命集团的重要成员,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建议法办。原公社党委委员、武装部长周建秋,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建议法办。原公社党委委员、副社长廖长生,开除党籍,行政开除留用察看,降低工资,下放劳动。原公社党委组织监察委员、贫协主任廖伏生,撤销贫协主任,留党察看两年,下放劳动。

11月20日,益阳县人民法院在迎丰公社公开审理“以匡爱国为首的现行反革命集团反扑报复案”,认定匡爱国为反革命集团首犯,判处有期徒刑7年;认定黄月藻为反革命犯,是混入党内的坏分子,两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10年;认定张锡祺为反革命集团要犯,定为反革命分子,判处管制3年,交公社执行;认定周建秋为反革命分子,交群众监督生产。

省、地、县委四清运动工作队从1964年9月重新进驻迎丰公社进行“反击”,到11月底,历时两个月,12月初进入复查,一直到1965年4月

底,又历经半年之久,才“得胜回朝”。经过复查“反击”所获“战果”如下:

彻底铲除了匡爱国、黄月藻、张锡祺、周建秋等“反革命集团”,全公社三级干部清查利用职权贪污多吃多占的粮食有316570斤,人民币有118666元。除公社一级干部全部定罪法办和查办外,146个大队干部中,问题很多和性质严重的有80人,占55%;1213名生产队干部中,问题很多和性质严重的有267人,占22%。在大队,生产队的干部中,有3人被定为阶级异己分子,64人被定为蜕化变质分子。在“反击”中,全公社1072名干部党员,受处分的有70人,其中法办23人,党纪处分31人,行政处分13人,团纪处分3人。

为了进一步扩大“反击”战果,省、地、县委还成立了“追根组”,对于凡是在1963年迎丰公社四清运动后,去过迎丰的各级干部(大约100余人),一律进行追查,写出交待材料。其中的一些人在捕风捉影、上下株连中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处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拨乱反正中,根据“有错必纠”和实事求是的原则,中共益阳县委和地委于1979年2月,公开为“迎丰公社反革命事件”彻底平反,凡是因这一事件受到牵连的人员一律恢复名誉。

(本文作者是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湖南行政学院教授)

(上接第36页)的问题,没有取得效果。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在中央领导同志打招呼的情况下,于1978年11月21日方言才被释放出来,恢复了分社领导工作,撤销了省委指定的临时领导小组。

随着中央对山西省委领导的调整,由霍士廉、罗贵波主持省委工作后,根据方言同志向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组织部和中央宣传部提出的申诉意见,进行了复查,省委于1981年2月17日,向党中央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呈报了《为方言同志平反的报告》。《报告》中说:“省委认为,方言同志不属于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对方言同志进行隔离审查、关进看守所,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使身

心上受到了折磨,清查方言是错误的,应予彻底平反。在省委举办的《‘四人帮’及其伸向山西黑手罪证展览》中和在报刊等批判中,强加给方言同志和新华社山西分社的‘四人帮的御用文人’、‘反动文痞’、‘四人帮’控制的新闻单位、‘搞特务活动’和‘为四人帮提供重型炮弹’等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一律推倒,为方言同志和新华社山西分社以及分社被错误清查、受株连的其他同志恢复名誉。”

山西省委采用正本清源的这一措施,为方言同志和山西分社以及分社包括我在内被错误清查、受株连的多位同志,解除了一切诬蔑不实之词,恢复了名誉。

(责任编辑 杜晋)

# 毛泽东号召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

阎长贵

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被总结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理论,按照文化大革命的实际进程,即按照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言、所行,其内容,可概括为:开展全面阶级斗争,进行全面夺权,实行全面专政。这“三个全面”(或曰:“三全”)是文革灾难的思想理论的根源。何谓“全面阶级斗争”?何谓“全面夺权”?何谓“全面专政”?本文先来讨论关于“全面阶级斗争”的问题。

## 毛泽东号召“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

“全面阶级斗争”的概念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 1967 年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中。这篇社论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红旗》杂志副总编辑王力、关锋二人根据毛泽东 1966 年 12 月 26 日生日家宴上的谈话写成的,或者说,这篇社论是传达和宣传毛泽东生日谈话的精神的。被邀参加这次生日家宴的有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江青也在场),而没有林彪、周恩来、陶铸、康生。在这次生日家宴上,毛泽东讲了一大篇话,主要内容有: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新的阶段,苏联(资本主义)复辟了,十月革命的策源地不行了。苏联的教训说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能不能保持住政权,能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新的中心课题。问题出在党内,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阶级斗争没有完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的全面较量,这种较量从夺取政权开始就存在。……中国现代史上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开始,发展到与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相结合,才有结果。这是客观规律。五四运动就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参见《王力反思录》北星出版社 2001 年版下册 693-695 页)吃饭时,毛泽东举杯祝酒:“为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干杯!”(注)就是根据这个精神,元旦社论提出:“1967 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号召“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工人阶级同贫下中农和其他劳动者联合起来,一切劳动者同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联合起来,各族人民联合起来,展开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请看,这就是毛泽东的生日家宴!它简直比一次中央会议还重要。就是在这里毛泽东发出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应该和必须“开展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最高指示!中央文献研究室 2003 年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说:“这样的重大决断,只是由他个人来决定和宣布。(见 1462 页)这确实是毛泽东把自己凌驾于党中央之上的一次突出表演和表现。”

到这时,即到 1966 年 12 月底,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半年多了。在此以前,文化大革命主要在党政机关和文教部门进行,毛泽东所以在这时要提出“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就是要突破这个范围,向城乡更广的领域推开,即“将阶级斗争搞到全国”;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他希望和企求的全国“大乱”,说文雅点,就是所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元旦社论传达毛泽东的声音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定要从机关里、学校里和文化各界里,发展到工矿企业和农村,让毛泽东思想去占领一切阵地。如果运动停留在机关、学校和文化各界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

会半途而废。”

十分显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和领导者毛泽东为了防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半途而废”,毅然决然地自作主张地号召“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

## “开展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矛头指向谁?

“开展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社论的号召,针对性很强。其矛头指向谁?形势表明,明显地指向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和还没有被公开宣布打倒的陶铸;因为到这时刘少奇、邓小平已经作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头面人物被打倒了,林彪虽然是接班人和唯一副主席,但他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社论说:“一切抵制在工矿企业和农村中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论调,都是错误的。”“工矿企业和农村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一切阻挡这个潮流的论调,一切阻挡这个潮流的人,都将被革命群众送到垃圾堆里去。”这两段话,显然不是空穴来风,不是无的放矢。那是指何人?当然是指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有抵触情绪的从上到下的广大的各级领导干部,其领军人物,则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周恩来和陶铸。据社论起草人之一的王力回忆,毛泽东说,“我同陶铸争论的实质就是这个”。(参见《王力反思录》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下册第696-697页)

周恩来和陶铸反对在工矿企业和农村搞文化大革命吗?也不是。但他们认为在工矿企业和农村搞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慎重,要有步骤,要“抓革命、促生产”,千万不能影响和妨碍生产——这是他们最担心的,“民以食为天”,生产搞乱了,经济基础动摇了,七亿人民“喝西北风”?!正是基于这种思想,他们布置和指示谷牧、余秋里召开工业座谈会,搞一个工矿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文件,谷牧、余秋里听取各方面意见,搞的“汇报提纲”(《十五条》)否定和推翻了陈伯达、王力在“安亭事件”后奉命起草的这方面的文件,——用陈伯达批评谷牧的话说:“你们把我们的稿子改得体无完肤”,毛泽东对谷牧等搞的“汇

报提纲”不满意,又叫陈伯达、王力重搞,这就是12月9日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这个文件的下达,使文化大革命正式扩大到全国工交财贸各部门。12月15日,中央又发布《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在1966年12月,毛泽东和中央一方面发布文件决定把文化大革命扩展到工矿企业和农村中去,同时开会批评陶铸,要陶铸检讨,从此陶铸也就靠边站了,其后,不到一个月,陶铸就被江青、陈伯达在群众中点名,公开打倒。这是毛泽东1966年12月26日生日谈话和提出“开展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主要历史背景。

## 毛泽东提出“开展全国全面阶级斗争”不是偶然的,是他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推向极端和绝对

毛泽东在1966年年底提出“全面阶级斗争”的概念不是偶然的,一方面是他发动和进一步扩大文化大革命的需要,同时,也是他长期以来坚持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的极端和绝对化。“全面阶级斗争”的观念,使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思想和阶级斗争理论达到了登峰造极和荒谬绝伦的地步。

多年以来我们有个习惯说法,叫做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按照这种说法,仿佛在八届十中全会以前,毛泽东有一段时间不重视或不提阶级斗争了。事实似不是这样。“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毛泽东头脑里阶级斗争的弦,无疑会有时紧些,有时松些,但从来没有断过。毛泽东说他早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就是从马克思那里拿来四个字:“阶级斗争”。此话不假。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思想、阶级斗争理论,正确地找到了中国积贫积弱的症结,成功地指导了中国革命,取得了政权,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国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毛泽东继续不断地、甚至变本加厉地、并且运用政权的力量进行这样或那样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认定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结果造成了一次又一次的灾难,诸如1957年反右派,1958年的大跃进,一直到持续了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几

近把国民经济推向崩溃的边缘。“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毛泽东，也就是我们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教训很多、很深。这教训之一，概括地讲，1957年前，我们搞了不少阶级斗争扩大化，而从1957年起，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搞的都是主观制造的人为的阶级斗争。关于毛泽东在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对阶级斗争的论述，在《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毛泽东自己有个说法，叫做：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作出“要在全国进行阶级斗争的决定”——而这个决定恰恰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作出的，我觉得，这样说，即“要在全国进行阶级斗争”，可能比“重提阶级斗争”的说法更好些，更符合实际些。

从1957年起，毛泽东多次论述中国的阶级斗争情况，论述他的阶级斗争理论。

1957年6月，毛泽东在公开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1956年9月召开的八大一次会议正确指出：“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建立先进工业国的要求同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要求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仅仅一年的时间，毛泽东在1957年9—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就推翻了这个论断，重新提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整个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

1958年，毛泽东不仅重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又提出了中国现在有“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资产阶级右派、被打倒了的地主买办阶级和其他反动派，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这些都写进了1958年5月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的报告，作为全党的共

识昭示于众。

1959年，毛泽东在错误地批判彭德怀的庐山会议上，指出：“庐山出现的这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一要阶级完全消灭，斗争才会止息。”

1962年，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制定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内容为：“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的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

1963年，毛泽东在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口号。他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认为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提出“任何时候都不可忘记阶级斗争，不可忘记无产阶级专政”。在9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明确地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并被写进了《后十条》，即《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

1964年12月15—28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召开了主要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全国工作会议，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布这次会议讨论纪要：《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二十三条》明确规定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认定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十几年来我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支持这些当权派的，有在下面的地富反坏分子，有在上面的社、区、县、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

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

1966年12月21日，毛泽东同波兰客人杨力谈话时说：“单反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是不够的，还要反对我们党内的修正主义，不然的话，再过多少年，中国的颜色就会变了，到那时候就会晚了。过去做了一些，只是修修补补，没有当作整个阶级斗争去做。”又说：“先从学校的学生和机关的干部作起，再到工厂、农村中去，把工人、农民组织起来。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这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459-1460页）

以上，是文化大革命前和开始后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几段重要论述。可以看到，毛泽东在1966年底提出“全面阶级斗争”的概念是同他以前的阶级斗争的观点一脉相承的，是他以前的阶级斗争观点的继续和发展。毛泽东在提出“全面阶级斗争”的观念后，又提出《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夺权，实际上，是指整个上海的夺权，“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85页）并用这种观点，解释整个文化大革命，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参见《毛泽东传 1949-1976》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85页）

毛泽东在建国后，特别是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完成后的社会主义时期，关于阶级斗争的估计和观点，大体就是这样。在建国后，特别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说在一定时间、一定范围内还存在阶级斗争，是可以的，但毛泽东不这样看，反对这样看。顺便说一句，到现在还有人认为，承认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存在，“实质上是一种变相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参见2007年9月17日170人签名的《对党的十七大的献言书》）按照毛泽东的观点，阶级斗争，不仅党外有，党内也有，更重要的是党内；下层有，上层有，更重要的是上层，特别是中央；农村有，城市有，更重要的是城市；阶级斗争贯穿社会主义整个历

史阶段，包括社会的各个方面。总之，处处都有阶级斗争，时时都要进行阶级斗争，“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就是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观——“全面阶级斗争”观。毛泽东的“全面阶级斗争”观，既违反马克思主义，又不符合中国实际，用它指导行动和运动怎能不制造一个又一个灾难？！

毛泽东提出和号召“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这个最高指示一落实到行动，诉诸狂热的造反群众，也就把文化大革命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全面夺权”的阶段——文化大革命最灾难性的阶段。

注：关锋生前，有一次跟我说：“毛主席当时讲的是：‘为开展全国全面的内战干杯！’我听到后都怔住了，觉得不好理解，在起草《红旗》杂志元旦社论时把‘全面内战’改成了‘全面阶级斗争’。”关锋这个记忆可能是对的。当时在场的戚本禹1967年1月10日在总政话剧团接见部分革命造反者时说：“现在形势一句话，概括地讲，全民的全国的阶级斗争，各个战线，各个地区，用火药味的话来说，就是全面展开内战。”（参见1967年3月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首长讲话》第1本第84页）我认为，这可以看作是关锋记忆的一个佐证。显然，如果毛主席没这样说过，戚本禹是不能也不敢这样讲的。徐景贤在《十年一梦》又提供了一个佐证。他说，1966年12月27日姚文元给他打电话说：“昨天晚上我们中央文革的几个人都到毛主席那里去了，祝贺主席生日，给主席敬酒。……主席和我们碰杯的时候说：祝全国全面内战开始！这一期《红旗》杂志将要根据主席的指示发表元旦社论，你们要很好地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徐景贤问姚文元：“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可不可以在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范围内传达？”姚文元说：“不要开大会，你们先在小范围里吹吹风吧！”接着，徐景贤在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骨干会议上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并提醒与会者思考：“毛主席说的全国全面内战开始了，究竟有什么样的深刻含义？我们应该怎么做？”（参见《十年一梦》，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2月第2版第7-8页）看来毛泽东在生日家宴上确实说了“全国全面内战”。惟当时在场并参加起草《红旗》杂志元旦社论的王力说，我从来没听毛主席这样说过（参见《王力反思录》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下册第696页）。

（本文作者系中央办公厅干部，曾任江青秘书）  
（责任编辑 杨继绳）

# 李政道同江青的一次辩论

施宝华

## 发现·忧虑·建议

1972年9月，李政道偕夫人秦惠箝归返阔别了近三十年的祖国。那时，祖国处在“文革”时期，李政道参观了一些高校和科研院所，发现教学和科研院所的工作秩序很不正常，基础科学研究被严重忽视，科学人才培养的路子不对头。他对此颇为忧虑。

1974年5月，李政道夫妇再次踏上祖国故土，他看到祖国各科研院所、高校的基础科学研究和科学人才培养的状况比两年前看到的情况更令人不安了。他在上海复旦大学参观时，发现学校的科研活动实际上处于停滞状况，物理系唯一的“研究”活动是测量一种电灯泡的性能。绝大多数师生都被下放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了，留校的少数“工农兵学员”，虽然政治热情很高，可是，他们的科学基本常识都十分欠缺，有的近乎是“科盲”。

李政道的心情十分沉重。但在参观、座谈等交流活动或与各级领导会见时，碍于自己的身份、情面，不能把看到的问题向领导、同行直抒己见，只能从正面提出希望重视基础科学研究、重视基础科学人才的培养。作为一个深深热爱祖国，希望祖国强盛的科学家，如果不把自己发现的问题和改进的建议提出来，真是于心难安啊。几经考虑，他决定趁这次回国的机会，向中央领导人写封信，郑重建议祖国要大力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和基础科学人才的培养工作。

李政道白天忙于参加各种会见、参观和进行讲学，晚上回到住地提笔就赶写建议。在写建议的过程中，李政道提出一个观点：基础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应从娃娃抓起，要从十二三岁的少年中

选拔优秀学生进行重点培养。为了阐述这个观点，李政道希望找到一些例证，最好是国内已有的例证来说明。但是，他一时苦于不了解国内的情况，无法找到合适的例子。

这时，一心关注李政道事业的夫人秦惠箝(竹下加君)女士想起了一件往事：1972年，李政道夫妇首次归国访问时，周恩来总理曾设宴款待李政道夫妇。当时，秦惠箝女士与江青相邻而坐。她记得，在席间，江青曾向她夸耀上海芭蕾舞学校培养年轻演员的成功经验，说他们在十来岁的少年中选拔有培养前途的孩子，到芭蕾舞学校既学文化，又学芭蕾舞技艺。并说这是一条很成功的经验，云云。秦惠箝把这件事说给了李政道听，李政道兴奋不已，并向接待部门提出，今天不去观看上海芭蕾舞团演出了，希望能安排去上海芭蕾舞学校参观，看看他们是如何培养芭蕾舞演员的。

5月中旬的一天，李政道夫妇来到上海芭蕾舞学校。他们仔细向学校领导和教师、学生询问了学员选拔的标准、程序，教学安排、学生专长、成才情况，观摩了芭蕾舞教学，看了学生们表演的节目。李政道兴致极高，他认为，芭蕾舞学校，在少年中选拔尖子培养芭蕾舞演员的做法很好，培养基础科学人才也可以参照芭蕾舞学校选拔、培养芭蕾舞演员的做法。

李政道在以《参观复旦大学后的感想》为题的建议书中，阐述了这样几个观点：祖国应从现在起就重视基础科学研究和基础科学人才的培养。要培养建立一支少而精的基础科学队伍，这支队伍只要占人口的千分之一或万分之一的比例即可。如果现在不抓基础科学的建设，十年以后将出现严重后果甚至是危险。许多国家的经验证明，没有基础科学就不可能有科学创造。李政

道提出,完全可以参照选拔培养芭蕾舞演员的办法来培养基础科学人才。李政道说,选拔十三四岁的孩子集中培养,到十九岁就能达到独立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的水平。当然这些孩子必须具备:(1)有极高的理解能力;(2)敢于提出问题,敢于怀疑已有结论,富于斗争精神;(3)有过人的记忆力。李政道说,这些选拔出来的少年在六年的学习生活里要接受严格的训练。学生既要学习数、理、化,也要学语文、外文、历史、体育,并适当参加劳动。这种培养尖子人才的学校,应当配备优秀的师资和适用的教材和教学设备。李政道最后说,他考虑中国的社会制度有条件这样做,所以才下决心提出这个建议。

建议书写好后,他并没有马上送给中国有关部门。5月下旬,他到达北京后,特地找了老朋友、著名医学家黄宛教授,请他看看行不行?黄宛教授看了认为,李政道先生提出建议是很好的,意见是中肯的,建议的思路是值得研究的。

黄宛的看法使李政道很受鼓舞。当晚,他在北京饭店的住处,又用中文认真誊写了建议书,并写了一封给周恩来总理的信。在信中,讲述了写建议书的动因和酝酿经过,并希望周恩来总理阅后如认为“有可取之处”,敬请转呈毛泽东主席,请他批评指正。

第二天,即1974年5月22日,李政道就把自己在西南联大的老学长、一同赴美国留学的朱光亚先生请来。把建议书和致周恩来的信一并交给他,请他呈报给周总理。朱光亚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是中国方面指定接待李政道的官员之一。

## 人民大会堂西厅的“争论”

周恩来总理很快看到了李政道的信和建议。他极为重视,在5月24日晚,他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就主持了对李政道夫妇的高规格大型会见。

参加会见的有刚刚复出的邓小平、郭沫若以及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

陪同会见的有著名科学家吴有训、周培源、钱学森、朱光亚、王淦昌、张文裕、周光召以及黄宛等近20人,还有迟群、谢静宜,以及王海容、唐闻生等。

周恩来主持会见。他首先告诉李政道,你写的信和建议书已经呈报给毛主席了。“今天,还是请您先讲讲你的想法好不好?”

李政道听说他写的建议和信已呈报给毛泽东主席,感到很高兴。

他遵照周总理的要求开讲了。他从什么是基础科学,什么是应用科学,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的关系,基础科学与国家、社会、科学发展的关系讲起,又介绍了他在参观上海复旦大学和上海芭蕾舞学校的观感,还阐述了他提出的从少年中选拔、培养基础科学人才的建议内容。

在李政道阐述自己观点时,在座的江青就显得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她对李政道讲话本能地显出反感、抵触和不耐烦,忍不住想“批判”他几句。

当李政道提出可以像上海芭蕾舞学校那样在十三四岁的少年中,选拔培养基础科学人才时,江青反问道:“五十岁就不行了?”李政道当即回敬:“舞蹈人才不是从小开始训练的吗?”江青见李政道“顶”了过来,马上又打断李政道的话: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

“舞蹈，是有持续性的。”李政道迅即针锋相对顶了一句：“基础科学也有持续性。研究效率最高也是在年轻时候。所以，也应该在年轻时开始训练，也许在十三四岁，或更早一些。”

李政道接着就选拔培养基础科学人员少年的标准作了解释，提出了三个标准：一个是要有较高的理解力，二是要有斗争性，敢于提出问题，敢于怀疑，三是记忆力。……这时，江青回敬说：“你讲的选拔标准有一条叫要有‘持续斗争性’，这有点道理。就是要有持续斗争性！理解是一个条件，但持续斗争性应该放在前面。如果没有持续斗争性，什么都干不成。当然，更重要的是社会制度和主席思想领导的党。”

李政道对江青的说法未必同意，但考虑这不是原则问题就没有反驳。不料江青突然又拔高嗓门嚷起来了：“意识形态的问题很复杂，我就不相信科学比意识形态更难！在座的都是搞科学的，都是二三十岁才出来的，十六年寒窗啊！”江青显然反对要用培养芭蕾舞演员的办法培养基础科学人才，反对从少年中选拔培养基础科学人员。江青看看会场上没人响应她，也发现自己失态和太霸气，于是，她故作轻松地问：“是不是在这个问题上顶了牛啦！小谢，你讲啊！”

谢静宜受宠若惊应声上阵，一本正经地说：“我认为首先要解决为谁服务的问题。”李政道不知道这位“小谢”是何许人也，便直言与之相辩：“为人民服务，这不错。问题是用什么、怎样为人民服务？怎样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没有基础科学，就没有将来的应用科学，也就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谢静宜辩解：“这和社会制度有很大关系，科学要为社会制度服务。主席讲过，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

谢静宜这种牛头不对马嘴的辩解，连江青都听不过了，对谢静宜说，“你领会错了，他（指李政道）讲的是只有在我们这个国家才做得到。”江青的指斥，使谢静宜低下了头。

主持会见的周恩来总理也许觉得一个会见华裔美国科学家活动的谈话氛围弄得如此紧张有失大国风范，他出来讲话希望调整一下谈话气氛，他说，“毛主席在一次党的会议上曾讲到，一机部搞过一个41个科学家、发明家的小传。这些

科学家、发明家中有些是社会地位很低的，不少都是穷苦的工人。它告诉我们（对人才问题）要破除迷信。”他接着对坐在第一排的几位科学家们说：“你们有什么意见？（李政道的建议）可不可以试验一下？”

在场的科学院负责人周荣鑫见没有人说话，便表态：“可以研究、探讨。”周恩来总理打断他的话说：“让他们（科学家）先说。”

在江青面前，科学家们知道要是吭了气必将大难临头，他们又看到江青对来自美国的世界闻名的大科学家李政道都如此骄横霸气。他们哪还敢吭气。周恩来点科学院副院长、著名物理学家吴有训的名：“吴老先说说吧。”吴有训不吭气。

在扯了一些与李政道建议无关的话题后，周恩来正式表态了，他对李政道说：“你的建议我们要研究，重视，方法可以不同。”周恩来还没说完，江青又强调“我们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言外之意仍是不同意李政道在少年中选拔尖子培养基础科学人才的路子。周恩来则进一步明确对李政道说：“你说的完全可以试验一下，只是千分之一嘛！”

周恩来看江青一而再的“顶”李政道的建议，但又不好再跟江青“顶”起来，他很机智地问李政道：“（从少年中选拔培养基础科学人才）这个问题你看有没有阻力？”李政道很理解周恩来问这个问题的含义。今天会见中江青等“顶牛”不是充分说明了阻力的存在嘛。所以，李政道也会意地回答说：“我想阻力是会有有的。”

会见结束，李政道一行回到北京饭店住处后，他发现人们对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的概念、范畴以及它们相互关系的知识了解太少，这也许是一些人对他的建议不理解或不置可否的原因吧。为此，李政道取消了原定当晚去天安门漫步观赏的安排，用中文写了一份《关于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的补充说明》。这份说明用通俗、简练的文字阐明什么是基础科学、应用科学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李政道说：“什么是基础科学？就物理来讲吧，宇宙间自然界中一些事物的演变都有它们的规律。星球、星云的变化过程是有一定规律的，原子分子间的相互作用是有一定规律的。核和基本核子的构造反应，也是有它们的规律的。可是，这

些不同事物的规律又基于一组共同的基本规律。要了解和掌握这组共同的基本规律就要去研究基础科学。

“掌握了自然界的基本规律,就可以将这些规律反复地、螺旋式地循环应用,这就产生了应用科学。今日的应用科学是基于过去的基础科学的成就。现在觉得有用的应用科学项目,如激光、电子计算机、核反应堆,在二三十年前是没有的,它们的产生是由于我们过去在电动力学、量子力学等基础科学上的成就,而目前有用的应用科学不见得在二三十年以后,还都有同样的用处。

“要有将来的应用科学,就得有今日的基础科学。所以,培养基础科学人才的问题恐怕是不能忽略的。”

李政道用了一个晚上撰写这份《补充说明》。他第二天一早就把《补充说明》呈报给周恩来,同时,给参加5月24日会见的所有人员都印发了一份。他想把道理尽量说清楚,让中国领导人更理解他希望祖国科学和基础科学教育迅速发展,使祖国早日更强盛起来的真诚心愿。

## 毛泽东当“裁判”

在北京逗留的几天中,他虽然忙于各种参观、座谈、讲学活动,但心中时时记挂着他这次回国为振兴祖国科学教育提出的第一个建议的命运,能否被中国政府接受并付诸实施?

5月30日,也就是李政道夫妇拟结束北京访问的那天早晨6点钟,李政道还未起床,就接到一个令他意外的通知:毛泽东主席即将接见他和他的夫人一行。

不到8点,李政道一行来到中南海毛泽东主席的书房,毛泽东已坐在沙发上,看到李政道一行来了,就起立与李政道握手。落座后,毛主席知道李政道在上海长大,就幽默地问:“有上海,有没有下海?”李政道虽说在上海长大,但从未听说过下海,便回答说:“不知道。”毛泽东说:“有上海就有下海,不然就不对称了。下海是一个镇子。”李政道对毛泽东知识渊博而深感钦佩。

毛泽东很快切入了正题:“你提的培养人才的建议我是赞成的。但是,你的那个理论没有讲清楚。”

李政道听毛泽东说赞成他提出的培养基础科学人才的建议非常高兴,担虑多天的建议能否被采纳的问题有了最权威的答案。但是,毛泽东又说“理论没讲清楚”又使他心中泛起不安。

毛泽东接着说:“理论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从应用科学来的,然后又指导应用科学。”李政道听了断定,毛泽东没有看到他的《补充说明》。由于自己在建议书中,对基础科学、应用科学及其相互关系问题的阐释不够充分清楚,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同科学上的阐述是有差异的。

于是,李政道向毛泽东阐释了自己对基础科学、应用科学以及它们相互关系的观点。李政道说,从科学上看,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不是一个简单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基础科学有自己的理论与实践的体系,应用科学也有自己的理论与实践体系。基础科学研究的对象是自然界的基本规律,应用科学是以基本规律为指导进行创造发明。基础科学的研究成果可以启示或为应用科学的理论和实践提供理论依据或规律性指导。

同毛泽东这次的会面和交流,使李政道深受鼓舞。他知道,毛泽东对他提出的从少年中选拔培养基础科学人才建议的肯定,不仅对发生在人民大会堂的与江青的争论作了结论,也为中国政府采纳实施这项建议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在当时的中国,有了毛泽东主席的“最高指示”,那是必定会得到贯彻实施的。

在周恩来主持人民大会堂西厅的接见时,郭沫若、吴有训、周培源等老科学家对他的建议不吱声,李政道当时也困惑不解。因为,这些老科学家都深知基础科学的重要和培养基础科学人才的重要和急迫,但是为什么不表态呢?

接见以后,李政道和夫人秦惠(竹下加君)先后从老朋友和在祖国的亲属交谈中,他们才知道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尤其是在江青等人面前,科学家都属“臭老九”,都是要被揪出来的“反动权威”斗倒斗臭的。仅仅因为中央的保护才免遭批斗。“你是美国人,又是应邀来访的贵宾,顶了江青没事,那些老科学家要是像您这样同江青‘对阵’,早就被揪出来‘斗倒、斗臭’了,弄不好还得坐班房呢。”

李政道夫妇听了,连连“呃,呃”若有所思,他们很理解这些老科学家的处境和心情。

后来,他们还知道,就在周恩来主持接见他们的时候,国内正在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四人帮”蓄意将矛头指向周恩来。周恩来是在承受巨大政治压力的困境中,对他的培养基础科学人才的建议表示支持,提出“完全可以试一下”是冒了政治风险的,是很不容易的。幸好毛泽东也表示“赞成”,才算以“建议被接受”而告终,要不,不知会生出什么风波来。

李政道听了惊愕咋舌,感到不可思议。

最后还要交代:由于有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李政道提出的从少年中选拔培养基础科学人才的建议终于得到贯彻,但是,也拖了近四年时间,其间遇到的困难与阻力可谓“山重水复”。直到1978年,经过拨乱反正,在方毅同志担任副总理、主持科学教育方面的工作后,贯彻落实李政道的建议的工作才放到了议事日程。这年三月,在中国科技大学开设了“少年班”,这是我国开辟的“第一个少年大学生集中培养基地”,第一期招收了21名学生,平均年龄14岁,最小的是11岁。

在美国的李政道得到消息后欣喜不已,他特地发来贺电:“人才代出,创新当少年;桃李天下,教育数科大。”

少年班从1978年开办以来情况相当好,到2002年已经招生26期共999名少年大学生,毕业767人。1985年,在“少年班”的基础上又开办了“教学改革试点班”,到2002年已招收18届共727人,毕业432人,据统计,在“少年班”毕业的学生中,80%考取了国内外的硕士研究生,其中三分之一的硕士研究生攻读了博士学位。许多人成为科技领域的拔尖人才和各种科学奖项的得主。

长期在李政道身边工作的季承先生对我说,李政道教授提出在少年中培养基础科学人才的建议,是在“文革”动乱的特殊时期,那时,他先后于1972年、1974年来到中国访问,亲眼看到中国教育事业在“文化大革命”中陷入了被破坏的困境,教学陷于停顿,教师被打倒靠边,优秀学生去“接受再教育”了,基础科学和基础科学人才培养被否定、受歧视。科学事业,特别基础科学面临人才断档、后继无人的危境。李政道先生建议

是希望经过他的呼吁能拯救中国基础科学事业和基础科学人才的培养工作,冲击“极左”派对基础科学事业和基础科学人才培养的破坏。而不是仅仅强调从少年中选拔培养基础科学人才。看来,李政道教授的这个目的是达到了。事实上,后来,特别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李政道教授再次归国访问时,他一再强调要重视和振兴基础科学,应采取多种途径培养基础科学人才,特别是他主张派优秀青年到美国名牌大学去深造,倡导并亲自参与“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CUSPEA)”培养中国基础科学人才的活动,在十年中培养了千名中国科技精英。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本文作者系新华社高级记者)

## 书屋 2008年第4期目录

- |      |  |                        |
|------|--|------------------------|
| 书屋讲坛 | 三十年回首话胡风<br>——兼论百年启蒙的悲剧根源  | 姜弘                     |
| 学界新论 | “天地境界”与神意深渊<br>——关于《红楼梦》第三类宗教的讨论                                     | 刘再复 刘剑梅                |
| 流年碎影 | 从东洋到西洋<br>丁文江的留学生涯<br>人与流年共向冬——忆吴宓<br>何期泪满江南雨<br>——纪念湖南教育家陈筒青先生      | 李兆忠<br>盛禹九<br>李文熹      |
| 灯下随笔 | 升值、“肉糜”及其他<br>近看瑞典——以主流报纸的相关报道为例<br>中国民间意识下的“抗日”倾向<br>司马德操与罗斯福       | 刘畅<br>傅白芦<br>施京吾<br>留白 |
| 裁书刀下 | 博学、专精难两全<br>——读《范曾序跋集》札记<br>文艺理论的兴衰                                  | 文质彬<br>张隆溪             |
| 思史佚篇 | 君子之交:南开鼻祖严修与袁世凯<br>——《严修日记》及其他                                       | 秦燕春                    |
| 说长论短 | 香骚遗韵<br>——如兰的玉纹,如兰的韦伟<br>从霓红关到斯德哥尔摩<br>病人韩爱姐                         | 蒋晗玉<br>蒋蓝<br>石定乐       |
| 书屋品茗 | 宁肯少些,但要好些<br>叙事、理解与田野——读吴毅著《小镇喧嚣——<br>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释》<br>为“文革”宣传画写前言 | 田居俭<br>黄海南翔            |

邮发代号:42-150 月刊 每月6日出版 定价:5.00元  
地址:长沙市韶山北路443号《书屋》杂志 邮编:410007  
电话:0731-5791300 5486812 传真:0731-5790197  
邮箱:nlh5314@263.net

# 推进民主是第一要务

## ——专家学者笔谈“两会”

编者按：2008年3月人大、政协“两会”以后，新一届政府提出了进一步推进民主政治的设想，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引出了很多专家、学者的议论，本刊摘选了其中部分内容发表，以飨读者。

### 落实两会精神应从改革宣传开始

彭迪

胡锦涛主席代表新一届国家工作人员讲话很好，他强调“坚持民主法治”得到人民的拥护。作为一个60多年的党员和记者，我觉得落实胡锦涛的承诺，应该从改革党的宣传工作开始。宣传工作不改革，将成为中央一再号召的“解放思想”的禁锢，禁锢不开，思想就不能解放；思想不解放，中国就不能前进。

我们党的宣传工作历史悠久，为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很大成绩，本人参加共产党主要是读到党出版和秘密传阅的进步书刊。毛泽东早期关于抗日战争和号召建立独立富强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的著作，使我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愿冒生命的危险追随共产党闹革命。据我所知，像我这样的人太多了。可见宣传工作威力之大。

“宣传”这个词我们用得频繁广泛，但“宣传”的涵义是什么，有哪些规则，这些规则的利弊如何，是通过什么程序和由什么人定的，有什么法律和理论依据，可不可以探讨改革，如此等等。对这许多问题，过去都没有深究，因为探讨本身就可能触犯禁区。现在领导倡导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应该是打破这个禁区，探讨改进宣传工作的时机了。

先从字面的意义谈起。“宣传”是个中性的词汇，意思是向公众传送信息或发表意见，本来应

该反映客观事实和揭示传播真理。但事在人为，它可以用来传播事实和真理，也可以散布谬误和谎言。作为一种政治手段就不免被滥用为政党或个人的主观意志服务而失去或损害其客观性和科学性。

在我国，“宣传”是一种官方的政治权力。这种传统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开始的，共产党执政后也如法效仿，两家大概都是从苏联学来的，除了各自的机关报纸杂志等以外都有统管全民的官方宣传机构。台湾早已取消了这种制度，而在中国大陆，这种官方宣传领导机构的权力越来越大，问题也比较多。

第一，我们宣传工作中最大问题是宣传权由权力垄断，要求全国“舆论一律”，和最高权力保持绝对的一致，不许发表不同政见，违反者报刊书籍被没收查禁，编辑作者被警告处分撤职，甚至被拘留查办。传递信息发表意见交流思想是每个公民应有的权利，不应该成为特权，只许一家独占。国家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并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将某些物质的东西收归国有，但不可以随随便便由权力机关将人民的精神权利尤其是思想言论自由收归国有或党有。

然而，要求十三亿公民只有一种声音，不仅违反宪法，而且听起来有点荒谬，实际上也办不到。

第二，中国传统思维中缺乏平等的观念。官本位、等级制普及各行各业，宣传领域也不例外。现代文明国家的新闻传媒的社会地位不比党政工作低，只有社会分工的不同，在真理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它们受到国家的保护和社会的尊重，可以充分发挥传递信息、发表评论、批评官员、监督政府的功能。美国《纽约时报》揭露国防部扩大侵越战争的计划促进了这场侵略战争的结束。《华盛顿邮报》两个记者揭发白宫违法的

“水门事件”，将美国总统拉下马。可见媒体的积极作用不可低估。中国新闻传媒地位很低，没有自己的独立性，传媒工作者也失去了独立的人格，成为权力的工具。宣传主管部门的官员可以不讲法，往往不讲理，一个秘密电话就可以封杀文章和书刊。这是很不正常的。

第三，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是实事求是，宣传报道的基础是事实，应该客观全面如实反映真实情况。但实际上我们的宣传在许多时候，并不严格恪守这个原则。

本人在新华社总编室处理稿件时，深有体会。二战后西方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民生，从恢复到发展，突飞猛进，而我国被远远地甩在时代的后面，正处在十分困难时期。但我们那时的宣传方针是大喊东风压倒西风，我们一天天好起来，西方一天天烂下去，竭力夸大近代文明国家的缺点和问题。美国宇航员首次登月这种人类破天荒的创举和轰动一时的新闻，我们没有报道；由两个基层美国记者对白宫违法活动的揭发导致尼克松总统下台的“水门”事件，我们不予报道。对这些重大新闻的处理，都是根据中央指示照办。对外国的工会组织我们斥之为“黄色工会”。对一些反对独裁专制受到世界尊敬的民主领袖人物如波兰的瓦文萨，捷克的哈维尔等，在宣传上受到中国的冷落。苏联东欧的解体明明主要是由于那些国家的人民对专制统治的反抗斗争的胜利，我们的宣传报道不但不站在各国人民的立场表示欢迎，反而硬说是美国干涉的结果。

第四，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党的优良作风，但在媒体上往往是党领导不欢迎批评。许多独立思考，对人民和国家的利益高度负责的好心人，发表不同意或不完全同意党的观点政策的意见，反而被划为阶级敌人、戴上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甚至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受到打击迫害。

改革开放已三十年，各方面的工作都有很大的进步很大的改进，但我个人认为，我党我国意识形态领导部门的基本思路与基本做法变化不大。胡耀邦执政那段好了许多，1989年夏以后差了许多，近几年又好了一些，我们的一些宣传管理部门，至今公开宣传和谐社会，秘密推行阶级

斗争为纲，对不同意见如临大敌，不便公然出手，内部指示务必消灭于萌芽之际，不敢明文传达，就用口头通知。对互联网的信息也不惜国家财力，利用先进技术，加以封杀。

第五，宣传自己的信仰主张是正当的，但任何理论或主义都不是唯一的绝对真理，需要在实践中检验修正和发展，不能禁止讨论批评质疑或否定，更不能动用国家专政手段强加于人。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胡耀邦领导和邓小平的支持下，确认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理。这个历史性的转化来之不易，它为中国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奠定了理论基础，但我们宣传部门对理论问题的态度还没有多大改进，还不断地反复。

根据有关资料，1896年中国出版的《强学报》就提出民间办报有助于“广人才，助变法，增学问，除舞弊，达民隐”。1902年梁启超指出“学生日多，书局日多，报馆日多乃影响中国前途至关紧要的三件大事”。1912年孙中山认为“言论自由，各国宪法所重，从善改恶，古人以为常师”。邵飘萍办的《京报》以“探求事实，不欺阅者”为第一信条。国民党的元老于右任1910年也指出有独立之言论，然后才有独立之国。这些历史资料表明在这方面，我们的先辈们早有许多好的见解。

美国对外的霸权主义不得人心，对内民主制度也远非完善，但他们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也不是偶然的。仅举一例。美国宪法1788年被国会批准后，在人民广泛的抗议和强烈要求下，1791年增补的第一条修正案就明确禁止国会制定妨碍人民言论和信仰自由的法律。这一条很厉害。它防止了美国走向专制并为美国人在解放思想、发展自然和人文科学开辟了宽广的道路。

应该老实承认我们的差距和弱点。公道地说，这种情况并不完全是意识形态管理部门之过，但它确实很不得人心。中国要迎头赶上时代，这些意识形态管理部门必须改变职能，从思想警察转为文化园丁，爱护和培育中国大地上的思想文化园地，让百花盛开。

“要让人民讲话”

袁 鹰

2008年3月18日胡锦涛同志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闭幕式上发表再次当选国家主席就职宣言,讲了四条,第一条是“坚持民主法治”。五年前的同一天,2003年3月18日,他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闭幕式上发表当选国家主席的就职宣言,也讲了四条,第一条也是“发扬民主,依法办事”。两次就职宣言,都将民主法治放在首位,使我们感到欢欣和兴奋,表明了民主法治在最高领导人心中的分量和坚定不移,坚持不懈的决心,也表明真正实现民主法治的道路漫长而不平坦。

从上世纪初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先进仁人志士在古老的神州举起民主、科学两面大旗以来,已有九十年。如果更早一些,孙中山先生倡导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呼号共和,推翻封建专制王朝,更已过了悠悠百年岁月。一代又一代的先行者,为民权、民主前仆后继,殚精竭虑,抛头颅,洒热血,用生命写下无数可歌可泣的史页,使后来者想起他们就热血沸腾,心潮起伏,在百代都行秦政制、封建专制思想观念根深蒂固的中国大地上,民主步履进程的每一步都需要用多少人的血汗以至生命去换取。不禁使人又想起老一代革命家陆定一同志弥留之际还留下沉甸甸两句话:“要让孩子上学,要让人民讲话。”

没有民主,便没有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今天已成为人们的共识。而“让人民讲话”,则是民主政治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内容,也是民主政治一项突出的标志。孙中山早就说得很清楚,他倡导的民权主义,“要使人民都能够说话,的确是有发言权,才是真民国,如果不然,就是假民国。”人民本来就应该有发言权,不是谁恩赐的,更不是谁想给就给,不想给就不给。“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这一条,历来都列入宪法,明确地保证了的。主管党的宣传工作几十年的陆定一同志到生命最后一息还念念不忘“要让人民讲话”,不能不让后来人在心灵震撼的同时引起深深的思索。三十年来,高层领导人都曾经再三告诫全党尤其是处于领导岗位上的党员要让人民讲话,要倾听群众批评,要听得不同意见甚至反对意见,强调到“让群众讲话天不会塌下来”的地步。不允许任意以言定罪,更不允许再兴文字狱。胡耀邦同志曾经疾言

厉色说过:“我们的党要发誓:坚决不许对文艺作品妄加罪名,无限上纲,因而把作家打成反革命!”

就在不断发生侵犯人民言论自由、压制舆论监督、殴打媒体工作者甚至某县委胆敢派警察越县境到外地抓捕记者这种胡作非为、无法无天事件的同时,也能看到不少地方党政负责人欢迎媒体舆论监督因而受到赞许的报道。例如重庆市政府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发言人引用的一句话就是:“让媒体说话,天塌不下来。”用外交辞令来回答群众提问,是不负责任的。”有一位县公安局长在说到群众的监督时,也引用了“让群众说话天塌不下来”这句话,此话出自一位公安局长之口,尤为难得。懂得这条真理的人越多,民主政治的建设就越得人心,越有力量,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越能尽早实现。

“为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七品芝麻官曾经传为美谈,封建时代有那样的官员诚属不易。到了今天,人们对真正“为民做主”或“代民做主”的各级干部叫好,更渴望能逐渐做到真正的“由民做主”。因为,你不是封建时代老百姓的父母官,而是人民当家做主时代老百姓的儿女和公仆。你手里的一切权力,都是老百姓给的,作为儿女和公仆,只有天经地义听从父母和主人的义务和责任。若是有人拿了人民给他的权力,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颠倒了位置,不仅不克己奉公、兢兢业业依法秉公办事,反而肆意横行、为所欲为,甚至践踏和损害了人民的利益,岂不是对国对党不忠、对父母不孝,成了不忠不孝、违宪犯法之徒?作为父母和主人的老百姓,岂能纵容这样的不肖儿女和公仆而不加劝诫,批评以至谴责呢?

说得多么好啊:“让群众讲话,接受舆论监督,天塌不下来。”是的,天是不会塌下来的,永远不会!

## 鼓励对重大问题发表不同意见

——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杜导正

改革开放三十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

就。当然也有问题：官员腐败、贫富悬殊、治安不好、道德滑坡。左翼的朋友们夸大了这些问题，要走回头路。这是找错了病因，开错了药方。十七大的药方是：继续解放思想、继续改革开放。我们拥护十七大的主张。

当前国家最大的问题是：改革跛足前行，民主政治没有跟上。上述四大问题主要就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造成的。

政治民主要前进，前提是解放思想。各种教条和框框还控制着我们的头脑。解放思想是前进的第一步。进一步的问题是：思想解放之后，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如何突破？

现在开始形成了上下互动的格局。下边，民众在动，若干地方报刊在动，网民在动。个别地方官员也有一些响应，但是比较弱。上边也在动。胡锦涛在人大闭幕式上的讲话，做了四项承诺，发扬民主是第一条。温家宝在人大闭幕后答中外记者问时，引用了王安石的名言，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表明了破除迷信大胆改革的决心。据传，胡锦涛在十七大后还说，允许对重大问题发表不同意见，2月17日在中央组织工作会议上更公开发出号召：在党内，特别在干部队伍中，营造一种鼓励探索、支持创新、宽容失误的环境和氛围。总之，这种上下互动，互相促进的形势有利于我们小步前进，打破框框和教条，推进民主政治。

如何选择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蒋经国先生选择的突破口是开放党禁、开放报禁。这在大陆不好学，不会学。有朋友建议，我们可否从允许党内存在多派制入手。也有人建议，先在党内建立三权相互制衡体制。总之须建立以权力制衡权力的体制。现在我们是教育以道德制衡权力，效果甚微。历史经验证明，只有权力才有力量真正制衡权力。

当前中国民主政治往前推进最可行的方案，我以为就是响应胡锦涛号召，放宽言路，营造一个宽松的舆论环境。宽松还不是放开。首先营造宽松的舆论环境，然后逐步放开。在这个过程中，媒体有责任，意识形态管理部门负有更大的责任。

放宽的第一步，是提高意识形态管理部门的公开度和透明度。意识形态方面的管理规则，出

台前应该公开讨论，出台时应该公开颁布，执行过程要公开，处罚要公开，给被罚者申辩的权利。国务院信息公开化条例即将实施，政务公开是合法的，政务不公开是非法的。在政务信息公开方面，温家宝总理说，没有任何部门可以例外。可是，我国连公检法部门现今都有了新闻发言人，公检法的政务一步步的公开了，但是管理书报刊的部门现在仍很不公开，很不透明，用大众的话说，仍在暗箱操作，暗箱管理。各个部门都在动，意识形态管理部门也应该立刻动起来。

媒体也要动起来，自我松绑，自我改革，自我完善。这是媒体方面的责任。1988年，中央曾出台过有关报刊批评权的一个正式决定，报刊有批评报道的许多权利。这个规定现在不提了，但是并没有作废。媒体可以行使1988年那个决定的权利，把批评报道首先搞起来。

在报刊管理方面，党在建国前做得好，文革期间做得坏。粉碎“四人帮”后好，1989年后不好，最近一段时间又有了一些进步。在今天我国民管理上下互动的局面中，意识形态管理部门和中央各大媒体我认为还是比较落后的。宽松一些，透明一些，操作起来并不困难，问题是要解放思想。思想实在换不了，那就建议该换换人了。

2008年4月7日

## 表达权实现需要制度保障

资中筠

我现在对研究领导人报告中的某个提法兴趣不是太大。只抱一种态度：看实践的情况。有一些好的话，有的时候不管用。我记得几年前有一个杂志组织了一个座谈会，那个时候刚提出“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我在会上发了个言，还根据这个发言写了一篇文章，说“以人为本”要讲人权。还说好的口号，好的提法，要依靠社会的健康力量来落实。对健康的力量加以压制，再好的口号也落实不了。后来这篇文章哪也发表不了了。有人说，领导人的这些好的提法是对人民作了“承诺”。我觉得，他们讲话中这么一些提法，不能当作说了就要兑现的承诺。例如，说给民众表达权，实践中照旧在压制表达权，到现在为止我

个人还没发现有允许和支持表达权的切实行动。连南方最开放的报纸,也常受黄牌警告。有没有言论自由,是个试金石,你再讲民主没有用。过去我们早就讲民主了,但一直没有落实。

要落实言论自由,落实表达权,不允许民间办报、办刊不行。说是可以“依法”批评,这个“法”也掌握在领导者手里。南方的一些报纸已经市场化了,不吃皇粮,但上面依然可以撤换主编和社长。还有出版社,他也不需要公开的说不许你出这本书,那本书。他少给你点儿书号你就受不了。限制表达权的手段非常多,根本不需要公开说压制言论自由,或者不许你说什么。跟主编、社长打个招呼,打个匿名电话,不敢不听。真的不听,就没饭吃了,主编可以自己不在乎,手下的人就没饭吃了。到目前为止,言论没有放松的形势,只是控制手法变了。

我觉得言论自由的问题也不全在中宣部。中宣部长得听党中央的。中宣部长和中央不一致,那就换人。我们直接感受到的是中宣部的压力,实际上还是总的方针问题。要分析现在好多好话,像这次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七大报告里面有很多好的话,究竟是准备落实的,还是说给外国人听的,或者是为安抚舆论。我以为这个很难分辨。

另外,还有一个我不是很乐观的,就是有一批精英受到利益的影响,不再坚持原来的理念了。我最近碰到一些学者,原来思想很不错的,进了政协和人大了,或者有了一定的地位,自以为有机会受到咨询,就说现在已经很自由、很民主。至于下面是怎么样的情况他就不太关心了。现在很多教授收入非常高,有别墅。要他放弃这些利益不可能。如果他的言论和主流不一致,只要停他几堂课,一年不让他教课,或者是没有课题,或者是哪些会不请他了,他就受不了。他的收入就降低了一大块,社会地位也降低了。当然还有一批人为了坚持真理不顾这些。但是,能够贫贱不能移的,是少数。

我们有没有进步,一个是要竖着比,当然比改革开放以前好多了。但这个要求低了一点,现在我们还要横向比较。现在是二十一世纪了,周围有很大的进步。中国人对美国大选研究的非常细,但是十七届人大政府换届应该算是我们的

“大选”,而我们却稀里糊涂,对号称选出来的领导人,我们对他们的知情权和表达权到底有多少?大家只能从小道消息猜。我们周围东南亚这些国家,包括越南,都已经走在前面了,韩国原来那么专制,这个坎已经越过了。俄罗斯,不论有多少问题,或者有人说普京在往回收权,但是不可能回到过去,这个坎也已经过来了。我们民主这个坎还没过。现在很难往前推,就算有一个非常英明的领导想要推的话,都很困难。因为那么多既得利益者在那里挡着,下面也有阻力,横的竖的都有阻力。我觉得唯一的就是放开舆论,让健康的力量表达出来,而且可能还会有一些牺牲,像孙志刚事件,《南方都市报》为揭露孙志刚事件,一个人撤职了,一个人进了监狱。这样还算是平稳的,如果不能及时放开舆论监督,下一步真的不知道会怎么样。

## 自由是民主的前提

### 何方

在刚刚闭幕的十一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胡锦涛主席代表新一届国家机构工作人员,向全国人民作出了履行职责过程中的四项庄严承诺,其中头一项就是“坚持民主法治”。这说明,党中央已经越来越认识到,实行民主法治是中国人民的迫切需要和治国的当务之急,不能再让实际上的专制和人治长期拖下去了。而且在去年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中,就曾专辟了一节谈“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一口气提了十来项要求:“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这确实都说到了点子上。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落实。这就涉及必须尽快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否则那些承诺很难实现。例如在实行干部委任制(或变相委任制)和暗箱操作的情况下,那“依法(即使指宪法而不是其他内部规定)实行民主选举”也只能是走走形式,真正反映民意的民主选举还是不会有的。又如,在坚持舆论一律、媒体不独立、言论不自由、遇事发“通稿”的情况下,人民怎么享受知情权?不知情,又怎么参与和监

督? 没有言论自由, 哪来的表达权? 由此可见, 没有自由就根本谈不上民主。为了“坚持民主法治”, 首先应该开放言路, 尽快制定和实施新闻自由和媒体独立的立法。

今年的两会, 不论是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答记者问, 还是代表委员的发言和讨论, 都强调解放思想。说老实话, 对这个问题我还有些闹不清楚, 究竟是要破除什么约束和迷信, 最终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因为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 我们在一个长时期就一直强调解放思想, 但破和立的目标还是比较明确的。那就是: 破个人迷信和以阶级斗争为纲, 经过拨乱反正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破搬过来的建设模式和闭关自守, 实行改革开放; 破“姓资姓社”, 实行市场化和混合经济。过去这些还主要限于经济方面。如果这次所提, 是要解决政治上的民主法治问题, 那就可真是合乎时代潮流, 适乎人群需要了。实际上这也是党和政府实行“物归原主”, 把长期代人民行使的知情权、表达权、选举权、参与权、监督权交还给人民。要党政机关和干部做到这点, 是极不容易的, 不但要大讲解放思想, 而且要允许和鼓励广大群众起来争取, 进行斗争。但这首先得有自由。没有自由, 根本谈不上解放思想。以党史研究为例, 在遇到许多不得逾越而又违背史实和不讲道理的框框、限定许多重大问题只能说假话、必须为尊者讳、还规定许多历史事件如反右派、大跃进、三年饥荒、文化大革命等, 根本不能多谈, 在所有这些情况下能谈得上思想解放吗? 所以, 在控制言论、遍设禁区的情况下, 谈思想解放, 只能是无的放矢。

今年的两会期间, 不但谈思想解放, 据说谈得最多的还是民生问题, 诸如物价上涨、看不起病、住不起房、上不起学, 以及相关的权钱交易、腐败盛行、官多成灾, 两极分化等等, 造成社会矛盾加剧, 隐藏极大危机。例如一个明显事实是, 最具中国特色的二亿一千万农民工至今仍然属于二等公民, 绝对大多数过不上作为人的家庭正常生活, 还要处处受欺侮, 讨不回工资, 谈不上社会保险, 无论是公安、城管、工商等机构, 都可以随便找个理由把他们赶来赶去, 动辄罚款。他们只能逆来顺受, 得不到保护, 没处讲理, 既不准组织起来, 也不准集体自卫, 作为中国最大的弱势群

体, 就只能听天由命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 主要的倒还不是没钱, 而是没权。中国的农民没有结社自由和迁徙自由, 占人口三分之二左右的农民, 至今还被置于一盘散沙的境地。连在救灾、扶贫等社会活动中起着重大作用的非政府组织(NGO), 在我国也得不到鼓励和帮助, 主要还是着眼于防范。所以至今已有三十多万 NGO(以占人口比例论, 这个数量可能是世界上最少的), 百分之八十还处于非法状态, 没能通过社团登记这一关, 虽然它们已自发地为社会做了不少好事。一切这些情况都说明, 民生和民主是分不开的, 要解决民生问题, 在当今主要的还是要实行民主, 尽快进行民主改革, 把属于人民的权交还给他们。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 我们的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已经使世人刮目相看了, 但政治上却依然落后, 缺乏民主。在谈到一些属于人类进步指标的普世价值, 如自由、平等、博爱、人权、公正、清廉等, 我们总有点不够理直气壮。环视全球, 许多比我们贫穷落后得多的发展中国家, 都早已实现了选举民主和言论自由, 我们这个有五千年文明的古国和十三亿人口的大国, 在这一点上竟然不如它们, 只能和少数很孤立的国家为伍, 这就不像话了。所以, 摆脱政治落后状态, 落实胡锦涛主席还权于民的指示, 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站立在时代潮流前头的民主法治国家, 是我们所有活着的人, 对祖先、后代和人类不可推卸的责任, 也是给自己的历史定位。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必须努力!

## 完善党内民主制度, 推进政治民主

杜光

十七大以来, 思想解放与政治民主已经成为媒体舆论和社会上的最热门的话题, 党内民主问题也被许多文章提及。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的政治报告中指出: “党内民主是增强党的创新活力、巩固党的团结统一的重要保证。要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 以增进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我认为, 除此以外, 党内民主还是克服党在当前所面临的危机的

最佳选择。

说党当前面临危机,恐怕不是危言耸听。近几年来,由于党风败坏,贪腐盛行,贫富悬殊,民风日下,群发性事件层出不穷,因而党群关系、官民关系严重恶化,人民的不满都集中在党的身上,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许许多多的不良现象,归根到底都是政治权力不受限制、贪官恶吏滥用权力的结果,而这个权力不受限制的政治体制,又是处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所以大家当然便把责任统统算在党的头上。党只有加速改革,完善自身,成为一个真正民主的、开明的、公正的、清廉的政党,才能挽回群众的信赖和拥护。要达到这一点,最好的道路就是实现党内民主。

胡锦涛同志说的“要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是非常必要的。中国共产党是现阶段中国的唯一的执政党,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在相当一个时期内,没有一个政治力量可以取代共产党。我们要实现政治民主化,首先,或至少是同时,也必须实现党内的民主化。只有一个民主的政党才能领导国家走上民主的道路。很难设想,一个不民主的政党,怎么能够领导国家和社会实现民主化呢?

党内民主的实质,包含两个主要内涵:一是党员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真正成为党组织的主人,使党成为一个民主的、开明的政党;二是杜绝权力的滥用,建立健全的制约权力的机制,使党成为一个清廉的、公正的政党。要实现这两方面的要求,应当采取两项具有根本性的措施:加强党员的民主权利,健全制约权力的机制。

党员的民主权利,包括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简要分述如下:(1) 保证选举权利,完善选举制度,加强选举的民主性,杜绝形式主义,使选举真正成为党员行使权利、表达意向的民主形式。为此,需要建立一系列民主程序,首先是各级代表大会代表和各级党委会委员的候选人,除组织部门推荐外,还应有一定比例由党员或代表推举;其次,实行差额选举;第三,当选者须定期向选举人或选举单位汇报工作情况;第四,选举人和选举单位有权撤换不称职的代表或委员。(2) 各级党组织应当通过简报、公报、通报以及在党报党刊上发布消息等形式,向党员报告工作情况,使党员能及时了解党组织的运作过

程和是非得失。特别是领导干部个人的收入情况,更须定期公开。(3) 党员要关心党的事业和活动,对党的工作和担负领导工作的党员提出批评建议,这既是党员的权利,也是他们的义务;党组织应创造条件,吸引或动员党员参与党的活动。(4) 党员有权表达自己的观点、意见和要求,党报党刊应当向广大党员开放,成为他们表达意见的园地;推行新闻出版自由,让每个党员和公民都可以利用舆论出版工具,表达自己的诉求。(5) 党员行使监督权利的方式很多,可以直接或越级提出批评,可以向监督机构反映情况,还可以通过报刊揭露不良现象。党组织应保护党员行使监督权利的积极性,严禁对监督者实施报复的行为。

建立党内的制约机制,实际上就是实行党内的三权分立。三权分立是国家权力相互制约的一种原则,它既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政治制度,也不是一种固定的政治模式。美国和欧洲民主国家的政治结构各不相同,有总统制,有内阁制,还有君主立宪制,但他们都奉行三权分立的原则。我们把三权分立的原则应用到党内,就是使党组织的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相互独立,相互制约,改变长期以来的执行权独大而决策、监督两权萎缩的现象。为此,(一) 要确立党的代表大会作为党的决策机构的最高领导地位,成为名副其实的最高领导机构。一方面要加强代表选举的民主性,提高代表素质;同时从制度上加强代表的责任,建立常任制、常委制、年会制和撤换罢免的制度。这样,就可以大大增强代表大会的活力,使代表大会足以担负起决策和监督的重任。(二) 弱化执行机构的权力。在党政不分的情况下,党委第一把手享有无限的权力,可以不受制约地行使他的特权,这种情况必须改变。在组织结构上,作为中央委员会的常设机构,书记处下可设政治局、组织局、宣传局,分别负责贯彻代表大会的决策,处理党内的日常组织业务,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和理论见解。解除宣传部门的统管意识形态的任务,废除书报检查制度,杜绝文化专制主义。(三) 强化党内监察机制,扩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职能,改为监察委员会,各级监察委员会与同级党的委员会处于平等地位,党委对同级监委没有领导或指导的关系,无权干预监委的工作。与此同时,开放舆论监督,把新闻媒体作为了解民情民

意的、听取批评建议的主渠道，建立党同群众的密切联系。

加强党内民主，既是完善党自身的需要，也是当前深化改革的关键。不论是进一步改革经济体制，攻克垄断堡垒，还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行党政分开，都需要一个民主的、开明的、公正的、清廉的政党来领导、来推动。希望中国共产党能加快实现党内民主化，真正作到“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以增进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

2008年3月24日

## 期盼铿锵落实

冯健

胡锦涛主席在本次人大闭幕会上发表讲话，提出了新一届国家机构工作人员履行职责要切实做到的四条。这是决心，也是承诺，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列四条之首的是，坚持民主法治。“坚定不移地维护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定不移地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由此联想他在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中所讲“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使国人对多年盼望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又一次看到了前景和希望。

记得在2006年底，一篇题为《民主是个好东西》的文章，被人们争相传阅，多家媒体跟进转载，当时确实让人有“空谷足音”的感慨。而今，会堂、坊间，报刊、网上，谈论民主者大有人在，它已成为人心所向，改革应有之义了。人们从这里看到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渐进（也有识者趣称为“碎步前进”）的步履。

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最近著文，为中国民主开列了一个公式：党内民主+人民民主+宪政民主。文章说：“中国民主模式已经呼之欲出，跃然纸上”。

郑永年提出的中国民主模式的三个元素，与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

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相比照，颇有一些契合。其中“人民民主”，二者相同；另外两个元素“党内民主”和“宪政民主”，则不尽相同。怎样解读呢？我的猜度是：在郑氏看来，依中国国情，党内民主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人民民主；宪政，意味着民主、法治和人权，具有普世价值，而且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

现在，最重要的是落实——采取坚决措施，把纸上的决定和会上的许诺，掷地有声地铿锵落实，使人民得到实惠，成为他们生活中实实在在的权利。

但是，令人感到忧虑的是，落实尚存梗阻。据媒体近日报道，陕西省某县，一名校长为了学生的助学金问题，追着县长索取签字，发生争执，竟被停职并行政拘留。更有甚者，湖北省某市，城管人员与村民发生冲突，被一个过路人看到并进行录像，录像者竟被城管人员群殴致死。另据一家媒体调查，近两年一些地方发生过多起“因言获罪”事件：有人或因在报上、网上写稿，或因写材料、发短信，批评基层领导人员，就获罪被拘留、逮捕以至判刑。

这些事件或属个案，但是，一个老鼠要坏一锅汤！像这样目无宪法，目无政纪、党纪，公然跟“执政为民”理念和十七大顶牛逆行的公职人员，怎么会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又怎么能指望他们依法治国？这类事件如不加以整饬，谈何令行禁止？

有一种称之为“木桶理论”的，是说一只桶的容积，决定于围成这只木桶的木板中最短的、而不是最长的那块木板。借此打个比方，那些目无法纪、对老百姓作威作福的公职人员，对于我们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这项伟大工程，不就是那块最短的木板吗？

## 加快政治体制改革， 完善中国民主模式

高放

近三十年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已经取得了举世公认的重大成就，但是政治体制改革相比之下显得滞后，因此导致党政官员腐败

加剧，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社会深层潜在的危机加深。所以政治体制改革成为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瓶颈，只有突破这一瓶颈，我们才能满盘皆活，走向通途。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的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3月18日他在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又重申要实现民主法治，“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可见，当前我们国内存在着推进民主的好气氛。

中国的民主不能照搬西方那种三权分立、多党争夺的模式，中国自己独特的民主模式几十年来历经周折，已经初步确立，但是很不完善。当务之急是大力加快政治体制改革，促使中国的民主模式尽快完善。

对于中国民主政治模式的完善，我认为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即党内民主、党际民主以及人民民主，这是目前切实可行的具体方案。

首先是完善党内民主。从1980年开始，我就多次写文章建议修改党章，完善党内权力结构，从而有利于发扬党内民主。党章关于党的权力机关的设置还是不够合理的，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中共党章历来都把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并列为党的最高权力机关或者最高领导机关。从1922年二大制定第一个党章到十七大党章为止，总共有十七部党章，都是这样表述。实际上按照马列主义党建理论，党的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中央委员会是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党代会既然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那么就必须实行年会制和常任制，这样才能把党的权力中心从党中央转移到党的代表大会。另外，按照马克思建党理论，要使中纪委成为与党中央平行的机构，使中纪委监督党中央。此外，我还希望党的十八大能像1956年八大那样，充分发扬民主，中央委员预选名单能先由各代表团自下而上提出，希望通过扩大差额选举淘汰一些不合适人选；还希望从十八大起，在公布中央委员会当选人时候，能按照得票多少排列而不要按照姓氏笔划排列。

党际民主，指共产党与八个民主党派实行多党合作制之间的民主。这方面也有待完善。

现在八个民主党派总共只有71万党员，中

共却拥有7300多万党员，只有民主党派得到更大发展，才能更充分发挥参与与监督作用。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进一步完善才能从根本上克服苏联模式“一党专政”的弊病，只有社会主义多党制的进一步完善才能最有效抵制西方资本主义多党制的消极影响。

完善共产党党内民主和多党合作的党际民主，都是旨在完善人民民主，都是为了领导人民真正实现人民自己当家作主。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又强调要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胡锦涛同志最初在2003年初提出的这一经典名言被誉为新三民主义，我认为要贯彻落实这新三民主义，最重要的前提就是要首先做到权为民所授。现在各级人民代表和主要官员大都认为自己的权力是党、是上级领导授予而非人民授予的，因此心目中就只有党和领导人，而远离了人民。当前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基层政权的民主选举也需要完善。我认为县以上的人民代表应该通过直选和差额选举来产生，乡镇和县政府领导人应该通过直选、差额选举来产生。我认为人民代表和政府领导人应该按宪法、选举法的规定和精神，采取民主选举方式产生，而不能采取协商民主方式产生。关于选举方式的改革，我们可以借鉴1942年延安参议会做法，当时在选举边区政府第二届参议员时，不同单位提出了三个著名共产党员为候选人，即徐特立、周扬和郭化若，他们之间各自发表演说展开竞选，结果郭化若当选。可见从多个共产党员候选人中选出代表或领导人，这样就能保证共产党的领导权。因此我建议县以上人民代表和乡镇县级的领导干部可以采取这样的方式来进行直接选举。

目前全国已有十多个省份在实行民主选举的改革试点。当前的任务是要认真总结这些地区的试点经验，进一步在全国更大范围内推进民主选举。形势逼人，时不我待，我们应该加大加快民主选举的步伐，务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追赶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在完善选举民主的同时，也要完善协商民主。从1949年起我国就开创了人民政治协商制度。如前所述，建国初期我国的人民政协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1954年人大制度确立之后，政协变成统一战线组织。今后应该考虑把政协改为国家权力机关，这也是我们解放思想的一大体现。政协是各党派、各团体、各行业人士组成的，它和按照地区组成的人民代表大会恰好构成了我国两个权力机关，这样有利于权力结构的平衡，权力的相互监督与制约。一院制并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特征，两院制也并非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特征。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两院制也有好处。

党内民主、党际民主和人民民主，这三个部分的构建顺序是我们社会主义民主得以顺利实现和完善的渐进步骤。这个顺序也突出了我们民主模式的重心和落脚点是人民民主，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核心和归宿。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归根到底是要实现人民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

谢韬同志说“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我把他的话改为“只有社会主义民主才能救中国”。因为民主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世界各国社会党的指导思想，社会党是要利用资本主义议会民主、多党争夺去争取选民，上台执政，逐步实现它们所理解的社会主义。中国只有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借鉴民主社会主义（例如争取选民支持，执政后不搞以党治国，不搞官僚特权，廉洁奉公，杜绝腐败），这样才能建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 “只有把人民放在心里， 人民才能让你坐在台上”

钟沛璋

在中共十七大之后，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也顺利召开。民主与民生是两个大会的主题。两个大会对改善我国农民状况，改善民生，都予以很大的关注。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组成部分，对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也迈出了新的一步。这一切说明，我国继续在改革中前进。这是顺历史潮流，是得民心、党心的。

温家宝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只有把人民放在心里，人民才能让你坐在台上。”这是一句语重心长的话。人们看到，一些国家经济情况好

了，那里的官员们就考虑怎样“还富于民”，给人民发“大红包”，不光是新加坡这样做，我国香港、澳门也都这样做。特别值得深思的是，与我们紧密相关的近邻俄罗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强大的苏联突然自动瓦解。“休克疗法”的激进改革，导致国家经济一落千丈，横扫全国的经济和金融危机，使俄国政局陷入混乱。俄罗斯人民痛定思痛，特别是普京上台后，采取一些有力措施，坚决惩治敢于觊觎政治权力的经济寡头，坚决打击恐怖主义，俄罗斯的经济迅速恢复连续增长，去年增长率达到8.1%，成为仅次于中国和日本的世界第三大外汇储备国。俄罗斯居民的实际收入高于GDP的增长率，每年以两位数增长，人均达到9000美元，退休金也增加了近9倍，人均购买力已跃居世界第7位。

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一位西方记者对俄罗斯的总统竞选尖锐提问：“为什么俄罗斯不存在政治竞争？”普京回应：“这里的工资以16%的速度增长，这就是对你的回答。”这个回答明快，深刻。正因为是“还富于民”，把人民放在心上，人民在俄罗斯经济上升中得到切切实实的利益，普京和他的官员才能稳稳坐在人民给他们的领导位子上。

还有值得深一层思考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经济今天还停滞在靠廉价出口外销上，而迟迟唤不起国内强大的购买力？为什么美国人的购买力总是高居世界首位？原因是美国政府基本没有生产性资产，也只有少量的土地，不像中国政府那样拥有76%以上的资产（经济学家陈志武：在中国，多于76%的资产是政府拥有的，民间只有不到25%的资产）。美国的内需这样旺盛，因为美国的资产基本上都是民间所有，政府也不会与民争利。我们看到美国人总是把每个月的工资花光而不存钱，储蓄率为-1%。同时，许多美国人都拥有股票或基金。美国人能够只靠资产升值来使自己的财富上升。

因此，不能迷信这样“本本主义”的教条：只有国有经济强大，国家才能富强。世界上没有哪个富有国家还维系大规模的国有经济，也没有哪个国家真正靠国有制富起来。为人民谋利益，除了要“还富于民”，还应“藏富于民”，放手发展为民造福的民营经济。

## 政治改革的突破口

辛子陵

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最大的意义是脱离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空想社会主义道路，逐步汇入世界主流文明，按国内生产总值计，2007年，中国成为世界第四经济大国，实现了毛泽东倾全国之力而没有实现的超英的梦想。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财政收入大增，国家经济实力增强，民生大为改善。近几年，国家财政进一步向民生倾斜，2007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资金达到4318亿元。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得到落实，得到人民普遍拥护，新一届高层的年轻领导人威信大为提高。这是进行政治改革的最好时机。

改革开放是对空想社会主义的全盘否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实质上恢复了新民主主义。与其从实质上恢复，不如干脆打出新民主主义旗帜。毛泽东在创立新民主主义理论时说，新民主主义就是新资本主义。（1944年3月22日，毛泽东《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从这里接轨，向民主社会主义前进，就彻底解决了改革开放的合法性和正统性问题。三十年来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奠定了基础。如果继续维护毛泽东晚年的错误，那只能证明自己三十年来搞错了，不能加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只能削弱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能给改革开放带来合法性，只能给反对改革开放的政治主张带来合法性。对中共的执政地位形成挑战的，不是远在天边的西方势力，是“萧墙”之内把毛泽东的错误当作旗帜挥舞的持极左看法的朋友们。他们发表的《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救中国》一文说：“不是文化大革命错了，而是邓小平把文化大革命全盘否定了。……他的继承者搞的是一套修正主义货色，而这正需要再发动文化大革命以革除之。”邓小平1992年说：“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具有深邃的历史眼光。

由于政治改革没跟上，贪污腐败不能有效遏止，社会出现不公正现象，老百姓意见很大，群体事件不断增加。左派朋友们利用群众中的不满情

绪，说改革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鼓吹回到毛泽东时代。使反对改革开放和对改革开放不满的人数迅速增加。如果民众被左派朋友煽动组织起来，把解感和寻求出路的视线投给毛泽东晚年的继续革命理论，并且以毛泽东教给的方式去发泄自己的不满，打起有些领导干部不敢反对还作秀支持的毛泽东旗帜，揪斗“资改派”，局面就不好收拾了。这是中国未来十年最大的隐忧。只有实行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政治改革，包括意识形态的改革和政治体制的改革，才能避免一场新的浩劫。

历史的教训是，政治改革的“机遇期”是不容易抓住的。有的执政者在他们认为自己有力量控制局势的时候，或是顽固地拒绝改革，或优柔寡断掉以轻心，直到大势已去，才想起政治改革来，但这时危机已经爆发，他们已失去了主导政治改革的资格，只能被历史洪流席卷以去了。例如戊戌变法，是清朝的机遇期。如果慈禧太后顺应历史潮流，实行君主立宪，清朝可能会走上日本明治维新的道路而不致灭亡。1945年下半年至1946年上半年是蒋介石国民党的机遇期，蒋如抓住国共两党共商国是的机会，不打内战，进行政治改革，与共产党组织联合政府，实行民主宪政，则不致被赶出大陆，中国就此建立起了良性循环的民主制度。

在机遇期内必须采取的一个重大步骤是客观地、科学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承袭“毛泽东晚年的思想”搞改革开放，必然阻力重重，反对声浪不断。承袭毛晚年的意识形态，改变毛的经济政策，政治上的“左”凸显了经济上的“右”。今日如果真要以毛晚年的是非为是非，各级领导干部现今可都是“正在走的走资派”。在意识形态领域必须确立改革开放路线的正统地位。必须彻底与困扰改革开放的极左理论体系告别，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回顾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如用毛泽东晚年思想去回顾和总结，必然得出“糟得很”的结论。

客观地、科学地评价毛泽东的是非功过，是意识形态领域一场深刻的革命。这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留给第四代领导人的伟大历史任务。完成这个历史任务，年轻的中央领导人能够从毛晚年的巨大阴影下面走出来，摆脱那种

瞻前顾后、谨小慎微的状态，占据历史舞台的中心，不卑不怯地拿出自己的理论、政纲和路线来，放开手脚，有所作为，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开创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一段太平盛世。

## 改革就是战胜自己

章立凡

温家宝在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结束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引用了王安石的名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媒体上一片叫好声，我却感受到一种隐隐的不安与悲凉。从商鞅到光绪，中国历代变法领导者的命运都是悲剧性的，天灾（自然灾害）、祖宗（僵化的意识形态）和人言（对改革的抨击分别来自左、右阵营），恰恰反映出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困境。

中国未来的希望在民间，改革必须有人民支持，在体制内阻力重重的情况下，执政党与民间的互动是非常必要的。改革应以建设公民社会为目标，没有公民起来监督，政改就只是一种体内循环，关门改革不会成功。

1949年以后模仿斯大林一套，消灭了传统的民间社会和地方自治，将党的管制渗入社会的每个细胞。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轮未能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结果出现了势力庞大的特殊利益集团，也从党政体制内部形成与之大体配套的权力寻租机制。政治体制改革的最难点在于：改革阻力首先来自执政党内部，有人说今日政治改革，最大的敌人是自己。目前从中央部委到省地市县甚至基层，都有各自的特殊利益，它们不仅与中南海博弈，同时还相互博弈。体制内耗严重削弱了中共的执政能力。

中共的民主宪政承诺，是抗战结束前开出的远期支票，超过一个甲子仍未兑现。邓小平在80年代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好，可惜因种种因素被长期搁置。有的中共元老曾经强调说，我们的执政地位是我们流血牺牲换来的，这显然是一种陈旧的血酬史观。这些中共元老的思想，可说没有走出中国王朝更迭的周期律。

中国在君主专制时代，百姓只须供养一家一

姓的政府，如果这种血酬供养超出了负担的极限，就会发生农民起义和改朝换代。而君主立宪设计的高明之处，是在承认“万世一系”的前提下，用宪法限制君主权力，改为依法永享血酬。

按照1949年新政协通过的大宪章《共同纲领》规定，政协是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将来须移交权力给“普选产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一目标历经58年仍未实现。《共同纲领》是共和国立国的法理依据，而自1954年迄今，全国人大代表的产生方式仍是“遴选”，不符合建国初期的共识。这种方式产生的人大，和我国现行人大制度的诸多不完善密切相关，人大很难监控政府预算，当然极难解决这么多严重的冗员和公款消费的积弊。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回顾1956年提出的“两院制”，当时是中共与民主党派领导人通过互动讨论，想让政协变成上议院并行使监督权，但1957年这个方案被否掉了。当今政协既是政权的一部分，又不是权力机构，还号称统一战线组织，究竟是“gov”还是“org”？是一个地位很奇怪的机构。数十年来，两会未能对政府实现有效监督，可说有亏职守。

我曾经提出过一个观点：腐败也是一种历史动力。解体是从内生腐败开始的，当腐败发展到一定程度，偶然的外力触发，也可能导致突然的崩溃。

腐败恰恰是寄生于政权命脉上的血瘤，随着宿主的发展而膨胀，危险系数也与日俱增。

我以为我们现在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仍在螺丝壳里做道场。可是历史的进程，往往不以个人或团体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我国政治体制现在仍在权力与财富的欲海中沉浮，极左的幽灵四处游荡，渐进式改革前景我以为是迷茫的。

《老子道德经》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如果中国的执政党能够战胜自己，接受普世价值观，加速实现政治体制改革，则中国社会有望健康转型。这里容我说一句忧心但不中听的话：历史留给我国政改的时间，恐怕不会很多了……



# 红卫兵运动兴起亲历记

刘晋

“红卫兵”最早起源于北京清华附中，当时我是清华附中的工作组长，我亲眼看到了红卫兵运动的兴起。

1966年6月1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批判学校教育路线的大字报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北京市各大中学校文化革命出现了高潮，学生自动罢课，领导组织瘫痪。

1966年6月3日，在刘少奇、邓小平同志的主持下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有北京新市委书记吴德和团中央书记胡克实参加，决定领导文化革命的八条政策，并把领导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的任务交给团中央。当晚在北京市委礼堂召集有关各单位领导参加会议，传达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

中央团校决定由我和滑隆同志参加这次会议，听取吴德和胡克实传达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报告。第二天6月4日上午，通知我和滑隆同志到团中央去参加紧急会议。胡克实同志讲：根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团中央决定成立领导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总团。他和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惠书昌任总团正、副团长，每个区成立分团。海淀区有六十六所中学是重点，也要成立分团，并决定由周杰、刘晋、滑隆为领导小组分任团正、副团长。

## 进驻清华附中建工作组支持革命

1966年6月4日中午，我即带领中央团校五位同志到达19中，了解了情况后，建立了工作组。经过几天的工作控制了局面。第五天6月8日中午，我接到总团胡克实同志的紧急电话。他说：海淀区清华附中部分学生已自发组织了革命组织“红卫兵”起来贴大字报揭发、批判学校领导

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但学校当局也组织学生保护学校当局。因为保学校当局的是多数，所以“红卫兵”受压制，处境困难。他要我立即带人去清华附中建立工作组支持文化革命、支持红卫兵、支持全校师生起来揭批学校领导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胡克实同志强调，清华附中是一个有影响的中学，是他亲自掌握的两个重点学校之一（另一个是城里的师大附中）。他要我每天晚上九点用直线电话向他汇报清华附中的情况。

我感到任务紧急又重要，立即带领五人直奔清华附中。我把带来的五位工作队员撒下去，要他们看大字报，找不同年级、不同观点的人谈话，了解情况。我自己在学校也转了一圈看大字报，找校长万邦儒问了问情况，然后又找“红卫兵”的头头了解“红卫兵”组织的情况。据他们讲：五月份校方要发展一位学习用功的、家庭出身是高级知识分子的学生入团，而王铭、卜大华、张小宾、邝滔生、罗小海等七个人（家庭出身都是高级干部）认为共青团组织应该执行阶级路线，不应该发展这个学生入团。为此，他们提出了批评意见，认为这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学校当局召开全校学生大会宣布：谁继续把矛头对准学校，谁就是反对校党支部，也就是反党。

当时这七个人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在夜里跳墙出学校到圆明园开会，并决定成立一个组织，起名为“红卫兵”，并以“红卫兵”的名义在6月2日写了一批批判学校当局执行“资产阶级”的教育路线的大字报。学校当局开紧急会议，组织学生写大字报进行反击。因此，几十个同学组成的“红卫兵”组织处于孤立状态。

6月8日，我进驻清华附中了解情况后认为，这种混乱的局面不能再继续下去。当即决定让学校通知在大操场开全校师生大会，我以海淀

区中学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和工作队名义，宣布成立清华附中文化革命工作组，负责领导清华附中文化革命工作，我兼任组长。我传达了北京市委“八条”并作报告，报告主要强调两条：（一）支持文化革命，支持揭批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二）要有领导地进行，要讲政策，即“八条”。我的报告受到欢迎。

群众运动起来之后，我立刻发现了一些违反政策的过火行为：对一位女体育老师的批斗；

要批斗一位高中二年级的女同学。因为她是北京市一位局长的女儿，她父亲被打成“黑帮”；初中三年级的同学要批斗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的女儿。我立即召开大会宣布：第一，不准冲击学生；第二，不准冲击老师；第三，对学校领导万邦儒只准动口不准动手。

清华附中的运动开展得比较正常。6月下旬，传达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文化革命的指示，主要精神是逐步引导学生“复课闹革命”，对各大中学校普遍成立的“红卫兵”要采取消化、溶合的方针，即把“红卫兵”中的头头，表现较好的，吸收到共青团领导机构中来。

### “红卫兵”写“造反有理”的大字报

当时中共中央对大中学校文化革命的方针政策与“红卫兵”的那种革命精神是相抵触、相矛盾的。不过，我当时还未清醒的认识到这一点。

我正在教学楼的走廊上看大字报，“红卫兵”的头头卜××和邝××拿了一张他们写的大字报给我看，并征求意见。根据记忆，大体内容是：我们要敢于造旧制度的反。要像孙悟空拿起金箍棒一样，敢于造旧制度的反，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使他们永世不得翻身。有人说我们过火了，我们不怕，我们就是要把这火药味搞得浓浓的……我看了后，当即表示了几点意见：一是，造不合理制度的反，揭发批判不合理的资产阶级教育制度是对的，中央也是支持的，但要讲政策，不能乱来。二是大字报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我要他们去读毛选，看看毛主席在这方面有什么论述，用毛泽东思想分析问题。

当时，这张大字报并没有引起我的重视。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对我要他们讲政策不能乱来不

满意，并说工作组保守了，后退了，他们开始与工作组有矛盾。本来这种大字报也是针对工作组的，但是我建议他们读毛主席著作，按毛主席指示办这一条，他们接受了。

6月24日清华附中出现了一些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后来知道，他们在1966年6月5日《人民日报》上，从一篇并不太引人注意的短文《汉弗莱的哀叹》中，找到了一段黑体字，即毛主席在延安庆祝斯大林诞辰60周年大会上的一段讲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经他们修改后，把“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张贴出来。我看到了，还是没有引起重视。真想不到，这张“造反有理”的大字报是那样符合中央文革的要求，并神通广大地经中央文革江青之手送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不仅对这些大字报加以赞扬，而且给“红卫兵”小将写了回信，这是后话了。

### 工作组和红卫兵发生矛盾

根据中共中央统一的布署，7月中旬以前各个学校要转入正规，因此胡克实同志要求我尽快解决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问题。我的方针是，让“红卫兵”头头中的两个人参加团委领导工作，张小宾为团委副书记，马某某为团委委员。这样一来，与“红卫兵”的矛盾就公开暴露了。

7月中下旬，陆续听到工作组被赶出学校，不少大中学校又失控。后来我们才知道，毛主席7月18日回到北京，批评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是束缚群众的革命手脚，这话又由特殊的通道传到高干子弟那里。但我们却蒙在鼓里，即使是团中央领导人也不知晓。我遇到的一件事足以说明。

那时我们还是想说服“红卫兵”的。我们去家访，通过家长作这几个红卫兵头头的工作。7月27号的夜晚，我们先到张小宾家，工作进展比较顺利。接着我们去×××家。×××父亲是解放军××学院副院长。我还是介绍了清华附中文化革命的情况，并希望家长帮助我们做工作，我的话还没讲完，这位副院长就打断了我的话，并神

气十足地讲：“工作组为什么不能反?! 团中央为什么不能怀疑?! 你们派到 101 中学的工作组副组长讲毛泽东思想可以一分为二……”用这种口气讲话，真使我大吃一惊，话是谈不下去了。

告辞后，我让车子立即开到团中央。我感到问题很严重，怕是中央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找到总团副团长惠书昌同志，向他汇报了××学院副院长说的话，并说出我的看法。惠书昌也感到问题严重，立即拨通克实同志家里的电话，让我汇报情况并说出我的忧虑。克实同志回答说，不会有问题，我们派工作组是少奇、小平同志亲自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决定的，会后还飞到杭州得到毛主席的首肯，你放心大胆地工作。

## 周杰被“罢官”

第二天 7 月 28 日我回到清华附中，晚饭后正在院子里看大字报，约晚上十点钟左右，突然院子里一帮学生高呼“周杰罢官了”，中央文革今天晚上在北京展览馆大会上罢了海淀区分团团团长周杰的官。这消息一传到清华附中，学校一下又热闹起来。一些学生把我围起来让我表态。我说我们执行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的方针和政策。我们工作组到学校里来，支持同学革命，我们工作组在清华附中的工作你们有目共睹。至于为什么中央文革派王力去罢周杰的官，我没有去参加会，不了解情况。我也是刚才听你们说的。我理直气壮地回答。

我把工作交给副组长回到团校，只有马石江同志在。他也莫名其妙，也在等消息。大约十多钟，北京展览馆的会开完了，周杰、滑隆二人回来。他们讲了一下情况：周杰正在作报告，突然某某中学的学生代表站了起来说：“我们学校工作组压制群众起来革命……”接着又有几个中学学生代表也站了起来提意见。但是有的学生代表不同意这种作法，也站起来说：“你们有不同意见可



毛泽东与红卫兵

以，但让周杰讲完嘛。”周杰同志赶快表态说：“先让提意见的学生代表把话讲完。”正在这时，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带着一些随从赶到北京展览馆会场，神气十足地走到台上，不问情况立刻宣布：“海淀区中学文化革命工作队队长周杰，压制群众起来搞文化革命，压制革命小将。我代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宣布，撤消周杰海淀区中学文化革命工作队队长职务，让群众自己起来革命，自己解放自己。”他还宣布，明天还在这里继续开海淀区中学文革学生代表大会，对海淀区文化革命工作队周杰进行批判，各中学作好准备。这就是所谓的“周杰罢官事件”。

后来我们知道，当天晚上北京师范大学在操场开大会，揭发批判校领导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江青、王力、关锋都去参加。这时在北京展览馆参加会的某中学学生代表跑到北师大操场主席台上对江青说：北展正在开海淀区师生代表大会，海淀区文革工作队队长周杰压制民主，压制革命群众。江青听后立即派王力去北展会场罢周杰的官，还要搞什么“揭盖子”，矛头对准团中央，要通过罢周杰的官打开缺口。

## 在胡耀邦住处开会

7 月 28 日夜里 11 点多钟不断传来消息，九一中学、八一中学、十一中学等学校开始打、撵工

工作组,说工作组是‘黑工作组’。胡克实同志让马石江、周杰、我和孙英立即去他那里。胡克实同志要我们到胡耀邦那里汇报情况。

我们有一年多没有见到耀邦同志了,1964年中央调耀邦同志去西北局任第三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但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还未免去。他回北京看病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开始,虽然胡克实同志是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总团团长,但遇到这种大事,他还是带我们到耀邦那里听听他的意见。

周杰把会上的情况汇报完后,耀邦同志开口了,谈了几点意见:“克实要立即把这情况向邓小平同志汇报。要坚信党中央,克实是在少奇、小平同志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接受任务领导中学文化革命的,派工作组也是中央决定并请示了毛主席。我看现在这种情况(指罢周杰官)很不正常,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要观察观察再说……”

“中央文革小组明天决定开大会继续揭发批判周杰,怎么办?”

“周杰同志继续去听听意见再说,团中央可以派一位书记去表示同意撤周杰的职务的决定。”

这时马石江说:“他们为什么这样胆大?谁是他们的后台?”

克实同志愤愤不平地讲:“他们,几个拿笔杆子的,懂得什么群众运动!”

我说:“这后果很严重,有几个工作组的同志被打,被撵的还要多,我怎么向工作组的同志们回答?”

“除了克实同志向小平同志汇报外,你们也可以把情况向中央反映嘛。”耀邦同志最后讲。

这后来被称为“关东店黑会”,没有开出什么结果。

第二天7月29日,周杰、滑隆照样去参加大会,站在那里被学生代表一个一个批判。团中央还派了书记处书记王照华表了个态:同意中央文革罢周杰的官。这次批判会规格很高,中央文革顾问康生、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还有王力、关锋都参加了。我因为头天的会议没有参加,所以不用去挨批斗,在团校“坐镇”,不断接到各工作组被批、被围攻、被打的电话,团校的工作人员

也非常气愤。

## 向毛主席写信告中央文革王力的状

马石江和我商量,写一封反映工作组现在被围攻、被打的信,送给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中央领导同志。信写好后由我和另一位同志送到北京展览馆,当时康生、陈伯达、江青正在那里开批判周杰的大会。我们天真地送到康生手里,希望他转给毛主席。

这封信不仅没有起到改变工作组被打被撵的作用,而且情况越来越严重。我把那封信打印成几份,由我带着工作组的几位同志到处去反映情况,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华北局、北京新市委。反映情况的目的是要求制止打、撵工作组。我坐车整整跑了两天,却如石沉大海,而中学生打人、撵工作组已发展到打“黑帮”(学校的当权派)批斗老师和出身不好的同学,局面进一步混乱。

后来我也被“罢官”,关牛棚三年。罪名是:

- 一、 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 二、 参加了“关东店黑会”;
- 三、 向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写信,告中央文革王力的状,实际上是告中央文革的状。

(作者系原清华附中工作组组长)

(责任编辑 杨继绳)

## 敬告读者

《炎黄春秋》2007年合订本已经出版,数量有限,有订购者请与我刊广告发行部联系。

另:我社2006年《炎黄春秋》合订本库存已全部售完,请不要再汇款,仅有2007年合订本,价格如下:

2007年精装 85元 简装 80元  
2007年下半年(7-12期) 45元

注:以上均免收邮费

汇款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

邮政编码:100045 电话:010-68532048

# 山西分社“清查”厄运追记

马明

近日，我在宿舍的书房里，翻阅多年积存的历史资料时，看到30年前打倒“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以后，山西省委主要领导同志召见新华社山西分社全体职工，发动清查“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的讲话复印件，不禁使我想起当年山西分社被列为清查重点单位的那段颠倒是非的史实，今天把它追记下来，为的是作为一面历史镜子，避免日后重复过去类似的错误教训。

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阴谋集团，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动乱。全国人民欢天喜地，奔走相告。“文革”中被打倒的山西省委领导班子恢复了工作，并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清查‘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的指示，在全省发动了揭批和清查“四人帮”帮派体系的斗争。

在这欢庆之际，令我高兴地想到的是，“文革”中强加给我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罪名，该纠正了，停滞10年的正常工作，也该恢复了。但是，出乎预料，事与愿违，不但前期劫难未了，反而又在清查“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中，成了“清查”对象，陷入厄运困境。

运动一开始，由于当时的山西省委主要领导同志捕风捉影，偏听偏信，在未经调查核实的不真实情况下，就在全省不少部门单位发生了清查扩大化的问题。其中，新华社山西分社被列为清查重点单位，深受其害，就是一个例证。当时的省委把山西分社确定为省委直接领导的清查重点单位，把包括我在内的7位领导干部和记者当作清查对象。

1976年11月14日和12月16日，省委主要领导同志兴师动众，亲自发动，先后两次把山西分社全体职工召集到省委常委会议室，他本人

在长篇讲话中，点人点事，把分社通过正常渠道向上级反映情况的《内部参考》稿，说成是“按‘四人帮’的要求另搞一套”，是“利用列席省委常委会的方便，搞特务活动”，指责分社记者“插手社会，为‘四人帮’提供炮弹，以山西的材料打击山西”。并把“反大寨”列为清查的一项内容，还把分社活跃报道思想开展多年的业务民主活动（后叫成“群众议政”），硬说成是“裴多菲俱乐部”、“海德公园”，属“资产阶级的东西”。

接着，置中央关于新华社分社领导体制的规定于不顾，按中央规定：分社由总社和省委对分社实行双重领导，是以总社为主的。分社领导班子一般由总社提出，征求省委意见商定。但是省委没有征求总社意见，就将原有的领导班子成员一律靠边站，另行指定了临时领导小组主持分社工作，又专门派由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陈新兰（原任大寨人民公社妇联主任——作者注）带领的清查联络组进驻分社指导清查运动，还违背有关规定查阅了一部分“内参”底稿。这样一来，山西分社成为山西省委直接领导的清查重点单位，这在全国省、市和自治区中是独一无二的。

在被清查的对象中，程度不同地涉及到分社领导干部和记者方言、马明、田培植、刘玉等7人，一次次地逼迫他们说清楚“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其中，有的同志是因为采写发往总社的“内参”客观地反映了各种不同意见和其他方面的一些问题，而被视为给“四人帮”提供了整省委主要领导人的炮弹；有的是被扣了莫须有的反大寨的帽子。

追查我的第一件事是，怀疑我给“四人帮”转过来信。事情的真相是，“文革”后期，有一段时间指定我在分社值班室，临时接待处理群众来信来访。有一次从邮局寄来让转给江青的一封来信，

信的内容是，看了《沙家浜》等样板戏的观后感。我按照当时的规定，把来信连同信封按照正常渠道，一起转寄总社国内部分社管理组处理。这件事的经过就这么简单，并不复杂。

当时江青是中央“文革”领导成员，加以“文革”十年我被夺权靠边站，对中央上层复杂多变的内斗情况知之极少，这样处理这封来信，完全是在情理之中，应该是无可挑剔。但是“四人帮”粉碎之后，突然就把这件事硬和清查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拉扯在一起问罪！

追查我的第二件事是，我和所谓的王体诬陷省委事件的关系。实际情况是，有一天，我在省煤管局附近的街上，偶然遇到省地矿局局长白天，相互寒暄之后，他顺便告诉我：王体在省委常委会议上，向省委和第一书记提了些基层群众的批评意见。因为白天是听说来的，没有说清楚具体内容。我回到分社后，无意中转述了这一情况。

不料被省委派来的清查联络组和分社临时领导小组召集人知道后，就被抓住不放，要我说清楚与白天、王体的关系和活动。我只能如实地说，白天是抗战后期和我在中共晋西南工委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王体我不认识，只知道他是全国煤矿战线上的劳模和省革委会副主任，至于他的其他情况，我不知道，也就无法说清楚。

1976年12月16日，省委召见分社全体职工时，讲到“王体他们说（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全面执行了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刮了右倾翻案风，全面复辟资本主义”。这一情况，我是第一次听到的，难怪我无法说清楚。不过这和我听到白天说的情况不一样。今天回想起来，一个文化水平不高的煤矿劳模，能不能如此高度概括出这样上纲上线的“三条”来？而且我想如果硬说“王体他们”说过这“三条”，也会是“文革”初期说的，不可能是在打倒“四人帮”后才说的。这是不是假借“清查”的机会，对“王体他们”编造算老帐呢？事态的发展正是这样，王体成了“清查”的重点批判对象，被关进看守所近三年。山西省委领导班子调整后，才为王体彻底平反了这次冤案。

另一件事是，上述省委主要领导同志把山西分社“群众议政”的好传统，硬说成是“裴多菲俱乐部”、“海德公园”，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这是不实事求是的歪曲和误解。实际情况是，早在上

个世纪50年代，我主持山西分社工作时，为了学习上海分社活跃记者报道思想的经验，在山西分社记者中开展了业务民主活动。实践证明，采取这种办法，曾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加强先进人物典型经验报道等方面，对调动记者的积极性和深化报道主题思想，都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文革”期间，我虽然“靠边站”，但是知道记者们为了准确地向上级反映派性武斗等复杂多变的事态发展，仍然通过召开情况分析会，开展业务民主活动，也就是“群众议政”。具体办法是，遇到需要经过总社向中央反映的突发事件，记者们分头深入第一线采访，从多方面调研。回来后，集体汇报，各抒己见，集思广益，求得共识。在这个基础上，由掌握情况较多、观点比较明确的一两位记者执笔写出内参，大家补充修改后发出。通过这种办法，采写的100多篇内参和赴京口头的汇报，对中央了解和解决山西多次武斗等事件帮助很大。

这样为集中大家智慧发扬民主的“群众议政”，和我国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当家作主，是顺理成章，一脉相承的，不应和西方的“裴多菲俱乐部”、“海德公园”相提并论，等量齐观。

对山西分社颠倒是非的清查，还表现在省委主要领导同志听信流言蜚语指责记者。1976年12月4日，在听取分社“清查”情况汇报会上，把总社从辽宁分社正常调到山西分社的记者廖由滨说成是（同“四人帮”有牵连的）“毛远新派来的”。记者冯东书曾在分社研究报道会上说过“不能提永远学大寨”。实践证明这话是正确的。但是，就在这次清查汇报会上，也被翻腾出来，直面向冯东书：“你说过‘不能永远学大寨’，你考虑过吗？为什么说这个话？是不是与不学大寨联系起来。”因为当时山西把对大寨的态度和不照搬大寨“左”的一套经验，列为清查的一个问题，于是冯东书那句正确的话，也就成了问题了。

尤其是对待社长方言，给他罗列了几条罪状，未经调查落实，也没有与总社联系，就动用公安机关，搜查了他的住宅和办公室，并把方言关进太原市公安局看守所，长达近两年之久。这种情况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是绝无仅有的。当时的总社副社长刘敬之和干部处负责人肖彦专门两次来太原，找省委商谈释放方言（下转第9页）

# 我知道的翼社 和中国托派

汪文郁

## 遭逢全国性的“肃托”大搜捕

1952年我是上海《解放日报》文教组的一名二十岁刚出头的年轻记者，那年冬天，因病正在职工休养所疗养。12月22日星期一晚上8时左右，突然有两个公安人员出现在我面前，顷刻间我被双臂反剪戴上手铐押上了一辆小吉普车，旋即又直驶新闻路我母亲家进行查抄。他们什么也没有抄到，一小时后，只拿了一条薄被子回到车上。午夜时分，当小吉普停下我被押下车时，在强烈的灯光照射下，只见眼前一片很大的操场上，正攒动着许多持枪的武装人员。操场的一边有座大楼房，敞开着大门，大门口也站着成群身着灰蓝色棉制服的便衣人员。一辆又一辆大大小小的吉普车陆陆续续驶来，一批又一批的人被押进这楼房。我在大门口被卸了手铐，拿上被褥，被押进楼房。

事情发生太突然了，没有想到我会被拘捕。在牢中，我思绪纷乱，坐卧不安，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时候，又被突然叫出牢房。当我挟着被褥出牢门时，只见日光高照，已经是第二天的上午了。操场上仍站着不少武装人员和便衣。我和十来个年龄相仿的人被先后押上一辆中吉普囚车，在警笛声中离开眼前的大监狱。囚车过了白渡桥后，并未驶向提篮桥上海监狱，而是沿着杨树浦路直驶，然后在上海发电厂附近拐入一条小巷，进入有武警守门的一幢小洋楼前停下。事情已明白：这是一次有计划的“肃托”行动。当时我以为只是发生上海，并不知道实际上是准备周密的全国性统一大搜捕。这里，和我在一起被关押的大约

有一百多人。其中大部分是高等院校的学生、中学教师、医院小护士、青年工人和几个失业人员。年龄都不满三十岁，有不少是温州人。他们中有的尚未进入社会，有的和我一样涉世不久，现在都当作托派嫌疑犯了。

不久，我们被集中在一间空房中。一个已记不清姓什么的班主任，语气平和地对大家说，政府办这个训练班是为了挽救一批人。要求大家在这段时间中认真学习，坦白交代问题，彻底与托匪划清界线，以取得政府和人民的谅解。今后还可以回到各自的岗位工作，回到学校读书。如果有人想蒙混过去，拒不交代，可以去提篮桥继续交代，直到交代清楚为止。每个人还发了一本名为《肃清帝国主义间谍托洛茨基匪帮》的小册子。

人民政府并没有像苏联斯大林那样滥杀无辜，而是网开一面，宽恕了一批人。被关押在学习班，与翼社有关的有五人。我暗暗地计算一下，可能还有五、六个人被关押他处。这样，在托派一案中被拘捕与翼社有关的竟有十多人，占全体社友的半数左右。令人吃惊的是，翼社中还出了俞硕遗这样的托派中央委员。

## 翼社本是一个自发的友谊性青年团体

翼社原是纯友谊性社团。在1946—1949年中国革命的激烈斗争中，曾先后两次被卷入政治漩涡。1948年11月，翼社中“托派问题”的发生，使不少社友迷失方向，失去了投奔革命的机会，并在这一次肃托中身陷囹圄。

我是翼社社友，曾亲身经历了前后两次灾

难。

我在 1946 年就读于上海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夜校部,同时在校长顾执中办的民治通讯社当记者,半工半读。在国共两党激烈斗争中,曾和广大同学一起参加了反蒋、反美、要和平、争民主的学生运动。1946 年 10 月,民治通讯社被国民党淞沪杭警备司令部查封。同年 11 月,经同学介绍,被上海《学生日报》聘为特约记者。仅仅时隔一个月,这家报社也被查封了。以后,《学生日报》总编辑鲍敬文进了《文汇报》当文教版编辑,曾打算介绍我到那里工作,不料 1947 年 5 月,《文汇报》也被查封停刊。经过多次往来,我与鲍敬文、蔡大雄等开始熟悉起来。1947 年 5 月,我被同学选为全校学生级联会夜校部主席,积极地投身到火红的学生运动中。不久,我突然胃出血病倒,贫病交迫,无钱就医,幸亏得到鲍、蔡两人的帮助,被送进医院治疗。事后知道,为我支付医院住院费和医药费的是翼社社友羊聪。他与我并不认识,单凭蔡、鲍两人相求,就伸出了援助的手。

这时,我才开始知道翼社的名字。翼社是由一群青年人自发组织成立的纯友谊的小团体,它的发起人和主要成员鲍敬文、蔡大雄、羊聪、沈一全、姚轶群、俞硕遗原是东吴大学附中的同学,他们都酷爱京戏,喜欢在课余时间聚在一起哼几句。以后大约有了二十多个社友,都是这些发起人的朋友、亲友和同事、同学。其中还有些社友是蔡大雄执教各中学的高中生,都是当时学生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大多数社友倾向了反美反蒋的民主运动。1947 年 5 月,我由同学韦以群和蔡大雄介绍,经过社友大会通过,参加了翼社。

1947 年 8 月,因家庭困难,我与蔡大雄和蔡的学生、老家在扬州的社友夏中瑞 3 人住进威海卫路 587 号富通印刷公司内原《学生日报》经理部的一间空房内。这里存放着《学生日报》的上千册图书。其中有不少是文学经典著作,也有解放区作家赵树理、李季、丘东平、刘白羽等的著作。这里也就成为翼社社友间图书流通和朋友们相聚的地方。

9 月 19 日下午 5 时左右,我在愚园路上海幼儿师范学校参加学联集会回到住所时,只见我们的房内已一片零乱,蔡大雄、夏中瑞和俞硕遗、余裕明、韦以群都呆坐在一起。国民党“中统”特

务在秘密逮捕二楼富通印刷公司人员时,竟将我们也同时逮捕了。这就是当时震动上海的“富通事件”。这一案件涉及翼社被秘密逮捕的有十三人,是翼社第一次被卷进了政治旋涡。我一生中第一次戴上手铐,被当作共产党嫌疑,投进了大牢。

1948 年初,我们陆续出狱后,翼社发生了变化:原来的社长鲍敬文及和他一起的社友与翼社断绝了联系;社友潘秋月、程亦凤是中共地下党员,由于“富通事件”,她们出狱后就去了解放区;蔡大雄仍被关在特务机关牢内;翼社的发起人之一的俞硕遗就成了这个小团体的核心人物。我们几个被逮捕过的人,出狱后都想找中共地下党的关系,投身革命。俞硕遗也曾与余裕明、岑小昀和我商量过,准备将翼社转入地下,通过电话簿上的地址,从邮局散发油印传单,进行反蒋的革命活动。第一期传单的内容拟定为《翼社的 9·19 事件教训》,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专制、残酷统治,希望从中找到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关系。这种想法是很幼稚的,翼社是个无名的小团体,有什么地上地下的。

我走出国民党特务机关牢狱,就被民治新校方开除。当时父亲已五十多岁,因为失业,只身飘洋过海去太平洋美国关岛基地做苦工。母亲仍以女红收入为生。我处于失学失业状态,生活艰辛,精神困惑,我急切地想找到中共地下党的关系,可是人海茫茫如何寻找?这年 11 月间,我发现俞硕遗与社友羊聪、姚轶群、孙一全,还有俞的外甥邹一德常在一起,听说他们想翻印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这引起我的好奇和兴奋,以为他们已找到中共地下党了。有一天见到余裕明时便问起此事。余悄悄地告诉我,他们在搞托派活动。

这之前,我从未听到过“托派”两字,不知道托派是什么。余裕明就告诉我,托派是苏联共产党内的一个派别。托洛茨基是俄国十月革命中的红军总司令,也是联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列宁去世后,他被斯大林打成反革命。不仅被斯大林派人暗杀了,而且连他的妻子和儿女也不放过。

如此骇人听闻的事,使我大吃一惊,没有想到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会发生这样的事,于是我找到俞硕遗想探问一个究竟。因为他在翼社中

是一致公认的诚笃忠厚的正派人。他的回答是：托派是好是坏，历史会做出公正的结论。只是斯大林把一切都弄颠倒了。托洛茨基领导了1917年的十月革命，以后又担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建立起一支红军，在两年半的内战中粉碎了英、德两国支持的叛乱部队，拯救了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托洛茨基应该是捍卫和拯救苏维埃政权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英雄，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带头人而不是反革命。大家和我一样，对苏联共产党内的斯、托两派之争，弄不清谁是谁非，谁对谁错，对托洛茨基的理论也是半信半疑，只是对托洛茨基的不幸遭遇产生了一股同情之心。

## 托派人士的讲话使我们迷失方向

那时，人民解放军已在辽沈、平津及淮海战役中相继取得重大胜利，1949年初蒋介石宣布“下野”退居幕后指挥，李宗仁上台同意以中共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一时间，国统区内出现了一些政治和缓气氛。明眼人清楚，这是国民党反动派的一种虚伪的政治欺骗。翼社中有人想不通了，俞硕遗就组织了一次时事座谈会。一个星期日下午，岑小昀借用圆明园路基督教青年会学生救济会三楼会议室，为座谈会提供了既清静又安全的场所。开会那天，大部分社友都冒着被国民党反动派捕捉的危险前往参加。

俞硕遗请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据说曾留学苏联，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因坚持自己信仰被开除出党后来到上海的托派负责人之一的王先生。他大约四十岁上下，中等身材，面容清瘦，鼻梁上架着一副玳瑁架的近视眼镜，西式分头的两鬓已显露几丝华发。他身着一套浅灰色西装，裤子的臀部留着一个小小的补丁，神态自若，有学者风度，看上去是一位清贫自守、信仰坚定的革命志士。我从未见过人们所说的职业革命家。现在能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中见到虽与中共政见不一、但却共同信奉马列学说的托派领导人，心情十分激动和崇敬，也十分好奇，一心想听听这位革命者对当前政治形势的一些看法。

俞硕遗简单介绍后，王先生开口了，他的谈话带有浙江口音。讲得比较分散，不成系统。归纳起来，大致是这样：

他认为，当前的国共和谈有可能达成某些协议，这跟中共长期在农村搞革命有关。在农村建立根据地久了，就会有大批贫下中农涌进党内，他们会把农民的落后意识，落后习俗带进党内，共产党就会农民意识化，革命就会像历史上农民起义，没有胜利的希望。他说，1853年马克思对中国的太平军起义，曾经寄予期望，可是十年之后，太平军攻下南京后，他了解了太平军的事实真相后，失望了，就曾在书中写道：除了改朝换代，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因此，王先生认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应该走十月革命的道路。

谈到鲁迅，他认为作家是要有自由的，也是独立的。鲁迅在广州时就不受哪个党、哪个组织的指挥。如果他还在世的话，相信他绝不会写出歌功颂德的文章来。

他的话一下子把我们全都弄蒙了。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使我们的思绪顷刻间变成了跳跃不停的浪花，扰乱了我们对当前中国革命的原有认识和向往。难道中共领导的革命真的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可是事实又否定了我的一些疑问，因为全国各大城市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中掀起的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等群众反蒋的爱国运动，不都是由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的？我与翼社的许多社友一样，没有否定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也没有肯定托派的理论。我们都被牵进了思想迷宫，分辨不清东西南北了。

我们中有人认为，中国革命如果按托派的说法要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话，那就涉及到一个重要问题，当前中国社会性质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大家争论不休。俞硕遗就组织大家分甲、乙两组进行理论学习。甲组学习的是邓初民的《社会发展史》；乙组学习的是《辩证唯物论》。据说，参加甲组学习的社友，在对当时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上争论得很厉害。多数人认为，中国社会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而俞硕遗却说中国早在明朝时就有商业资本的存在和发展。经过商业资本的长期侵蚀，加上国际资本主义入侵中国后，资本主义不但在城市替代了封建残余，而且已深入到了农村，商业经济已支配了农村的经济构造。他又举例说，中国农村过去照明用的是灯草和桐油、灸纸。自从使

用了火柴、煤油和汽油后，工业产品进入农村，农村也就随着城市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他的这种说法，令人感到滑稽，但似乎谁也说不清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生、发展、渗透和作用。大家只是相信俞硕遗为人，相信马列学说，才半信半疑地接触了托派的一些理论。这两个学习小组，大约相聚了三四次就自动散伙，谁也不想再在桐油灯和煤油灯之间钻牛角尖了。

1949年1月间，俞硕遗准备召开翼社社友大会。会前，余裕明告诉我：俞硕遗想通过社友大会，以翼社名义去参加托派即将在上海举行的统一大会。据说托派内部有多数派和少数派两派。我们接触的是少数派。而托派中两派的形成，是由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大家在对中国抗日战争性质的重新认识上产生了分歧，便有了两派。又说托派是讲民主的，允许有不同意见的存在和争论，以通过争论来达到内部的团结和统一。当时，俞硕遗的这一想法，使翼社多数社友感到意外。因为翼社的多数社友当时对托派虽有同情，但并不等于相信，更不清楚什么多数派少数派。如果以翼社名义去参加托派的会议，显然不能代表全体社友的意志，因此，我们都向俞提出劝阻意见。俞硕遗接受了大家的意见。

托派问题的发生，使这个社团又经历了一次思想分歧的变化。当时，一部分社友对托派不理不睬，保持距离；有的已跟着俞硕遗开始热衷于托派的理论；我和姚轶群、袁旭等则始终半信半疑，主要是看不到托派的群众基础和它的革命前途。翼社从此也就名存实亡了。后来，由孙一全的透露，我才知道：1949年2月俞硕遗没有以翼社名义去参加托派的统一大会，而是与羊聪、邹一德、孙一全、严西成五人以“革命马克思主义派”参加了这一会议，其他人全被蒙在鼓里。

### 摆脱了影响，却走不出阴影

1949年5月，上海的解放使我精神振奋，压在我们头上的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统治，终于被共产党推翻了。眼前的事实使我认清一个问题：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是中共不是托派，托派所说的一套完全是不切实际的空谈。这样，我理所当然地投入了向往已久由共产党领导的革命

洪流，报考进华东新闻学院。同年12月，我被分配到《解放日报》工作，是共产党将我这个一无背景、二无靠山，已沦为社会贫民的穷学生送上工作岗位，我感受到翻身的喜悦。

1951年镇反运动开始后，托派问题成了我的心病。我经过严肃认真的考虑，将自己与托派和翼社的关系和盘托出，毫不保留地向报社党组织作了交代。镇反运动过后不久，有一次见到余裕明时，他告诉我：翼社社友、托派成员严西成因为勾结国民党反动派一些残余武装分子，企图在某地建立武装根据地而被公安部门抓获，镇压枪决了。这一消息使我十分震惊。托派是信奉马列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现在竟沆瀣一气，企图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岂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托派问题既已由党内问题成为反革命问题，那么我与翼社中托派的关系岂非由朋友变成“匪帮同伙”了吗？

1953年7月3日，我终于在报社人事科长带领下走出公安局学习班大门，从此处在千夫所指的逆境中讨生活。尽管我只是个托派同情者，没有被判刑坐牢，但已等同社会上的刑释分子，到处受人歧视。我像一名脸上刺着金印的发配犯，永远不能抬头见人。虽曾一度由报社机关学校的文化教员调到报社编辑部工作，但在“反右”斗争结束后，还是被精简下放到农村劳动，先是在上海郊区，继而被支边去青海。从此被赶出了上海城市，也被清洗出了新闻队伍。对此，我并没有什么很大的情绪波动，因为经过拘捕审查和现实生活中的羞辱和歧视，我已经渐渐失去个人的欲望和追求，甘心从事长期的劳动了。

几年以后，翼社中的余裕明被释放了。他告诉我，翼社社友中因托派问题被判刑的有：他本人被判五年；孙一全被判五年，后加十年；岑小昀被判十五年；俞硕遗已当上托派中央委员，没有判刑，和托派领导人郑超麟一样，被监禁。羊聪去了台湾，邹一德去了国外。以后又听说，俞硕遗因神经错乱被送进医院。

五十年来，“托派问题”如同梦魇一样缠身，使我失去了青春年华、远大理想和向往革命的追求，而是变成了一个时刻想到有罪在身的小人。“文革”浩劫后，头脑渐清醒。我感悟到斯、托之争，归根到底是苏共内部的权力之争，让成千上

万的无辜者牺牲在斯大林的屠刀下。1988年8月,苏联最高法院为托派冤案平了反。几个月后,苏联解体了。对此,我没有喜悦而是感到悲哀。因为如果没有这一场血流成河的大惨剧,苏联的历史可能不会如此写法。

中国的托派是一场时代悲剧,长期受到种种诬蔑、中伤和残酷地迫害。它的成员在十分险恶的处境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向往中国革命的前途。只是他们往往是书生气十足,不切实际、坐而

论道的空谈。我这个平凡的人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悲剧中,成了一名无辜的受害者。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党委2004年9月29日给我此前供职单位的公函中,明确写明“经查阅,档案中没有关于托派成员的定性和处理”;这么轻轻的十几个字,却是我至今也并没有完全弄清楚是怎么回事的梦魇,沉甸甸地缠了我五十年。

(作者为上海离休干部,上海市作协会员)

(责任编辑 杨继绳)

书 名	作者或主编	定价	邮 费
季羨林自传	季羨林	45.00	7.00
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	邢同义	24.80	6.00
经历——我的1957	和凤鸣	29.00	6.00
丁陈反党集团冤案始末	李向东 王增如	34.00	7.00
河南大饥荒	宋致新	22.00	5.00
淮海战役秘密战	夏继诚	33.00	7.00
辽沈战役秘密战	松 植	35.00	7.00
平津战役秘密战	松 植	36.00	7.00
人生至理的追寻	梁漱溟	35.00	7.00
透视当代中国重大突发事件(上下)	程美东	68.00	8.00
综合哲学随笔	高亮之	22.00	5.00
牛棚杂忆	季羨林	29.00	6.00
日记的胡适	李伶俐 王一心	29.80	6.00
张国焘传	姚金果 苏 杭	39.80	7.00
在“五七干校”的日子	唐筱菊 陈少铭	38.50	7.00
红墙见证录(上、下)			
——共和国风云人物留给后世的真相	尹家民	69.80	8.00
学问人虫(上、下)——中国社科院名家谈		79.00	8.00
庐山会议实录	李 锐	18.00	5.00
赫鲁晓夫回忆录	(俄)尼基塔·谢·赫鲁晓夫	29.00	6.00
沧桑十年——1966—1976 共和国内乱的年代	马识途	38.00	7.00
是药三分毒	刘弘章	38.00	7.00
命运与使命——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世纪回眸	冯建辉	29.80	6.00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张素华	28.00	7.00
季羨林谈读书治学	季羨林	19.00	5.00
红墙大事——共和国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上下)	张树德	69.80	8.00
普洱茶健康之道	周红杰	39.80	7.00
松针养生革命	董看看	39.80	7.00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 编:100045 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  
 (注:邮购三本书以上,可按总书价的10%付邮费)

## 代购代邮

历史是一面镜子。读史可解惑,可益智。本社对读者函询较多的有关图书,开展代购、代邮服务。

《透视当代中国重大突发事件》叙述了1949-2005年间中国重大突发事件的发生过程及其深刻经验教训。书中收集的突发事件每一个都具有标志性意义,第一次农村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共和国史上第一个导致副总理被处分的“渤海二号”石油沉船事故;第一个导致部长被撤职的1987年大兴安岭火灾……

《沧桑十年》在中国历史上的那场空前灾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今天的年青人已难以置信,那些曾受过迫害的人有的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作者真实、公正、客观地写下了当年的遭遇,给后人留下宝贵的教训,目的是杜绝惨绝人寰的悲剧重演。

《经历——我的1957》这是一段沉重的历史:1957年的反右斗争,作者和丈夫共同被划为右派分子,劳动教养。在1960年的大饥荒中,丈夫被活活饿死在甘肃酒泉夹边沟劳教农场里,作者的大半生经历了家破人亡的不幸和痛苦、受尽各种凌辱委屈,经受了—一个女性所难以承受的各种情感遭际与心灵创伤。这是血和泪写就的历史。

《日记的胡适》胡适自16岁开始,直至去世的前三天,共留下二百多万字的日记。从日记看胡适,这位中国新文化的弄潮儿与代表人物展现给我们的,必定不只是他人生中精彩的一面,或许更多,我们将看到隐秘于那些琐碎文字背后映射出的个性和真实自我,那便是一番别样的风景了。

# 夏明翰就义八十周年祭

汤益民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这首气吞山河的壮丽诗篇，是我党历史上著名的革命烈士夏明翰同志，在英勇就义前留下的。夏明翰是我党早期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的卓越领导人之一。80年前，他留下的这首就义诗，是他大无畏革命精神的生动写照，也是他留给后世的宝贵精神财富。

夏明翰，字桂根，湖南省衡阳县洪市镇礼梓村和家组人。1900年农历八月初一日，夏明翰出生在他父亲任知县的湖北省秭归县。夏明翰有四个兄弟和四个姐妹，他排行第三。夏明翰的童年是跟随祖父、祖母在湖北、江西等地度过的。夏明翰12岁时，全家回到湖南衡阳，由他祖父高价租住在今衡阳市湘江东岸一座古色古香的深宅大院里。

当时的夏家，书香门第，世代为官。祖父夏时济是清光绪壬辰（1892年）科进士，曾任京官。外祖父陈嘉言曾中进士，任过翰林院编修。夏明翰的父亲夏绍范，衡阳县学优增生，以优贡入仕，1901年钦加三品衔，任州、县一级官吏凡13年，清廉正直。他1903年，东渡日本，考察政务，思想开明，拥护变法维新，向往科学民主，参加了伟大的辛亥革命，1914年不幸因病壮年（终年45岁）早逝。夏明翰的母亲陈云凤，能诗善文，武艺高强，1922年当选为衡阳县参议员，成为衡阳县历史上第一个参政的女性，不仅是才女，也是巾帼英杰。她支持儿女们冲破封建传统网络，让儿女们自己选择人生之路。夏明翰在开明慈爱的父母身边长大，童年、少年时代就养成了善良、刚强、自立、向上的优良品质和性格，养成了爱读书、勤思考的习惯。他不以“夏府少爷”自居，经常做些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情，比如扫地、挑水等等。

1917年春，夏明翰考入湖南省立第三甲种工业学校（校址在今衡阳江东区湖北路）机械科第一班。他满怀“工业救国”的理想来这里学习，但目睹军阀统治下的黑暗政治和民不聊生的景象，心中充满愤懑情绪，组织了革命团体“砂子会”，并用诗歌和绘画，揭露军阀卖国贼的丑恶嘴脸，宣传反帝爱国思想。一次，同学们在一起作画，夏明翰铺开一张纸，挥动画笔，几笔便勾出一个凸眼阔嘴，长臂矮身，身着军服，佩着短剑的奇形怪状的人跪在地上，高托一个装有“大好河山”的盘子，向一只黑手送去。同学们不解其意，他挥毫写出一首讽刺诗：“眼大善观风察色，嘴阔会拍马吹牛，手长能多捞名利，身矮好屈膝磕头。”标题“军阀形象”。这一张诗画把军阀丑态刻画得惟妙惟肖、淋漓尽致，同学们不由得一起放声哈哈大笑。他同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校址在衡阳江东岸晏家坪）学生蒋先云等组织“衡社”、“湘滨诗画社”等进步团体，以诗歌漫画揭露军阀政客的丑恶嘴脸，成为学生运动的带头人。

1919年“五四”运动波及衡阳后，夏明翰、蒋先云等联络教育界和工商界，以衡阳、耒阳、郴（州）、桂（阳）各界人民名义通电全国，声援北京学生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斗争。他带领一个演讲团，经常到各地演讲宣传。他们的演讲宣传，常常是“讲者声泪俱下，听者掩面而泣”。6月17日，湖南学生联合会在衡阳成立，夏明翰当选为湘南学联第二任总干事，主编和发行《湘南学生联合会周刊》。

在查禁日货的斗争中，夏明翰首先发动自己的弟妹夏明震、夏明霖、夏明衡等，把祖父藏在夹墙中的日货都搜出来烧掉；然后，与同学们一起，商同各界人士，到各处清查日货，并把查到的日

货，特别是那些大奸商的日货，集中到湘江边的空坪上，举行声势浩大的焚烧日货大会，用纸捻点火，把日货付之一炬。当时称火柴为“洋火”，故点火不用火柴，而用纸捻。

夏明翰这些活动，触怒了一些富商绅士，他们纷纷要求夏明翰的祖父对夏明翰严加管束。为此，夏明翰被爷爷关到一间小屋里。爷爷声称：夏明翰一日不悔过，一日不准见天日，如果再不老实，就把他沉潭。后来，夏明翰在母亲和弟弟夏明震的帮助下，破窗跳出，然后砍倒后院的一棵桂树——这棵树被爷爷看成是象征官运亨通、家庭兴旺的宝树。从此，他离开了夏府，再也没有回来，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

1920年秋，在何叔衡的帮助下，夏明翰来到长沙，认识了毛泽东，先后在通俗报馆、文化书社、船山学社等处工作，并进入毛泽东等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学习，兼任《湖南学生联合会周刊》的编辑。1921年，夏明翰经毛泽东、何叔衡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2年9月，夏明翰任湖南自修大学补习学校教务主任。10月8日，夏明翰发动了长沙人力车工人的罢工斗争，并取得了完全的胜利。1923年长沙发生日本水兵枪杀中国工人、学生的“六一”惨案，夏明翰与郭亮以“外交后援会”名义在省教育会坪召开了有6万人参加的抗议大会。因此，湖南军阀、省长赵恒惕不仅通缉夏明翰等人，还于1923年11月，以自修大学及其补习学校“所倡学说不正，有碍治安”为借口，查封了湖南自修大学及其补习学校。中共湖南省委为掩护革命活动的开展，遂在长沙创立一所正规中学——湘江中学，校长何叔衡、夏明翰名义上任数学教员，实际上任湖南省学生联合会干事长和《湖南省学生联合会周刊》第一编辑。

1924年，夏明翰担任了中共湖南省委委员，负责农委工作。他经常深入农村调查研究，了解农民的生活情况。1925年，夏明翰又兼任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长、农民部长、长沙地委书记。他很注意农运干部的培养，在各县开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县、区培养了成千上万的农运骨干。他还选送了一批革命青年到广州“农讲所”学习。为了加强基层的农运工作，他动员自己的弟弟夏明震、夏明弼和妹妹夏明衡回家乡衡阳县开展农民

运动，使衡阳县农民运动很快蓬勃地开展起来。

1926年农历二月初四日，夏明翰与长沙湘绣女工郑家钧结婚。郑家钧心地善良，性格文静，但又非常正直坚强，敢作敢为。她非常钦佩夏明翰的学识和胆略。在这一对新婚夫妇的房里，仅摆着一张床、一张方桌和几条长板凳。这天，李维汉、何叔衡、谢觉哉等同志前来道贺，他们在帐帘两边挂一副别出心裁的描绘他俩至诚相爱的对联：“世上唯有家钧好，天下只有明翰强”。这是因为夏明翰平日提到家钧时，总是连声说：“家钧好，家钧好”的缘故。

1926年12月，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和工人代表大会联合召开，会议由夏明翰和郭亮共同主持，请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到会指导。

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夏明翰陪同毛泽东，步行1400多里，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五个县的农民运动情况，并承担了大量的组织协调、调查研究、文书起草等工作。同年2月，夏明翰接到毛泽东的信，到武汉担任了全国农民协会的秘书，兼任毛泽东的秘书和毛泽东举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秘书，并在农讲所授课。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夏明翰怀着满腔悲愤的心情，挥笔写下了“越杀胆越大，杀绝也不怕。不斩蒋贼头，何以谢天下”的短诗以明志。夏明翰遂毅然投笔从戎，参加了第二次北伐的革命军，在邓演达主持的政治部里任宣传部长，并随军开到了河南前线。

1927年6月，党又将夏明翰调回湖南工作，继续任省委委员兼组织部长。这时中共已被迫转入地下活动。为了保守党的机密，做好党的工作，夏明翰夫妇不得不经常变动住宿地点。在同年的七、八两个月中，他们先后搬迁住房十几处。

党的“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从武汉赶回湖南。8月16日，夏明翰参加了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秋收起义计划的沈家大屋湖南新省委会议。在震撼全国的秋收起义中，夏明翰主要负责联络工作，他经常装扮成农民、商人，向党的基层组织宣传、组织秋收起义。他还鼓励自己的亲人，参加武装斗争的行列，征得党组织的同意，他派七弟夏

明霖到衡阳,五弟夏明震到郴州,四妹夏明衡到衡山,组织领导起义。后来,他的这三个弟妹均在起义中先后英勇牺牲。

10月,中共湖南省委派夏明翰兼任(平江)、浏阳)特委书记,他又组织了平江、浏阳暴动。

1928年初,党中央调夏明翰去湖北省委,参加省委领导工作。3月18日,由于叛徒告密,夏明翰不幸在武汉被捕。当时,敌人以为这个共产党要人的住处一定会有大量的金银财宝,一个个争先恐后地到他住处搜查,结果仅仅找到一只手电筒、一块怀表和一副近视眼镜。

夏明翰被捕后,只两天就遇害了。在狱中,他同审讯官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敌人假惺惺地劝夏明翰不要固执,要他为自己年轻的生命、贤慧的妻子和可爱的孩子三思。他放声大笑,回答说:“我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已不是三思而行,而是百思已定的了。”他在狱中受尽酷刑,但未向敌人透露半点党的秘密。他用半截铅笔,分别给母亲、大姐和妻子写了三封遗书。在给妻子

郑家钧的信中写道:“我一生无愁无泪无私念,你切莫悲悲凄凄泪涟涟。张眼望,这人世,几家夫妻偕老在百年?抛头颅,洒热血,明翰早已视等闲!‘各取所需’终有日,革命事业代代传。红珠留作相思念,赤云(夏明翰的女儿)孤苦望成全,坚持革命继我志,誓将真理传人寰!”郑家钧没有辜负丈夫对她的期望,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下,她对革命毫不动摇,为革命做了很多工作。解放后,她也一直过着俭朴的生活,从不向党和国家要求照顾。她逝世前,还在遗嘱中写道:“死后不收圈,不收祭帐,不要浪费国家一分钱。”

1928年3月20日清晨,武汉上空乌云密布,烟雨濛濛,江风阵阵,敌人押着夏明翰来到汉口余记里刑场。面对敌人的枪口,夏明翰昂然而立。敌人问他:“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夏明翰大声说:“有,拿纸笔来!”他用带着镣铐的手,拿起毛笔,饱蘸浓墨,在一张雪白的纸上,写下了本文开头所述的四句气壮山河的就义诗。

(责任编辑 吴明)

(上接48页)想理论界发生的一切冤假错案,尽管都是某些掌握了权力的个人所为,但本质上是制度问题。几十年来,意识形态总管换了一任又一任,这样那样的文字狱仍未间断过,就是证明。要想杜绝或减少这类事件,只有认真地进行政治改革。中国的事情,只有彻底根除人治的祸害,而实行真正的民主法治,即实行宪政民主,才有希望。否则,说得再好,都不过是假话、大话、空

话、废话而已。

如果能从这桩公案和其他种种冤假错案中,多少吸取一些教训,使理论界、知识界不再发生文字狱,使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这些基本的人权和公民权逐步得以实现,那么,再做周年纪念的时候,我们就有可能带着会心的微笑,告慰若水先生的在天之灵了。

(责任编辑 杨继绳)

## 按需出版

按需出版是最新的数码出版方式,它有三个优点:解决由于印数少而不能出版的问题(50本起印)。即需即印,总是新书,零库存。避免资金一次过多投入造成浪费。

适用范围:

个人著作(小说散文诗歌自传等等);家庭、家族需要保存、传世的专辑、画册;单位或个人旧书翻新重印;单位少量用书。

印数:100册以下最合适。

资金投入:自费。

以20万字288面、规格大32开本为例,50本一般在4600元左右(黑白单色)。彩色及详细报价可电话或信函咨询。

## 继续征稿

稿件内容文责自负,但不符合我国出版法规的不能出版。没有书号,不能销售,仅作为留世和赠送。

纸张:60克双面白胶版纸(黑白单色),印刷质量上乘。

我公司也可代作者联系出版社,出版可供市场发行的著作。

所有出版的图书均事前签订合同。

公司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清缘西里小区1号楼1509号,邮编:100085,热线:010-59870796,陶女士。北京地区上门服务,送书到家。

北京文苑文化发展公司

2008年3月

# 王若水在人道主义与 异化问题争论中

张显扬

若水先生离开我们(2002年1月9日)六年了。一想到若水先生,我眼前就浮现出20多年前那桩惊心动魄的真理与权力抗争的公案。今天,我们回顾这桩公案,再现当年的情景,从中吸取一些教训,也算是对若水先生的一种纪念。

—

若水先生作为哲学家,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这倒主要不是因为他参与了建国以后几乎所有的哲学论争,甚至也不是因为他那篇著名的《桌子的哲学》,而是因为他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并因此而与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意识形态总管的胡乔木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这是他一生哲学生涯中最重要、最辉煌的篇章。王若水之成为王若水,成为不畏强权、坚持真理的楷模,就在于他在那场冲突中表现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镇定自若的智者风范。

在对10年文化大革命和此前17年历史的痛切思考中,若水先生深刻地领悟到人道主义的价值,决心把长时期来被所抛弃、践踏的人道主义思想,从马克思、恩格斯尘封的著作中发掘出来,给它以应有的地位,并把它作为一种价值标准,应用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他呕心沥血,连续写出了《谈谈异化问题》、《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等文章。为此,被胡乔木视为离经叛道,而大加挞伐,直至撤职罢官,从中国共产党内除名。

整个斗争,可谓相当激烈。

凡是亲历过那场斗争的人都清楚地记得,那远不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一边是手握上方宝剑、对理论界拥有生杀予夺大权的胡乔木,一边是单枪匹马、无权无势的若水先生。除了真理,一

切可以用来斗争的手段,都在胡乔木一边。胡乔木1984年1月那篇错误百出的文章《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一发表,全国上下,立即掀起了一股吹捧的狂潮。一时间,胡乔木成了理论圣人,只准顶礼膜拜,不准说半个不字。与此同时,那些专看上司眼色行事的御用文人,就像马克思当年痛斥过的“无聊的下流作家”一样,肆无忌惮地对遭到冷遇的人们百般侮辱。可以想象,当时若水先生要承受多大压力。可是,他不但没有屈服,反而抖擞精神,写出了《关于革命人道主义》和《我对人道主义的看法》两篇雄文,进行了英勇的反击。这样的斗争态势,只有五十年代马寅初先生的“人口论”对毛泽东的“人手论”的抗争可与媲美。

胡乔木从送审稿中看到了若水先生的反击,恼羞成怒,亲自揭去了自己信誓旦旦地许诺过的“欢迎讨论”的虚伪面纱,下令不准发表若水先生的文章。后来,胡乔木得知若水先生的文章在香港《镜报》发表以后,认为这是“严重政治事件”,不惜动用国家安全部门进行追查,甚至要把若水先生与所谓“地下组织”联系起来,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很难想象,在一个多少讲点民主法治的国家,会出现这样荒唐和残酷的文字狱。

二

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二十多年,若水先生去世了,胡乔木先生也早已作古。重提这桩公案,主要不是要褒贬什么人,而是要明辨是非,以便从中吸取教训。我向来认为,胡乔木的所作所为,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事情,而是我们这个制度所固有的机制使然。作为意识形态总管,胡乔木十分自觉地扮演着“现实社会主义”的卫道士的角色。他

的使命就是不顾一切地从意识形态上捍卫这个制度,不使它有任何闪失。至于他这样做,实际上起了什么作用,那就只有天知道。

由于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角色使命,胡乔木在上峰面前赢得了忠诚的美名,再加上所谓理论权威的外观,每每使得最高方面附和并支持他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判断,他便俨然成了中央在理论方面的代言人。毛泽东在世的时候,他没有多少发言权,还比较谨慎,毛泽东死后,随着政治地位的蹿升,他的卫道士的角色感越来越强烈。他无时无刻不在搜索意识形态方面的“敌对分子”,随时准备抽出他那自诩“锋利”的“宝剑”。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个“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会使他如此大动干戈,滥施挞伐,从而酿成一起震惊中外的公案。

胡乔木在给若水先生罗织罪名的时候,冲口说出了一句极有分量的话,叫做“离开马克思主义方向,诱发对社会主义的不信任。”这句话言简意赅,道出了胡乔木发动这场斗争的秘密。原来,在胡乔木看来,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是不能相容的,说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说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就是“离开马克思主义方向”。异化只能与资本主义相联系,说社会主义社会也有异

化,提出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异化问题,就是“诱发对社会主义的不信任”。既然问题如此严重,他当然不能丝毫宽容。

事有凑巧,若水先生在揭露胡乔木的蛮横行径时,不经意间也说出了一句极有分量的话:胡乔木“虽然没有掌握真理,可是掌握了权力”。这句话同样言简意赅,道破了胡乔木把理论论争变成政治迫害的秘密:手中没有真理,又要战胜对手,只能滥用权力,以势压人。

### 三

为什么主张马克思主义包含人道主义,就是“离开马克思主义方向”呢?道理在于,胡乔木所理解和奉行的马克思主义,的确不包含人道主义。在他们那里,辩证唯物主义等于斗争哲学,历史唯物主义等于阶级斗争,除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概念,既没有“人”这样的族类概念,也没有“个人”这样的个体概念。而人道主义在理论上的立足点,恰恰就在这两个概念上面,离开了这两个概念,就没有人道主义可言。胡乔木看到有人说“人”,就指责为抽象的人。在他看来,不能说人,只能说社会,只有在社会中人才是具体的。殊不知离开了人,社会也是抽象的,社会就是人的活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和社会、社会和人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怎么可以把人和社会对立起来,又把社会和人对立起来呢?这样明白的道理,号称理论权威的胡乔木竟然不能理解!如果他有幸活到今天,到处听到人们说“以人为本”,并且还堂堂正正地把它写进了党和国家的正式文件,宣布为重要的指导思想,不知道他又该怎样痛心疾首!

把人道主义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剔除出去,当然不是始于胡乔木,也不是始于毛泽东。第二国际的时候,正在形成中的列宁主义就把人道主义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排挤出去了。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结构界定为“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即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根本没有人道主义这个价值论的地位。从纯学理的观点看,列宁的定义,充其量只是粗略地概括了“作为科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而完全没有涉及“作为价值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



王若水

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一个“价值体系”，然后才是一个“科学体系”。马克思毕生追求的目标，就是通过无产阶级的解放，达到全人类的解放，以实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什么呢？共产主义是“十九世纪的伟大经济运动所引向的人道目标”，其具体内容，就是“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发展的同时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或者，如《共产党宣言》所说，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围绕着这个崇高的人道目标建构起来的，至于这个理论体系究竟是否合乎实际，是否可行，那是另一个问题。这里谈的是，这个理论体系本身的内容和结构。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在逻辑来看，完全可以把它界定为这样“三个组成部分”，即崇高的人道目标，彻底的批判精神和作为社会改造方案的社会主义。如果拿基督教的圣父、圣灵、圣子的“三位一体”来取譬，那就可以说，崇高的人道目标处于“圣父”的位置，彻底的批判精神处于“圣灵”的位置，社会主义处于“圣子”的位置。崇高的人道目标具有永恒的价值；彻底的批判精神是理性推动社会进步的杠杆；社会主义是从批判“旧世界”中发现的“新世界”，它是从属于崇高的人道目标和彻底的批判精神的。“旧世界”变化了，从批判“旧世界”中发现的“新世界”也必然不同；但是，不管怎样不同，社会主义必须服从于崇高的人道目标。由此可见，马克思本人的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从俄国送来的马克思主义即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实际就是列宁主义。马克思本人的马克思主义是包含人道主义的。若水先生所说的，正是这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早年说得更加直白，“共产主义是以扬弃私有财产作为自己的中介的人道主义”。可惜，许多人，其中包括胡乔木，记住了“扬弃私有财产”，忘记了“人道主义”。

重复地说，马克思主义究竟是否包含人道主义，这要看你说的是哪一种马克思主义。如果说的是马克思本人的马克思主义，那么，毫无疑问是包含人道主义的，因而真理在若水先生一边；如果说的是胡乔木们所奉行的马克思主义，那的确不包含人道主义。但是，人们不免要问，究竟是胡乔木的马克思主义正宗呢，还是马克思本人的

马克思主义正宗，谁是真正的“王麻子”？事情很清楚，胡乔木之所以要给若水先生加上“离开马克思主义方向”的罪名，就因为若水先生请出了被他们封杀有年的正宗的马克思主义，对他们的冒牌货构成了威胁。这种冒牌的没有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正是“现实社会主义”在天国的辩护。

#### 四

为什么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有异化，就是“诱发对社会主义的不信任”呢？道理在于，这个看法揭穿了现实社会主义的谜底：现实社会主义确有异化。个人崇拜、专制独裁、官僚主义、贪污腐败、以权谋私、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等等，都是异化的表现。在胡乔木看来，承认这些事实是一回事，把它们说成异化则是另一回事。承认这些事实，可以用社会主义在发展中难免有缺点来辩解。而承认这些事实是异化的表现，则意味着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这岂不是要诱发对社会主义的不信任吗？若水先生从事实出发，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异化，目的是为了从这个社会的法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高度上，去阐明这些事实的本质，从而引起人们的警觉，在实践中自觉地予以克服。胡乔木从概念出发，断言社会主义没有异化，因而无视（确切地说，掩盖）现实社会主义存在种种异化的事实。在他看来，只有回避异化这个概念，才能维持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建立起信任，否则就会诱发信仰危机。因此，他一听说异化，就像一听说人道主义一样，神经就紧张起来。

人道主义和异化，历来是两个相互联系的问题。费尔巴哈批判宗教异化的反人道主义的本质，得出了“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的人道主义结论，从而在文化主义的范围内达到了无神论的高度。正如马克思所说，“无神论是以扬弃宗教作为自己的中介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从费尔巴哈出发，又超越费尔巴哈，他要消灭的是劳动的异化，而劳动的异化是与私有制联系在一起。要消灭劳动异化，就要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因此，如上所说，共产主义就是“以扬弃私有财产作为自己的中介的人道主义”。事实上，人道主义也

好,消灭异化也好,说的都是一回事,就是要改造违反人性的社会环境和思想理论观念,以便改善人的生存状态,提高人的生命质量,使人活得尊严,活得幸福和快乐。

因此,凡是否定人道主义、无视异化的人,其中包括胡乔木这样的大人物,无一例外地,都反对把人当人,即当作大写的“人”。在胡乔木看来,人不过是一些特定的阶级身份:工人、农民、地主、资本家,等等。离开了阶级身份,他不知道人还是别的什么。大写的“人”,对他来说,是根本不存在的。既然不把人当人,不承认人首先应该是大写的“人”,当然也就谈不上人道主义和人权了。在这里,“人”、“人道主义”、“人权”,也是三而一、一而三的。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那专制主义盛行的年代,既没有人道主义,也没有人权,更不承认人就是人。可见,胡乔木不准说“人”,不只是他所奉行的那套反人道的意识形态在作祟,更是此前几十年反人道的社会状况的反映。

## 五

若水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在改革开放方兴未艾的时候,把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一并提出来,予以认真的研究,希望引起广泛的讨论,目的就是为从理论上为改革开放鸣锣开道。人们都知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是为改革开放提供认识论指导的。但是,未必都意识到,以若水先生为主要代表而发动的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是为改革开放提供价值论指导的。不从理论上肯定人道主义的价值,不指出现实社会主义存在异化的事实,并进而揭示其经济、政治制度上的根源,改革就没有价值方向。人们历来只是从经济政治结构上去理解社会主义,似乎社会主义就是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等等。实践表明,只从结构上着眼的社会主义没有生命力。邓小平看出了现实社会主义的弊病,强调要从功能上去界定社会主义,讲“三个有利于”,并且根据功能的需要去改革原有的结构。但是,这还远远不够,还必须把人道主义的价值目标补充到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中去,否则,还不能保证改革的成果真正能改善人们的生存状态。从理论上指出这一点,正是若水先生的巨大功

绩。他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研究,正是为此而进行的。只有把价值、功能和结构三重规定一体化,才会有值得向往的社会主义。可是,胡乔木却把这样的研究和讨论指为“反现实倾向”,足见其对社会主义的看法是多么僵硬,多么落伍,对改革的理解是多么肤浅。

若水先生说,胡乔木有相当固定的保守倾向,这是非常正确的。这个保守倾向往往使他在理论上站在改革的对立面。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他指责认为中央有不同看法的人是“分裂中央”,给这场意义重大的讨论横加罪名。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他认为这是引导人们关心个人利益,千方百计阻止这场讨论。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讨论,他更视之为反社会主义的逆流。在所有这些关系改革命运的重大理论上,他那时都站在保守势力一边。不能否认,他帮中央起草和修改过一些有利于改革开放的文件,但那都是在中央改革开放的既定决策下完成的。凡属他以中央代言人自居,独立地对意识形态问题进行判断的时候,他的反改革的保守倾向都暴露无遗。若水先生同胡乔木的分歧,说到底,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不同,更重要的是对改革的立场和态度不同。这就是胡乔木制造这桩公案的实质所在。

## 六

从这桩公案的回顾中,至少可以得出如下一些教训。首先,思想理论界发生的讨论和争论,必须本着学术自由的原则进行,不能由上面来钦定是非,从政治上横加干涉,更不能对不同观点者加以迫害。这是老生常谈了。可悲的是,文明世界公认的这个不容否认的原则,至今未能全面的确实实行。其次,在一个号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国家里,讨论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是理所当然的,不应该设置障碍。只有经常进行这样的讨论和争论,才有可能对马克思主义作出有利于社会进步和人民幸福的解读。不许讨论,是违反言论自由原则的;而更严重的是,一旦对这个指导思想发生误解,往往难以纠正,从而不可避免地会在实践上造成灾难。这样的事情,已经难以计数了。没有人可以垄断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必须看到,过去思(下转44页)

# 杨立三的经济实践与经济思想

李琴

人们通常认为，共产党领导经济工作不按经济规律办事，不承认个人的物质利益，不重视科技人员。然而，在革命根据地并不完全是这样。肩负八路军后勤保障和根据地经济建设重任的杨立三的实践和论述足以证明这一点。

杨立三，1900年12月生于湖南长沙，从井冈山到延安到北京，一直从事军事后勤保证工作，建国以后我军第一任后勤部长。1954年逝世时，周恩来、彭德怀为他执绋送葬。

## “一要吃饱饭，二要打胜仗”

1939年4月初，杨立三由延安来到太行八路军前方总司令部任职。当时，太行地区经济十分困难。杨立三一到任即参加由总部和北方局召开的全面研究根据地建设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等领导人。会议决定大力发动部队垦荒种地，建纺纱厂、织布厂、制鞋厂、兵工厂，办合作社和银行，以解决部队吃饭穿衣，武器弹药供应，发展根据地经济，开展与敌经济斗争的问题。

会后，杨立三即主持由彭德怀同志挂帅的华北财经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委员会成员有：杨尚昆、彭真等，该机构于1941年晋冀鲁豫财经办事处成立后结束工作）。当时，部队缺粮情况严重，他一到任，除了调查研究之外很快组建了后勤职能部门：供给部，部长周玉成；卫生部，部长孙毅之；军工部，部长刘鹏；兵站部部长由他本人兼任。确定发展农业生产，开办合作社，筹建银行，帮助军工部研发军工生产，均由他负责。

党中央十分重视根据地经济建设，抗战伊始，毛主席就指出：“长期抗战中最困难问题之一将是财政经济问题。”（如无财经支援）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朱德总司令提醒杨立三：“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就要搞好自己的家务，要建兵工厂，生产武器弹药。”彭德怀副总司令告他：“今天谁有了粮食，谁就会胜利。‘战斗力系于胃’！”邓小平一语中的指出：“敌后的经济战线的尖锐程度，决不亚于军事战线。”刘伯承师长言简意赅，说：“部队的要求就是：一要吃饱饭；二要打胜仗。”

## 老百姓能养活多少兵？

杨立三常提醒后勤干部：“不但要保证部队之所需，而且要估计到人民负担问题。农民负担减轻一分，部队力量即增加一分。”

1940年，根据地的社会财力很弱，可八路军这时已发展到40万人，国民党政府按4.6万兵员拨发的军费由于克扣还时而停发。老百姓究竟能养活多少兵？这是个严峻的问题。彭老总把这个问题提交给了杨立三。这正是杨立三所考虑的（在他的日记中可查到他对根据地人口、兵员，农副业生产收入、财政收入的核算情况）。

根据杨立三提供的情况，彭老总和他算了一笔账，认为：按当时的生活水准和物价，每个军人一年约需470元左右（包括武器消耗）；以民众的负担计算，每人每年约需10元左右，合50人负担一个兵员。根据计算，彭老

总认为八路军的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应不超过根据地人口的2%,党政人员不超过1%,根据地全部脱产人员不超过人口的3%。党中央在1941年发出的精兵简政号召中,采用了这个“军民比”;对密切抗日军民关系,共度艰苦岁月,起了重要作用。

## 合法收入“准许私有”

上世纪40年代初是晋冀鲁豫最困难的时期。为渡过难关,杨立三决定在后勤部门将由集体掌管全部生产收入的做法,改为由集体与生产者个人按一定比例分成的办法,以激发每一个人的生产积极性。

新分配办法包括:在完成生产定额后个人多生产的粮食和蔬菜,由伙食单位按市价收购,收购之款,70%付给个人,30%抵消个人生产定额;业余打毛衣、毛袜、毛手套,所需原料和成品销售,由公家代办,所得价款,70%付给个人,30%抵消个人生产定额;食堂节约烧煤,节余部分折价,折价之款,20%付给炊事员,80%抵消个人生产定额;开荒镢头,超过规定使用时间的,每把奖10元;交回脱落破旧马掌的,付给新马掌价的10%,帮食堂运粮的,运费全部归个人;业余养鸡喂兔等的收入全部归个人;收入可存银行生息,可入股合作社分红。考虑到大家对“私有”普遍有顾虑,杨立三特别申明:“由劳动所得来的分红和节约的代价,不是非法所得,准许私有。”

新分配办法实行后,后勤部门的生产越来越红火,既解决了公家的困难,还使个人有了积蓄。总部特务连战士有银行存款达千元以上的。但引来的却是沸沸扬扬的议论:“个人生产分红会引起部队不巩固”;“允许私有是有害于共产主义的纯洁的”;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彭老总支持杨立三的做法,他写信给邓小平介绍情况,指出:“这样不恰当的批评,必然会阻碍集体与个人生产的发展。”小平同志完全赞同后勤部门的做法,强调:“必须建立赏罚制度”。后勤部门的做法受到鼓励,杨立三和滕代远很是兴奋,便将新分配办法整理成《滕参谋长、杨副参谋长手订总部伙食单位生产节约方案》(简称《滕杨方案》),于1944年4月1日印发各部队。《方案》

得到各地部队的积极响应,被誉为“生产运动的新方向”。

《滕杨方案》在前言中旗帜鲜明地宣告:

“我们提倡劳动,奖励劳动,只要是劳动所得,自己就有权享受,你生产得越多,你所得的也越多。”

“我们提倡节约,奖励节约,只要是合理的节约,你节约得越多,所得的也越多。”

“我们提倡私人积蓄,只要是劳动所得的代价,你越积蓄得多就越好。”

《滕杨方案》得到地方党政部门的积极响应。中共太行区党委和太行军区政治部于1944年4月13日联合发出指示,号召全区党政军民学校按照《滕杨方案》的办法组织生产,指出:“实际证明,旧的东西,对于发展生产极其软弱无力,新的东西,是可以充分发挥每个人的生产积极性,发展整个生产的。”《滕杨方案》,就是指导我们从旧的道路上跳过来,走向毛主席“公私兼顾”的道路上去。”

《滕杨方案》突破极左思潮的羁绊,把毛主席提出的“公私兼顾”原则落实到每一个生产单位和每一个生产者个人,把所有人的生产积极性都调动起来,《滕杨方案》根据科学管理的要求,将原则量化,细化到便于操作的具体规定。

调动了直接生产人员的生产积极性之后,杨立三把思想转向调动部队领导的管家理财积极性。经同供给部部长周文龙研究,并征得小平同志的同意,决定将传统的经费供给制改为经费包干制,于1944年开始实行。在供给工作会上,杨立三郑重宣布:“包干经费按当时的物价一经核定,无论物价涨跌,都全年不变。”他要求部队领导开动脑筋发展生产保证生活,“实行大家管理家务”。新办法实行后,部队收入迅速上升,干部管家理财的意识和能力普遍提高。

个人生产分红制和部队经费包干制的实施,晋冀鲁豫生产获得空前大发展。抗战八年,1944年是军民生活最好的一年。总部驻地麻田镇及其周围的村镇,集市贸易火红,小饭馆增多。

## “与商人竞争不能以权力”

因政策鼓励,1939年下半年,太行地区合作

社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其中,群众集资办的最多。群众集资办的合作社负责人多是旧时商人,他们长于活跃市场,却常违法乱纪,中饱私囊。引起群众不满。单位办的合作社竞争不过,纷纷要求对商人采取制裁措施。

杨立三说:“合作社与商人竞争不能以权力,而应以我们的经济政策,我们的工作去竞争。我们不能消灭商人。”除对少数违法严重者绳之以法外,对一般违法人员应采取教育方针,以继续发挥他们在缉私,收集山货,活跃市场等方面的作用。”

合作社兴办初期,发展最多的是利润高的运销合作社。为扭转这一偏向,杨立三大力鼓励职工投资开办生产合作社。到1941年,在棉纺、麻纺、毛纺、席编、制鞋等领域都相继办起了一批由职工投资的生产合作社。投资合作社可以分红,一些公营工厂和商店也都吸收职工投资,将公营企业改成为合作社性质的企业。统计资料表明,1947年,太行区共有大中小型工厂约6000家,其中,合作社性质的最多,2800多家,其次是私营的,2100多家,公营的只有500多家。

## 八路军的企业制度

“太行山上小天津”,这是人们对散布在太行山上的兵工厂区的爱称。为坚持抗战,八路军在太行山崇山峻岭中创办了10多个兵工厂,聚集着一批留学德、日、英,毕业于清华、北大、天津北洋等国内名牌大学的科技专家,还创建一套相当完整的工厂管理制度和办法。

“土八路”办工厂能有什么章法?其实,八路军领导的科学管理意识相当强。彭老总要求兵工厂应按管企业的办法管理,强调:“工厂不是军队,工人不是战士。”杨立三既理解又尊重科技专家,他强调:“要重视技术人员的个性和意见”;“召开技术人员座谈会不要用什么‘非党干部座谈会’之名”;“要帮助技术干部做研究改良工作,给以一切便利与工作环境,不能因研究试验失败而苛责”;“要采取各种技术人员乐于接受的方式加强他们的政治生活”;“要接近他们,密切同志感情”;“专门人才要求入党,只要政治上没有问题就可以接受他们入党”。

杨立三提出工厂要“坚决建立厂长负责制”,“反对以‘民主’和‘党的领导’为借口来妨碍生产”。并强调:“企业化管理是最有效率的办法”。在他主持下,工人待遇从1940年4月起由供给制改为工资制(服装仍由公家供给),并从这年8月起,对适合计件的实行计件工资,对不适合的增设专项奖(超额奖、节约奖等)。

杨立三认为,实行计件工资,固定工资加专项奖,“才能将全体工人,先进的与落后的,均发动与组织在劳动的热情之中”,他还主张开展立功竞赛活动,说:这项活动可使“人人立功,不抹杀功绩。”

实行计件工资,必须制定原材料和工具的消耗定额,有工时考核、成品和半成品收发记录及质量检验制度,还必须适时、无间断地供应燃料和原材料,确保均衡生产。为此,军工部于1940年当年赶制出一整套制度和管理办法,单是这年6月份就出台了6项,其中:

《军工部集体合同》由刘鼎部长(厂方代表)和工会主任(即主席)张士杰(工人代表)签订。内容包括:生产定额、劳动纪律、工资待遇、工作时间、劳动用品等。(刘鼎,留德科技专家,被誉为“军工泰斗”,1940年5月调任军工部部长,原部长刘鹏改任副部长)

《军工部各项管理办法》,内容包括各种工资的发放办法(粮食工资、固定工资、计件工资、加工工资、病假工资、休假工资等);奖励类别(创造发明奖,保卫工厂奖,教学成绩突出奖,工作积极起模范作用奖);奖励标准、处理干私活职工的办法以及学徒晋级的规定等。

杨立三要求:“(工厂)应有非常精确的计算,其内容是生产有计划,以全面工资制(指工厂全部职工),严密的检验产品制,完善的工务制,精确的器材制及订货投资制等方式来合理地管理企业。”

兵工厂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后来也被引进到被服、制药等军需工厂。杨立三在1942年6月××日(日期原文不清)的日记中记的唯一一件事是:“创造了一套制度和办法!”流露出他对制度的重视和任务完成的喜悦。

刘少奇在以中央工委名义发给中央军委参谋部和各中央局关于军工生产的电报中说:“太



杨立三(1900-1954)中国人民解放军首任后勤部长

行管理制度已走上正规,亦有帮助各区的义务。”

## 为保工人工资造“饿”字

上世纪40年代初,太行地区遭灾,“扫荡”频繁,物价飞涨。1942年年初,小米每斤0.58元(冀钞),年底涨到每斤2元钱,食盐、西药等物资的价格更是狂涨。为保工人工资不受物价上涨影响,经杨立三倡议,将工人的货币工资改成为实物工资,按6种生活必需品价格的总合计算。杨立三还根据他对文字学的研究造了一个“饿”字作为计算单位。

“饿(读作x),一“饿”等于:中等小米2斤,中等小麦1斤,油盐各5钱,中等白土布1方尺(土布面宽1尺),中等家用煤1.5斤。实物价格以每月15日中午的市场价为准(因早市贵,晚市贱,中午价居中),由党政工会组成三人小组调查确定。按“饿”发工资,职工生活有保障,已离厂回乡的职工又都携着回来了。

为稳定部队供应,军费后来也以“饿”为单位计算了。这种计算办法,一直沿用到建国后1950

年物价稳定后才取消。“饿”也称作“实物分”或“分”,1950年发行的《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就是以“分”为单位计算的,共发行二万万分。

今天,“饿”字已被多部字、词典收入。《新华字典》对“饿”字的注释是:“饿(x),老解放区一种计算工资的单位,一饿等于几种实物价格的总和。”

## 创建冀南银行

经过4个月紧锣密鼓的筹备,冀南银行于1939年10月15日宣布成立,开始发行晋冀鲁豫区货币——冀钞。银行成立了董事会,由杨立三任董事长,有关部门负责人任董事。厦门大学经济系肄业的高捷成被任命为银行行长(高在反“扫荡”中牺牲后,赖勤任行长,赖病逝后,胡景运任行长)。

银行一成立就投入与敌的经济斗争,首战告捷,敌伪货币—联银卷被驱逐出晋冀鲁豫市场,冀钞的信誉节节上升。银行第一年的发行全部用于军费和行政开支,解决财政困难,是纯粹的财政开支;第二年开始贷款发展工农业生产和商业。由于有银行支持,晋冀鲁豫区经济发展加快,到1944年,党政军透支便已还清,银行发行全部贷给工农业生产和商业。为此,杨立三曾发电北方局报捷。

1942年,敌后根据地秋收即将开镰时,总部忽得情报,敌人要到山西西部产粮区—上党盆地抢购粮食。杨立三闻讯当机决定抢先行动,快速组织起一支“购粮大军”抢先购进20多万担粮食,一举粉碎敌人抢购粮食的图谋。购粮成功,不仅弥补了太行地区的粮食缺口,还因以工代赈付运费给运粮民工,缓解了农民的生活困难。又由于商人被组织起来合法赚钱,减少了走私活动。尤为重要的是,银行和工商部门在行动中配合密切,取得一石数鸟的成效。通过将低价从晋西购得的粮食,以低价卖一部分给粮价高的平汉铁路东侧的日占区群众,既赢得日占区群众的支持,又赚取了粮食差价;既增加了银行外汇储备(日伪联银券),又将冀钞推行到日占区(群众用冀钞购粮有优惠)。

杨立三最关注货币发行和物价。在他掌管

下,晋冀鲁豫的物价始终保持相对稳定。当地日占区和国统区的物价没有不暴涨的。而此期间,冀钞币值也由最低升到最高。1939年冀钞发行之初,1元冀钞相当2至1角日伪联银券,到1945年3月,1元冀钞可换15元联银券。为帮助银行建立实物准备金,提高抵御风险能力(银行成立之初,以法币为准备金),杨立三还商同各地区拨部分粮食给银行,使银行建起以粮食为主,加上部分银元、白银和黄金的实物准备金。

1942年冬,当一个地区的法币币值跌到一元只相当二三角冀钞时,冀南银行总行电告支行趁机收买些法币,却因当地党政领导阻拦未能实现。三几个月后,当该地区必须用法币购买粮食时,因手中没有法币而坐失良机。杨立三发现后,即提出“行政与经营分开”的主张,建议:“沟通各战略区的物资交流,行政与经营分开,起相互制约作用。”杨立三注重市场,银行和工商局在他的建议下都成立了资料室,加强了对市场的研究。

## 力主健全审计制度

杨立三十分重视审计工作,他举例说:“一些单位米袋子一年补发两次(浪费);“一个单位300人领700双鞋子(以少报多);“一个单位做10床被子贪污9丈布(面宽一尺的土布,10尺为1丈)(贪污)”。

他认为,对掌管财物的机构和人员,必须加强监督,否则,必然会发生浪费、滥用职权、管理不善等问题。

杨立三一到总部任职就成立了审计处,并在此基础上于1941年制定出我军第一部《审计法规》。《法规》颁布后,各战略区、各部队都建立了审计组织,并由野战供给部制定了《会计工作实施细则》和《出纳工作实施细则》等配套规定,还增设了后勤部巡视组,负责实地监察。较为完备的审计体系对防止贪污浪费,提高军费使用效益,培训财务干部,起了很好作用。当年,边区政府的整治贪污办法规定贪污500元即枪毙,边区政府副主席戎子和说:“那时党和军队干部的思想比较纯洁,因贪污被枪毙的只有很少几个人。”

伴随1943年以杨立三为主任的八路军总审计委员会的正式成立,《审计法规》的贯彻执行,

以及一大批经过培训的财会人员的上岗,1945年,晋冀鲁豫在各根据地中率先成立了会计学会,开展会计理论研究和会计职称评定。当年发展会员1176人,授予胡景运(冀南银行行长)、黄同(总部会计科科长)等4人会计师称号。全国解放后,许多部门的财经干部都来自晋冀鲁豫区。

## 提出“八一”“九二”米建议

全国解放后,中央军事委员会后勤部(1948年5月成立)改称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后勤部,部长仍由杨立三担任。与此同时,经周恩来总理提名,由毛泽东主席任命,杨立三兼任政府食品工业部部长。

解放初期,全国城市物价猛涨,粮价影响最大。杨立三研究提高面粉厂和碾米厂的出粉率和出米率,以增加城市米面供应。

根据调查,全国面粉厂共计547家,全年面粉产量约为8600余万袋,销售量约为5000余万袋。碾米厂华东共有3831家,全年加工糙米27亿斤。面粉厂每百斤小麦一般出面76斤,碾米厂每百斤稻谷一般出米88斤。杨立三和食品部的工作人员考虑,如每百斤小麦多出5斤面出到81斤,每百斤稻谷多出4斤米出到92斤,则投放市场的400多亿斤粮食,就可多出米面几十亿斤,够300万人全年的食粮(每人每天按一斤半计)。食品部遂向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八一”粉和“九二”米制造规定的建议。

这个建议经中财委和政务院通过后,于1950年4月2日颁布执行。各地群众对“八一”粉和“九二”米普遍表示赞成。

在对渔业、糖业、烤烟、米面和油脂五大行业进行初步调查之后,食品部的干部上下一致要求接管企业,提出渔业接管大连中苏渔业,油脂接管大连油脂,糖业接管广东糖厂,面粉接管天津面粉厂,等等。杨立三对政府部门直接管理企业的做法持否定态度。他认为,食品部只能搞宏观管理,不能插手企业经营,更不能接管企业。他的看法得到陈云、李先念和薄一波同志的赞同。据此,政务院于1950年9月撤销食品部,同时免去杨立三食品部部长职务。

(责任编辑 杨继绳)

# 解决三峡工程遗留问题还任重道远



世界瞩目的三峡工程，历经 12 年的建设，将于 2008 年全面完工。2007 年 11 月 27 日，三峡建委负责人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对世人所关注的若干重大问题作了回答。他们的看法十分乐观，认为库区淤积、地质灾害、生态、气候影响、移民等问题都已解决或正采取有效措施解决中，防洪效益明显，等等。

作为一个长期关注三峡工程的社会公众，衷心期望三峡建成后能经受实践的检验，安全高效运行，发挥防洪、航运、发电三大效益。但愿望不等于现实，几位负责人的回答还不能令人释疑，他们乐观的看法与严峻的现实相去甚远。我认为，三峡遗留的问题是严重的，影响是深远的，绝不能掉以轻心。有些问题早已预见，但至今仍未找到解决的办法；有的尚待作出缜密的科学评估，制订对策；有的才初露端倪，需要历史的检验。现就会上涉及的几个问题，提出商榷。

## 一、三峡淤积有自身特点，其危害将远远大于三门峡

答问称，在 2006 年和 2003 年对入库泥沙量进行观测，原预测为每年 5 亿吨，实测仅 2 亿吨，说明来沙量减少，而排沙功能已达到设计要求。认为“三峡水库是淤不满的”，“三峡水库绝对不会成

为第二个三门峡水库。”似乎确认三峡水库淤积问题已经解决。窃以为这一结论下得过早。长江三峡的淤积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它造成的危害也远远大于三门峡。三峡库区的淤积风险，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1. 长江及其支流的沉积物。与黄河不同，黄河河床是黄土，造成三门峡淤积的是随河水入库的悬移质黄沙。长江上游河床的造床质则主要是砾卵石和底沙推移质，悬移质则为泥沙。悬移质可以测得，推移质则不易测得。建坝以前，长江三峡段有 120 米的落差，重庆寸滩库尾只是微淤，而三斗坪坝址的覆盖层有 35 米之厚，说明建坝前推移质的淤积主要在坝址。建坝后，流速大减，悬移质入库，推移质卵砾石和底沙将全部沉积于库尾重庆港。黄万里根据部分实测资料估算，重庆以上长江卵砾石夹底沙的年输移量约有一亿吨。这些推移质沉积物将随洪水堆积在库尾，形成拦门坎，不仅会造成库尾的洪水灾害，而且淤塞航道，给重庆港造成永久性的破坏。1991 年张光斗也指出：“看过清华大学重庆港区的模型试验，淤积问题较复杂，整治工程量很大，不很落实，希望抓紧研究工作。”研究结果如何，以后未见下文。

2. 三峡库区自身产生的淤积亦不容忽视。据统计，1990 年库区水土流失面积达 3.46 万平方公里，占土地总面积的 58%，库区年均土壤侵蚀量

达 2 亿吨。这些流失的泥沙绝大部分将进入水库，形成淤积。

3. 水库建成，库岸的崩滑体及易发泥石流，体积将达 34 亿立方米。其中有的正在活动中，有的将因水库蓄水水位变动，每年将数以亿吨计的岩体、巨石、块石、泥沙涌入水库，将成为水库中的永久沉积物，不是用“蓄清排浑”的方式可以除掉。

由于长江上游已建在建一系列大中水库，减少了悬移质泥沙数量，但对三峡影响为何？尚有待历史验证。2003 年水量偏枯，2006 年是枯水年，四川、重庆大旱，水库又正在蓄水，如以这二年观测数据来推断今后入库泥沙量，难免以偏概全。只有经过一、二次较大洪水，我们才能较确切地判断河床推移质卵石及底砂对库尾淤积的严重程度。

三峡不会像三门峡似的被泥沙淤满，但不等于说三峡淤积问题已经解决。650 公里长的水库，库尾是港口大城市重庆，一旦发生严重淤积，水位提高，洪水泛滥，后果不堪设想。库区地质灾害形成的堵塞，将造成碍航，乃至断流。上述问题，我们应该预为之谋，不能高枕无忧。

## 二、库区地质灾害难以控制

对于库区的地质灾害，发言人的评价是：“得到了有效控制”。是否已经得到“有效控制”？且看事实：

据长江综合勘察局提交的调查报告，需要关注的库岸干流 15 段长 132.1 公里，支流 157 段长 253 公里，泥石流易发支流 8 条 15 处；崩滑体 1190 处，面积 135.9 平方公里。如万县至云阳、奉节一带，崩滑体规模为 4000~6000 万立方米，秭归境内的范家坪滑坡体积达 1 亿立方米，万家坝古滑坡体的涵盖范围达 10 平方公里，估测体积为 2 亿立方米以上。蓄水后，由于水位变动，坡面侵蚀和重力侵蚀，可能引发崩滑体的复活。在三峡库区 650 公里狭长地带，如果某一地段发生大面积的滑坡崩塌或泥石流，可能导致大江断流，危害极大。

史载库区发生岸坡塌崩体积超过千万立方米的就有 40 余处，不下百余次，其中 5 次堵江断流。1523 年西陵峡瓦岗发生一次大崩塌，山裂石滚，堆积江中，大江断流，形成新滩，即今青滩。1998

年的一次大滑坡，竟把青滩填夷为平地，幸事前有预报，千余居民得以平安转移。

地质灾害仍是现实的威胁，如上述青滩滑坡体积 3000 万立方米，可能复活；对岸上游 1 公里处的链子崖危岩体，正处于持续的变形中，极可能以块体分离崩落。三峡工程论证报告中曾假定新滩滑坡按 1000 万立方米土石体以每秒 100m 滑速入江，链子崖假定临江的 250 万立方米危岩整体崩落入江。据说其涌浪传至坝址也不致危及大坝安全。姑且不谈涌浪的危害，如果在长宽都不超过 1 公里的范围内堆积 1000 万立方米的滑体和 250 万立方米的岩石，加原滑入江的青滩 340 万立方米滑体，总体积将达 1590 万立方米，堆积物可能高达数十米至百余米。形成巨大的水中坝。三峡大坝混凝土浇灌量不过 1492 万立方米，在大坝上游有一个超过三峡大坝体积的水中坝，对水库的危害可以想见。如果距坝址 66 公里处的黄腊石滑坡体复活，又有 2000 万立方米的滑体滑入江中，又将形成另一个大于大坝体积的水中坝。那时，水库还能正常运行吗？

三峡地质灾害的监测、预报和治理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三峡水库 175 米蓄水位岸线长 5972 公里，水库蓄水后的库岸再造过程是复杂多变的，暴雨、洪水、地震、水位变动可能使库岸再造演变为多发的巨大地质灾害。目前尚未可预卜。现在三峡库区尚未达到 175 米正常蓄水位，1998 年以来，长江尚未发生流域性的洪灾，真正严峻的考验还在后面。现在说“得到了有效的控制”，还缺乏科学根据和实践的验证。

## 三、三峡库区的生态环境形势严峻

答问称：三峡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结论指出“生态环境问题不影响工程可行性，总的来说，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利大于弊”。查阅当年两次论证报告书，均未见此结论。

中国科学院于 1987 年提交的《长江三峡对生态环境影响的论证报告》基本结论认为：“三峡工程对生态与环境将产生广泛复杂，深刻长久的影响。这种影响利弊交叉，相互制约，但综观全局，系统分析，综合评价，工程对生态与环境的影响，作出弊大于利的结论是明确的，无疑的。”与上述答

问的结论恰恰相反。1991年经三峡论证领导小组审议通过的《三峡工程的生态与环境问题》论证报告中指出：“三峡工程对生态与环境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各因素之间，应从流域全局出发进行系统分析和综合评价”。结论是“有利影响主要在中游”，“不利影响主要在库区”，此外还有“潜在或目前难于预测或定量的影响”。指出“库区移民环境容量是工程决策中比较敏感的制约因素”。并对工程论证决策和规划设计提出六项建议。报告并未得出“利大于弊”或“不影响工程可行性”的结论。可见，在三峡论证及建设过程中，生态环境问题引起了高度的重视。“生态环境影响利大于弊”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造成库区生态环境恶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来自上游城乡污染物的排放、植被破坏、水土流失等等，但不能否认水库蓄水加速了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蓄水后流速减缓，大量污染物沉积库中；35.69万亩农田被淹没，大量有机物入库，加速库水的富营养化。625个厂矿淹没，120万城乡人口搬迁，大量建筑毁后沉积库中，估计工业固体废弃物及建筑垃圾将达数亿吨。其中有害化学物对库区水质的污染亦不容忽视。水库淹没632平方公里陆地面积，多为库区较富饶的地区，因而大大压缩了库区环境容量。

为了控制污染源，国家拨了专项国债资金392亿元，在库区建了50多座污水处理厂和40多座垃圾处理厂。建厂以后，能发挥多大效益，还有待观察。不少地方建了厂，由于缺少管网配套设施建设资金，不能正常运作，甚至长期闲置。所以，不能说投资建厂就解决了问题。要真正发挥效益还有待完善配套设施，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市场化污染物处理的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同时还需大量后续资金的投入。

水库及上游的污染和环境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有关省市和部门通力协作，才能逐步解决。专家认为，三峡水环境保护治理应分三个层次：一是库区，包括重庆市主城区22个区、县以及湖北省4县、市。库区应继续加强城市污水和垃圾处理设施的建设，完善管网等配套设施，坚持实施库区退耕还林还草的政策，防治水土流失。这方面还需增加资金投入。二是库区影响区，包括宜宾以下长江干流及重要支流岷江、涪江、沱江、嘉陵江

等42个区县市，这一区域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及生活污水处理率均低于全国水平。这也是水库的重要污染源，需加强治理。三是上游区，主要是在金沙江及其支流雅砻江、岷江及其支流大渡河上游建设生态屏障。自上世纪末以来，国务院决定实施长江上游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在水土流失重点县开展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开始取得初步成效。为了确保环保工程建设的投入，应依法建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完善补偿机制，使这一工程的实施具有可持续性。

总之，三峡库区的生态环境恶化的形势是严峻的，保护和治理任务十分繁重，希望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不要当作无关轻重的“一只小猫”。（答问者告诫人们对待库区污染“不要把一只小猫当成一只老虎”）。

#### 四、重庆400万移民与三峡库区密切相关

当记者问及重庆400万移民问题时，负责人答称：“重庆有400万移民的说法，这不是三峡移民概念，三峡移民规划除国家批准的以外，没有其他的提法，而地方政府为统筹城乡发展，将来调整产业结构，有一个就业结构的调整，这和三峡工程移民完全是不同的两个概念”。

这一回答并不否认重庆将移民400万的事实，只是在“提法”和“概念”上做文章，认为与三峡移民是两回事。现在让我们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来考察重庆库区（不含湖北库区）的移民问题。

截至2006年底重庆库区计划移民95.13万人，其中城镇63.6万人，乡村31.5万人；实迁人口102.3万人，其中城镇67.88万人，乡村34.47万人（以上均不含安置人口）。如加生产安置20万人（乡村已安置8万人左右）与2007年及以后移民15万人，仅重庆库区移民总数将达137万余人，超出移民计划42万余人。

资金不足大大制约了重庆库区移民的经济发展。截止2006年底，移民资金投入381亿元，移民人均3.72万元。1993~1999年坝区搬迁安置移民8.23万人，移民资金投入85.25亿元，人均10.35万元，不计物价因素，相当于重庆库区人均移民资金的2.78倍。显然重庆库区移民资金偏紧。

三峡论证报告认为“农村移民的环境容量是够的”，“城镇移民基本上不需要重新安置就业。”实践表明，由于库区土地资源严重不足，原有土地人口容量已经超限。淹没区人口更为集中，平均每平方公里高达1150人。受人类长期活动的影响，这个地区原生自然环境已基本消失。原定“就地后靠”的方针无法落实，政府才采取多渠道移民的方针，至2006年底已外迁乡村移民17.34万人。城镇移民的安置就业也困难重重。由于库区工业基础差，设备技术落后，交通不便，市场容量有限，发展二、三产业难度极大。

由于上述原因，库区经济发展步履艰难，新迁城市经济呈空心化趋势。2006年库区人均GDP7741元，城市人均收入9573元，乡村人均收入2520元，分别占全国人均的48%，81%及70%。由于经济发展滞后，库区县区财政赤字逐年增加。1996年库区财政赤字为13.2亿元，至2006年上升至136亿元，10年间重庆库区累计财政赤字为628亿元。

重庆作为长江上游现代化经济中心城市，近10年来经济总量不断扩大，经济综合实力不断加强。成渝经济区的发展为重庆市的崛起提供了新的契机。但重庆市仍面临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发展不协调，区域及城乡经济差异突出等问题。占全市人口50%的三峡库区，GDP只占全市的29%。在这一背景下，重庆市提出以一小时经济圈带动库区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调整第一、二、三产业结构，统筹城乡发展。其中当然包括就业结构的调整。目前库区农业人口850万左右，耕地有限，不可避免会有一个人口转移的问题。重庆400万移民（新华社2007年10月11日报道），当然和三峡库区有关。任何“提法”也好，“概念”也好，都不能否定两者密切相关的事实。

## 五、三峡工程防洪效益毋庸置疑？

防洪是兴建三峡工程的三大理由之首。确切地说，对于长江中游，三峡能够起相当的防洪作用。据负责人说，“今年武汉市的汛期，江滩可能让老百姓去休闲了，这是最好的事实。”2007年，三峡水库正处于蓄水期，长江中游航道变窄，甚至有船只搁浅，洞庭湖、鄱阳湖都处于历史最低水位，

都不是好消息，都不能证明三峡的防洪作用。大型水库对防洪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它有利于水库下游的防洪，却不利于水库上游的泄洪。2005年嘉陵江洪水，造成重庆市的洪灾，库尾开县等县区被淹没。2007年，水库上游局部地区的暴雨，也造成重庆市库尾的洪灾。自1998年长江洪水后，至今尚未发生流域性的洪灾，三峡对中游的防洪作用，还都未经受真正的考验。现在还不能说“防洪效益毋庸置疑”。三峡水库建成后，重庆市受到洪水淹没的可能性和淹没程度如何？这是人们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三峡论证防洪组专家方宗岱认为：“长江日后增沙，库尾的干扰淤积及库尾岩崩和库尾糙率等项，尚未定论，暂不计算在内，仅设计误差一项，重庆最高水位约高达206米，比1981年洪水高出12.6米，高出历史最高水位约8.4米。这种情况，令人不寒而栗。重庆和上下游一些城镇，将成陆沉之势”。12如果重庆市的洪水位达到206m（超过朝天门码头7米）重庆大部分市区将被淹没，所有的铁路线都将被淹没（重庆菜园坝火车站铁轨标高196米）；分布在长江、嘉陵江沿岸占重庆工业80%的企业及大部分码头将被淹没，这对重庆市及其上下游地区来说无异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

三峡工程的防洪效益，还有待历史的检验。不能因三峡建成放松对长江上游及中游两湖流域洪水的防治。

三峡工程是中华民族的千秋大业。三峡工程的建成，对我国特别是长江流域经济、社会的建设和发展带来重大机遇和深远影响。但现在还不是摆庆功宴的时候，要让三峡的效益充分发挥出来，把它们负面影响缩到最小，还有不少工作要做，诸如河床淤积、地质灾害、生态环境、移民安置、库区上游防洪等问题，都应切实加强调查研究，制订治理方案，逐步实施，确保这一世纪工程的长治久安，永远造福人民，泽及子孙。

三峡是全国人民的三峡，希望主持三峡工程的负责人，一如既往虚心听取社会各界不同乃至逆耳的声音，积极慎重处理好三峡遗留的问题，不留重大后患。则三峡幸甚，长江幸甚，全国人民幸甚。

（作者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 杨继绳）

# 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的大饥荒

任彦芳

2000年的5月7日在郑州河南省省委宿舍。

八十一岁的张申细言慢语地向我讲了他的历史和他在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经过，他的老部下74岁的周化民在一边听着，有些是他们共同的经历。

张申，1953年后任中共开封地委书记，是焦裕禄的老领导，离休前任河南省委秘书长；周化民在1958年任开封地委工业部部长，1965年任兰考县委书记。离休前任商丘地委副书记。

下面是访谈实录。

张申：

1955年上半年，郑州地委改名开封地委，原地委书记张健民调任河南省委组织部长，我继任开封地委书记。

从我当了地委书记就失去了平静的日子。

原来农村合作化工作比较顺利，1953年，被称为“农民运动专家”的邓子恢出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他提出的基本思路是坚持群众自愿入社的原则，步骤要稳；合作社规模宜小些，不同地区区别对待，不要一刀切；农村合作社不仅要发展，更要巩固。

从我实际工作中体会，这是正确的。

可我错了！毛主席开始批邓子恢是“小脚女人”，1955年下半年就实现了合作化。大大加快了速度。我有些担心。可新乡地委书记耿其昌成了风头人物，我不想当“小脚女人”也跟着跑吧，省委一些领导已认为我“右”了。

1958年，毛主席想游黄河，到了兰考东坝头，省委副书记史向生陪着，到兰考，也让我上了专列，兰考县委书记程约俊同时上车，拿来兰考出的西瓜、葡萄让主席尝。

我上车，见毛主席穿白大褂（睡衣），正看三国呢。

毛主席要在这儿游泳，罗瑞卿考虑安全，没有同意，便从这儿去了商丘。

这之后便是我领豫东几十万人到巩县、密县去大炼钢铁。

周化民插话：

1958年，党中央提出要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为在第三个五年计划中进入共产主义而大干特干，人们提出口号：

“眼熬烂，腿跑断，连轴转，活着干，死了算！”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脚踏地球手托天，要把产量翻几番！”

当时头脑发热到了极点呀！说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叫嵯峨山人民公社，就在河南信阳。……

张申：

新乡地委书记耿其昌陪毛主席到七里营人民公社视察，由毛主席肯定的名字：“还是叫人民公社好！”一下子，全国就全是人民公社了。

周化民：

到处办食堂供给制，吃饭不要钱，过的是“共产主义”生活。我去黑龙江省参观，看到有“无人售货处”、“无人售货处”，到处放卫星，发“号外”，捷报满天飞。强迫农民说谎话，报高产量。通许练城公社常庄有个50多岁的老农叫常木林，过去给地主当长工，他对本村回家探亲的杞县老县长说：“现在逼着叫报产量，报不了还得挨打，一说就是党中央的决定。他妈的‘党中央’这个人恁坏，我不相信，连毛主席也管不了这个‘党中央’！”他是个老实农民，把“党中央”误认为是个人了。

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开扩大会议，决定1958年钢产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1070万吨。当时开封地区西部5县是山区，有些铁矿石，可以炼铁。我当时兼任地委大办钢铁办公室主

任，要到炼钢铁前线去，我去参加省的大办钢铁会，省委书记问：张申到了没有？你回去告诉他，书记要挂帅上……

张申点头说是，张申接着说下去：

我挂帅，坐镇前线指挥部，各县委书记也都既挂帅又出征了。按省委指示，开封地区动员 35 万人到巩县、登封、密县、新郑、荥阳西 5 县就地安排，组成各级指挥部，人山人海，人们自带行李，推小车、带口粮，没有煤，就砍树、运树。建小高炉需要头发，便让女孩子剪辫子，小女孩剪了辫子就哭。高炉需要引铁，便把群众家的锅、门锁……全砸了。

周化民：

那场面也真壮观，白天人海如潮，夜间一片灯火。不管是山区、丘陵，城乡上下，大小炼铁炉，一个个，一片片，长形的，方形的到处皆是，一眼望不到边。长的有十米甚至上百米，叫做土炉。小的是木制风箱炉。炎天暑热，汗水和烟尘，每个人脸黑黝黝积满灰尘，很熟的人见面都不认识了。

登封当时是全省大办钢铁的“先进县”。这是从除“四害”（苍蝇、蚊子、麻雀、老鼠）和大搞卫生开始的。《河南日报》登照片，叫农民为驴刷牙，带上口罩，让人啼笑皆非。

张申：

登封在大办钢铁前，曾用土法炼过铁，这时，登封成了典型，全国都来参观，哲学家艾思奇也来过。他下放到这儿挂职县委副书记，县委书记是蔡振中。蔡振中虚报产量，搞形式主义，我批评他，他不吭气。由登封提出“四无”县后，他让群众在厕所里刨蛆，打苍蝇，给牲口、羊刷牙……省里以此典型推广搞四无专区。我不赞成不行，少数服从多数，地委的领导都同意，我没办法。毛主席来河南搞农业 40 条，蔡振中回答毛主席提问说：三年可以进入共产主义。

1958 年冬天，大炼钢铁进行不下去了。

1958 年 12 月，中央批准取消商丘地区建制并入开封地区，原开封地区西部 5 县划入郑州市，新开封地区共辖 21 个县，1100 多万人口，我任地委第二书记。

1958 年冬，粮食没有了。那年粮食丰产没丰收，浪费惊人。商丘就更为严重，上边还不知道真情，冬天在郸城还开粮食丰收现场会，是“反瞒

产”。可我看到大大的粮食囤，只在上头有一层粮食，下边全是麦秸、麦糠呵，可“反瞒产”却越反越厉害。

这年春节以后开始饿死人了。

周化民：

商丘地区五风严重，原地区专员任秀铎和地委组织部长马振藻两人一同指挥修“潘口水库”，毁灭了几十个村庄，组织男女劳力几万人，在数九寒天挖此水库，还组织几十个女孩子参加“秧歌队”扭秧歌，穿着裙子跳舞。大批庄稼被毁，大块土地荒芜，生活极端困难，劳动强度又大，造成了成百上千人死亡。1958 年，他们在商丘北郊挖了个“东风湖”，是马振藻带着医护人员、设计人员到苏州、杭州参观回来后亲自指挥搞的。全湖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桥和假山。三九天里，北风刺骨，马振藻住在离“东风湖”不远的医院里疗养，逼着机关干部、工人、农民，跳到齐腰的水里，挖湖抬泥，结果也饿死、冻死、累死一些人……

张申：

这年冬天，副省长赵文甫和地委书记陈冰之一人带一个秘书到下边私访，到禹城杜集，一进村口，就见人们浮肿厉害，老百姓哭着说：再不来粮食，就都饿死了。陈冰之从村西头走进一家，见一老人在草窝里睡，看不见粮食，见屋里有个小缸，淹着一缸肉，问：是什么肉哩，狗肉？猫肉？老人哭



公共食堂吃大锅饭

了,说那是我孙女的肉哩!

饿的人吃人肉了!陈冰之再也呆不住,便找到赵文甫,一块看了看那淹女孩肉的小缸!.....

我想说一点真话,讲了点真实情况,还没敢说多严重,可59年8月,我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那时,我是分管工业的地委第二书记。

1959年8月.....

周化民的叙述,比张申本人记得具体。

1959年8月,中共河南省委召开工业会议,通知各地、市的分管工业的书记和工业部长参加。我和当时地委第二书记张申同志出席了会议。会议本来是研究如何组织工业大跃进问题,但后来变成“反右倾”了.....

一天上午,省委常委主持会议,说是要“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如实反映一下大跃进中的缺点和问题、困难,对省委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对当前形势有什么看法也可以讲.....

参加会议同志都经历过1957年的“反右派”,大多心有余悸,但听省委领导启发,也便你一言我一语的提了一些问题,说了一些看法和建议。张申同志比较系统而如实地作了概括发言,我记得你发言内容大概是:上去几十万人大办钢铁,也炼出了些铁,但质量不高,问题很多。平原群众到山区很不习惯,不断发生逃跑,有几个群众逃跑时掉进水库淹死了;赔钱很多,我们财政上也解决不了,要求省委给我们弥补一些。

农业形势本来很好,但像去年(1958年)一样,丰产了没有丰收,粮食浪费很大。人民公社建立是不是太快了?很短时间就发展为公社化了。步子要稳些就好了。.....

在张申说到大办钢铁的问题时,我补充了许多事例:登封县“卫星号外”是假的,是将煤田地面的表皮一剥离,根本就没有往下挖,更没有见煤,就报成产量发出“卫星号外”了。铁的质量很差,中央物资部来一处长调我们的钢铁,我把他带到登封县现场一看,他嘴里不敢说是铁的质量差,因有顾虑怕说是“右倾”,但拒绝按计划调拨.....我还谈到大办钢铁中有许多问题.....

我们发言后的第二天下午三时许,一位副省长和一位省委副秘书长来到我们驻地。他们说张申的发言有错误,让他明天在省委北院礼堂作检

讨。

第二天下午,省委常委书记,二把手杨蔚屏主持会议,他说:“今天召开这个会议,是安排开封地委第二书记张申做检讨,他有‘大炼钢铁得不偿失论’,还有人民公社搞早了,搞糟了等一系列错误言论,下面由张申做检讨。”

张申上台做检讨,他讲了些思想情况,承认思想“右倾”,承认发言中有错误,他讲到犯错误的阶级根源时说:

“我是信阳人,出身于小土地出租者,这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劣根性在党内的反映.....”

主持会议的杨蔚屏立即打断说:“张申,你把那个‘小’字给勾喽!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

张申讲完,杨蔚屏便让各地市发言批判,看来批判的人思想也认识不上去,水平不高,都是软绵绵的。

主持人杨蔚屏做总结讲话,他说:“现在正在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彭德怀给毛主席上了万言书,他跳出来了。中央这次会议正批判他们!张申的思想和彭德怀一样,也是大办钢铁得不偿失论,和彭德怀遥相呼应。张申也反对人民公社、大跃进.....这是一场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要坚决与张申划清界限,斗争到底.....”

从省里开会回来后,省委立即派书记处书记李立,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张健民到开封地委坐阵,亲抓反右倾运动。将开封地区的反右倾作为全省的典型,首先从张申的“右倾”开刀,批判张申,是在地直机关召开各部门负责干部会议,组织对张申的揭发检举,接着是批判斗争。再接着就是批判续凯(副专员)、杨体泽(副专员)、王向明(地委组织部副部长)三位地委常委的“右倾”。

不久,地委副书记耿化武找我谈话:“经地委研究决定,省委批准你要停职反省,老实交待,彻底揭发检举张申,接受批判斗争,争取从宽处理。从此后,在地委机关工业交通系统召开大会,对我进行无数次批判斗争。”

开封地委二十一个县,批了我们半个多月,回地区轮流批,上挂下联。

从1959年9月到1960年3月,约半年的时间,对我进行批判斗争,多少场次则不计其数,而且还有人看管,当然没有什么人身自由.....

地委常委 1960 年元月 31 日批准，划周化民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其地委工业部副部长职务，工资待遇降两级。

批斗结束我在等待处理时，曾令我随一个救灾工作组到永城县检查灾情，安排群众生活。我们一行 8 人到永城后，县委书记韩某安排我们到县委小灶吃饭，被我们拒绝了。这时小灶上吃的是精粉，生活非常特殊，这个书记终日花天酒地，大吃大喝；他的办公案子很大，玻璃板下放着很多模仿毛主席姿势的个人照片，看起来叫人恶心。

当时永城县 60 万人口，已活活饿死 10 万之多，韩书记决定：不准群众外流要饭，不准叫喊无粮无款。他向我们封锁消息，隐瞒实情，说永城群众生活没有问题，拒绝国家发放粮款。我们亲自在城北一个小村的小庙里见有 8 个人饿死在那里，回县要向他反映，他死不承认是永城人，说是安徽人到永城来饿死的！他瞪着眼说：“那是冒充我们永城人，给我抹黑！你们不要谎报灾情！不要上当受骗！不要右倾！”

我顶着“右倾”帽子，回来还是如实报告了实情！

1960 年 2 月 20 日，地委行政科长将我叫去，责令我：“你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下放劳改要将‘工作证’和‘公费医疗证’一两天内送到行政科，以后不能享受国家干部待遇，不能享受公费医疗！”

第二天我将两个证明，将这两件关系我的政治生命和身体健康的证件交给他了！

3 月 25 日，通知我去巩县孝感恩钢铁厂劳动改造，整整一年零九个月……

张申：

我被批斗之后，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从行政 10 级降到 12 级，然后去杞县付集农场劳动改造。

个人的挫折痛苦算不了什么，最痛心的是：从此在党内没有了民主，不敢再说不同的意见，和 57 年反右之后，知识分子再不敢说话一样，整个国家沉默了，人民因此受到更大的灾难，这才在我的家乡信阳出现了骇人听闻的“信阳事件”，因为说天大的谎言，造成天大的灾难。

我的老父亲夏佑铭是民主人士，原来跟我住一起，反我右倾机会主义，他便回到了家乡信阳，

成了这事件的目睹者。1961 年，我平反后，他又回到开封，是开封市文史馆馆员，民主人士开会，他提出信阳事件就激动不已：死的人到处都是啊！比我们解放信阳市打国民党兵团司令张轸时两方死的人都多得多呀！

据当时统计，光信阳一地，饿死百姓一百多万！

张申说到这儿，说不下去了，他眼里含上了泪花，虽然这已是四十年前的往事，说来还历历在目，如在昨日！

我听着，心里很沉重，我向老周说：谁能详细说说信阳事件吗？我要写谎言的悲剧，应该不忘这民族的大悲剧。

老周说：住在我楼上的是开封市纪检委书记姚学智，已离休，他最了解。回去，我们去访他，他也很愿把这情况告诉别人，让人们记住这段历史……

回到开封，老周领我认识了原开封市纪检委书记姚学智，他 80 岁，身体好，腰板直挺，满面红光，说话膛音很大。他在 1944 年参加工作，当过“愚公移山”移动的王屋山地方的小学校长；1955 年任省委农村工作部生产处处长兼办公室副主任。

姚学智的职务，使他亲眼目睹、亲自调查了河南信阳所发生的那场历史大悲剧的前前后后……

提起那段往事，这位 80 多岁老人记忆犹新。

姚学智：

信阳遂平县嵯峨山人民公社，是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也就是在这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放出的中国第一颗小麦高产“卫星”！

1958 年 6 月的一天下午，管农业的副省长彭笑干、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赵定远让我去省政府谈生产问题。我到后，见在遂平嵯峨山人民公社蹲点的信阳地委秘书长赵光手拿一把麦穗正汇报哩：“这是嵯峨山公社韩楼大队的麦子，两亩 9 分地亩产 3800 多斤哩，这千真万确，没有错的！”

我听到这数字大吃一惊：咱整天和农业打交道，平时一亩地麦 200 多斤就不错，咋会冒出个三千八百斤？所有人都表现吃惊，可谁也没说“不信”！

赵定远说：“老姚，你把赵光同志安排在省招待所，让他写个报告，明天早上交卷。”

我领赵光去了招待所，安排好，他写报告，我走了。第二天，我把他的报告拿来交给了赵定远副部长。第二天，就在《河南日报》头版头条登出来了！

这就是全国放出的第一个小麦高产“卫星”。

1958年秋天种麦，省委组织工作组，我是组长，去新乡检查生产。人们去大办钢铁了，麦子种不上，越说谎话越要表扬，叫“气可鼓不可泄”！大食堂的馒头扔的到处都是。我问生产队长：“这么吃，能吃几个月？”生产队长说：“吃三个月。”吃完后咋办哪？”“有国家管哩，都要共产主义啦，还能叫饿着吗？”

我到济源县王屋公社，见县委书记，我问：“你这劳力都大办钢铁了，没人种地，你还吃饭不吃饭？”

他不吭气，后来，他小声告诉我说：省里点他的名字，我不去大办钢铁，行吗？

新乡获嘉县委书记看到劳力情况严重，把大炼钢铁的劳力调回来了。地委书记把他叫去。问他为何这么办？他说：吃不上饭，不种地，吃铁疙瘩能行吗？地委书记让他写检查，他说：中啊！只要让老百姓吃上饭，咋让我检查都行啊！

这在当时可不容易呀！

1958年夏、秋两季的粮食征购，让嵯峨山区的老百姓们大难临头，惊恐不安！遂平县实际粮食2440万斤，可下来的征粮任务是9000万斤。因为县账面上是100279万斤，比去年增长3.1倍。

这能怪谁呢？这数字不是你们吹出来的吗？产量人均粮食已达1565斤，根本吃不完，你不交给国家干什么？

这个9000万斤的征购指标是河南省委召开的征购会议定的。省委书记吴芝圃主持会议说：今年全省粮食放了卫星，人均粮食超千斤，已向中央报了数，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表扬。所以要下大力搞好粮食征购，在征购粮食中要大放“卫星”；加强领导、书记动手，政治挂帅，大辩论开路，对任何迟疑、畏缩、瞒产、耍滑的行为，要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逼着县委表态报高产，规定不能低于亩产500斤。谁报低，路宪文便组织人辩论，这一斗，把产量斗上去了。县委书记蔡中田和同来开会的人商量：报低了过不了关，报9000万斤，说不定还过不了关哩。可把粮征光，老

百姓吃啥？蔡中田说：先过今天这一关再说吧。

和兴乡十一分队队长吴国祥是硬汉子，会计问他咋办，他说：“先留下种子和口粮，其他的都扯淡，有多少交多少！”完不成任务咋办？他说：“天塌下来我顶着！让老百姓饿肚子，没门儿！”他硬是留下万把斤种子和口粮，上级一次次催交粮，他只说没有，上级急了眼带找粮队半夜里偷袭进村，挖出存粮，把吴国祥五花大绑带走了。他临走对含泪的乡亲们说：老少爷儿们！我对不起你们啊！

天啊！是谁对不起父老百姓呢？

老百姓被逼无奈，交粮掺假，把当年对付日本鬼子的办法都使出来了！

终于9000万斤任务完成，家家户户家徒四壁，在县大礼堂鞭炮齐鸣庆祝胜利时，老百姓啼饥号寒，抢地呼天！

1959年8月，在嵯峨山食堂喝着越来越稀面汤，人人脸上浮肿之时，没想到远在天边的庐山开个什么会，之后，莫名其妙开展反右倾运动，更使人心神不宁了！

嵯峨山公社先是集中开会。开始，人们互相打听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是哪村人，怎么犯这么大错误，后来才知是朝廷中的大臣，激怒了天子，所以要全民共诛之。

可批判会总不热闹，干部着急，便要每个小队找出个“小彭德怀”来站在中间，联系实际。遂平县委高度评价这做法。嵯峨山有361名大小队干部，莫名其妙被当成“小彭德怀”，斗个鼻青脸肿；有458名群众因偷吃牲口料被当小右派斗。

从1959年11月至1960年7月上，信阳地区在反右倾追逼粮食中正式由公安机关逮捕1774人，36人死在狱中，拘留10720人，死在拘留所的667人，处处都有阎王殿，只见活人去，不见活人还。

1960年冬，我参加信阳地委领导在驻马店参加县委第一书记会议。我和正阳县委书记住一个房间，他说：“老姚呀，不得了啦，你不知道下边饿死的人厉害得很哪，光正阳县就死了几万啦……”

我回来问蔡中田：嵯峨山公社饿死多少人？他回答说：死300人。我回到嵯峨山问陈炳寅书记，他也回答：死300人，原来是县里布置统一了口径。

省委副秘书长打来电话问我：嵯峨山公社死

多少人？我回答：我听县委书记、公社书记说 300 人。晚上，省纪检委书记焦祖涵来电话也问我：嵯峨山到底死多少人？我还是做如上回答。他说：一定要搞确实。

我看省委如此重视，我不能只听汇报，要亲自去调查。

我先到一个村，村干部说：俺村就死二人，还是老头，该死了。我出了队办公室，在路上遇到一群妇女，却哭着诉说他家里饿死人，这一统计就是四五十人哪！

我又去了一个村，也死了几十个人。

这样全公社估算要在三四千人以上啊！

我回公社专门叫各村支书来汇报死亡人数，可支书却不在了！

这个公社的南尧大队，一家老人饿死了，只剩下两个哥，一个妹妹，冬天晚上烤火，哥问弟：饿不饿？饿了咋办，咱不能等死啊！两人一商量：吃了妹妹吧！便把小妹打死，在火里烤着吃。当家叔叔闻到烤肉味儿，过来一看，哥儿俩正烧妹妹的大腿撕着嚼呢。便大骂他们，他们像没听见，还撕着吃，把啃完的头骨放在窗台上，叔叔报告了，公安局来人抓他俩，弟弟跑了，哥哥被抓去，又送回来了——在路上死了。逃走的弟弟也饿死了。

我去调查，有两个村已死绝了，尸体倒在街

头，没人掩埋，真是惨不忍睹哇！

我跑回省里，向省领导做了汇报。先找到副秘书长王秉璋，他问嵯峨山死了多少人？我说：根据我独自调查，死人在 3000 以上。他说：已给中央写报告，报了 300 人，这咋办？

在省常委会上，我汇报嵯峨山死人实情。

杨蔚屏感到问题严重，派管农业的副秘书长崔光华跟我一块再去嵯峨山调查；让我先写个情况，由机要室打印了。把我写的情况上报中南局。

那天我住在遂平招待所。第二天，中央来了陈正人、陶铸、吴芝圃、李立副书记，从信阳乘大轿车直奔嵯峨山去，我也到了那里。

陈正人问县里干部：这个公社死了多少人？

回答说：一千多人。

陈正人说：工作组报告三千多人，怎么回事？

这是指我写的报告，到底是谁说假话，欺骗中央？我说召开全公社各村的贫下中农代表会，一个村一个村的报，就把死人的盖子揭开了。不是 3000 多人，而是 4000 多人哪！我让会议延长一天，把死的人名单拉出来，看着这厚厚一摞密密麻麻的父老乡亲死者的人名，那些想隐瞒真相的人还有什么话说？

（选自任彦芳著长篇纪实《焦裕禄身后纪实》）

（责任编辑 杨继绳）

## “治方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征文启事

2008 年，是举世瞩目的中国改革开放 30 周年，也是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先生诞辰 100 周年。在左祸深重的年代，孙冶方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曾不惜身陷囹圄达 7 年之久。改革开放大幕拉开，孙冶方又以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无畏探索，得到国人的高度崇敬。回顾改革开放 30 年的历程，既是对改革开放的最好纪念，也是对孙冶方的最好怀念。为此，“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与本刊联合发起“治方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征文活动。

### 一、征文内容：

改革开放 30 年历史的进步，一方面可以从中央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台来诠释，另一方面可用亿万百姓所身临其中的每一步印记来展现。本次征文以这两方面为主。要求：1、以“亲历、亲为、亲

闻”一事情为题，突出“小事件，大历史”的主题；2、以纪事本末体讲述 30 年来的一个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作为，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历程。

二、时间：2008 年 4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

三、评奖及颁奖

本次征文的优秀文章，将陆续在《炎黄春秋》发表，并付稿酬。征文结束后，由大赛组委会评选出获奖文章，颁发奖金和奖牌。颁奖仪式于 10 月孙冶方诞辰 100 周年时在“治方书院”举行。

投稿邮箱：xqq0825@126.com

投稿地址：100045，北京西城区月坛南街 69 号炎黄春秋杂志社 请在信封注明“治方杯征文”字样

# 我打谷志有

王克明

为了让自己觉得打一个被批斗者没错儿，我曾经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警惕他，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疏远他，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不敢面对他。三十多年来，我十几次回我插队的余家沟，想靠帮村里做些事，来减轻心底的负罪感。但这种罪责压着卸不掉，一直沉重。直到我觉得必须清算自己，才走进他的窑洞，为了那一拳，向他道歉。

到陕北插队的第二年，我们已从饥饿中走过来，但还没从文革江湖的习气中走出来，还没成为人们记忆中破衣烂衫的一代知青。我那时不爱劳动，日工分只给7分，头一年下来挣了700多工分，大部分时间都换了衣装歇着或串队去了。偶尔听说哪儿杀猪了，无论远近，一律去吃。那时，最舒缓情绪的事情是唱歌，最兴奋情绪的事情是打架，甚至跟同学纠集一起翻沟越梁几十里去夜袭别人。1970年头上，劳动仍然是件痛苦的事，理想的状态还是在山沟里游手好闲。但每遇人家收工回来，总有点儿无地自容。

忽然有一天，来了个“一打二反”运动，没多久改叫了“一打三反”。每个生产大队都得至少指定一个人，用于批斗。我们村没地主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富农有一个，但生活太贫苦，人又太本分，没人想起来去斗他。于是，惟一算得上有问题的“四清下台干部”谷志有，就不幸被选中了。

谷志有是我们余家沟的一个普通农民，那会儿也就三十多岁。他小时候随娘老子逃荒到这深山沟，住进了一个破旧的古窑洞，开荒种地，打粮为生。人民公社化后，他入党当了大队书记。那时候余家沟吃糠咽菜，他同样家徒四壁，却不知为什么在“四清”时被开除党籍，当不

成队干了。这成了“一打三反”他入选批斗的天然理由。而当时他的“现行”只是说了句“天上三环套，地上人脑袋(pào, 落下很多)”。这是句很像谶语的谚语，在山上集体劳动时，他聊起了。大意是出现一种三环相套的天象时，地上要死很多人。具体预言什么，我现在也不知道，可能是指旱灾——那年夏天陕西旱了两个多月，放在古代就该死人了；也可能是指杀人——“一打三反”是文革期间的一个死人高潮。当时我只知道，这是谷志有猖狂攻击毛主席和文化大革命的反动言论。

运动一来，我压力骤减。因为，第一，要没完没了地开会。我最喜欢白天开会，不上山干活儿就给记工分，最适合游手好闲者。第二，游手好闲者也不能少了对毛主席无限忠诚。拉下表情，喊响口号，就解决了，可不像上山劳动那么累。第三，插队前，因为亲属里被打倒的人太多，我没能参加红卫兵暴力造反，在一边儿失落着。眼下，能实践一下革命“是暴烈的行动”了，我“痞子”般地跟着哄，有了点儿人上人的感觉。第四，刚到农村时，曾立刻寻找地富反坏右，想看敌人什么样，没找着，又失落了。饥饿和劳苦让我们觉得这革命没啥意思，突然弄出个敌人，马上恢复了解放全人类的激情。

天天开会确立了谚语的反动性质，组织者便把谚语作为阶级斗争成果汇报给了公社。公社在我们邻村万庄组织了一次集中批斗会，这条大山沟里的几个生产大队，各出一个批斗对象。我们余家沟出的就是谷志有。

那天全山沟里的农业生产全停了。只要参加会，就给记工分，包括谷志有。因此，没人不来。婆姨女子们换了干净衣裳，娃娃们也跟来

了，热闹得很。有人笑问谷志有：“今儿斗争你？”他笑：“噢嘛，运动嘛，要有个斗上的。”开上会，批斗对象被押到前面，低头站好，大家就静下来了。各村运动组织者发言批判自己村的人。我们村儿的发言主题是谷志有恶毒攻击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死了很多人。然后，安排角色质问谷志有。不管他怎么回答，角色都做愤怒状，用这样的办法来煽情。我和众人便一起严肃地跟着喊口号。

一散会，队干让把谷志有带到旁边一处树阴下，坐在个磨盘上歇歇。有社员端来水给他喝。我和几个男知青却意犹未尽，起哄般围了上去。

“谷志有！”

“哦……”

“‘天上三环套’是什么意思？”

“哎——没意思嘛……”

“你他妈不老实！”

“我咋咧不老实了嘛……”

“你他妈反毛主席反革命！”

“哎呀，我不反咧嘛……”

“你他妈老实交待！”

“哎——受苦人——交待甚了嘛？”

坐在磨盘上的谷志有，是个头戴白羊肚手巾的陕北庄稼汉——受苦人。可是这会儿在我脑子里，他只是个反革命、一个敌人，应该卑躬屈膝地面对我这个高高在上的革命者。他老实本分的答话，我听着都是对抗。你还不服？我心说，对敌人绝不能温良恭俭让！于是，我突然喊了一声：“你他妈还敢狡赖！”便跨前一步，扬起右臂，抡圆开来，照着他的脸就狠狠一拳！

周围社员大惊，围上来挡住我。队干也赶过来：“咋能打人咧！”把我拽开了。我扭头看到“敌人”一声不吭，缩头靠倒在磨盘上，鼻子、嘴那儿一片鲜红，心里一紧：把人打出血了！但马上告诉自己：他是敌人。只要他是敌人，就能打。于是我喊：“他不老实！”

那以后，在小小的山村里，我和这位陕北庄稼汉一起耕种锄割、背打扬场，又共度了八年多。他从没跟我提起过挨斗挨打的事儿，却常帮我，磨镰擦锄、盘炕垒灶什么的。有点儿好吃的，常记着我。我常肚痛难忍，他每听说，都来我窑

洞里，耐心地给我按揉肚子，总是有效。我卧病时，他用三角针给我指尖放黑血，让婆姨煮好白面条，卧上鸡蛋，端到我炕前——那时他们自己根本不敢吃奢侈的白面面条。他对我说，你一个北京娃娃，娘老子不在跟前，落难到这乡里受苦，实在不容易。我忽然心酸，扭过脸去，悄悄地任泪水流下。

但是，我对他的敌意曾经弥久不消，总提醒自己：他“有问题”。什么“问题”？挨过斗。其实，我压抑感激之心、相处之情，固守这么个论断，就是怕把我打他说成是错的。我那是革命呀！我是革命的，他就一定得“有问题”。这是在不可理喻地否定他人，为的只是收获自己的高傲。所以，问题根本不在于他挨过斗，问题只在于我打过他。任何时候，我见到他，跟他一搭儿，都会想起我那一拳，想起他脸上那片血。梦魇一般，摆脱不掉。但是，一个现成的借口，能让我随时给自己免除责任，那就是：我是为了革命。因为毛主席教导说：“他们在革命期内的许多所谓‘过分’举动，实在正是革命的需要。”直到后来想起那谚语只觉得幽默时，我还要对自己说：我是为了革命。

这就是“以革命的名义”。这种名义承自苏俄，祸及中华。整个文革，以革命的名义，我就有理由指定敌人；以革命的名义，我就有理由对人施暴；以革命的名义，我就有理由决不道歉；以革命的名义，我就有理由说自己永远正确。

仅这一拳，就决定了我是文革参与者。对此，不是一个道德愧疚可以了得，而是应该对文革承担点儿政治责任。因为，在文革政体中，我参与了“一打三反”那种有组织的政治活动，分享了利益——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平安自保”、“政治可靠”。文革中的“无限忠于”，是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反动。我们“三忠于四无限”了，专制极权才可能肆无忌惮。

说起来，我曾经狂热拥戴。对江青那种人的厌恶和仇恨并没影响对文革发动者的热爱。那虽然不是民选产生——对此谁都没有投票责任，但从众的拥戴行为支持极权不法化，支持破坏国家制度，因此成为政治行为。拥戴者是躲不掉这种责任的。

我曾当积极分子。积极分子就是罪过参与

者。在那种有组织、有计划的迫害运动中，我出手打了谷志有，就成为事实上的积极分子。

“四人帮”审判后，文革发动者不用对文革承担责任了，在文革中无限忠于文革发动者的我们，也不用对文革及其罪过承担责任了，全一笔勾销了，全轻装前进了。但是，不会对反文明负责的话，怎么能学会对文明负责？我如果用年轻的真诚来为自己辩护，就永远不会知道自己曾经良知泯灭。我如果不用对罪过负责，就永远可能再次拥戴罪过。

那次运动中，我们村儿还批判过一个受苦人郝祯有，也是因为他有反动言论。一句是“万寿无疆，挣断驴缰”，一句是“毛主席万岁，农业社倒灶八百辈子”。不过运动没完，他就迁出余家沟了。三十二年后，我找到郝祯有，问他当年挨批判是怎么回事。他说那是另一老汉诬告所致。当年老汉们常相聚赌博，时日久了，另一老汉欠他赌资高达十几元钱，他索要多次未果。一天见那老汉出售自制粉条，他便上前说买一大堆，扛上肩转身就走。那老汉追他要钱。他说，你欠我的钱比这多。那老汉便无奈。适逢“一打三反”，那老汉告密于组织运动的知青，说在山上劳动时，郝祯有说反动话。组织者喜，审郝祯有，令他坦白。他本不曾说过，审之茫然，数次未果。组织者便诱其女儿：让你爸承认就没事儿了。她们教他女儿记住“挣断驴缰”这句话，回家教会她爸，明儿来承认。女儿答应，但一进家门，就忘了那词儿，急得哭起，导致她爸“拒不交待、顽固不化”。这件事当时组织者也汇报上去了，也是余家沟的阶级斗争成绩。

三十多年，我一直以为郝祯有真的说过幽默可笑的“挣断驴缰”，真的说过远见卓识的“倒灶八百辈子”。没想到，跟谷志有那事儿一样，更是当年构陷。那年头儿，打倒别人，成为自我荣耀和获取利益的唯一途径。

也是那年，一天夜晚，我们村儿饲养员在牛圈角落里发现一个黑影，紧张地告诉了我们男知青。我们便“抓”到了一个天然的“敌人”。天上掉下个敌人来，我们兴奋莫名，把他带到村外小学校土窑洞里，严加审讯。他是个南方的农民，顶多三十来岁，头发蓬乱，面目黧黑，身形瘦小，形容枯槁，黑衣破旧，双眼恐惧，一口方言，我们

一句也听不懂。我们听不懂，就等于他不交待。于是，我们用绳子把他捆住，拳打脚踢。他声嘶力竭，大哭大叫，听得出来——其实看都看得出来，他冤屈、痛苦，更恐惧。而我们却为捡到个敌人而兴奋，沉浸在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之中。最后大体弄明白，他在牛圈里偷吃牛饲料。

队干赶来，看我们太不像话，就说县里有个遣送盲流的遣返站，明儿一早送去得了，现在赶紧休息。这才止住了我们的殴打。队干给那个人弄来些水和吃的。见了吃的，他紧张地环顾周围每个人的眼睛，确认允许，就像没遭过拳脚一般，一扑上去，狂吞狂咽，旁若无人。他太饿了。看着他吃，我不自觉地冒出一个念头：这人真可怜。但是，不能忘了他是“敌人”。我们怕这个“阶级敌人”夜里逃跑，就把他牢牢捆在一张小学生双人课桌上，让他这样睡了一夜。

第二天，队里派我和另一个男生送他进城。给他吃了早饭后，我俩学电影和“小人书”里的样子，把他五花大绑，猛推一把，厉声说道：“走！”就押送“敌人”上路了，沿着弯弯曲曲的小路向山外走去。他双手捆在身后，个子又小，我们嫌他走得慢，就推搡：“快走！”走到一条小溪面前时，他突然双腿一弯，扑通跪下。我俩大惊：“你干什么！”却见他低头就水，咕咚咕咚喝了起来。山里溪水很浅，一碰就泛泥，我们那儿社员都不喝。我站立在旁，俯视他双手反绑、跪身下跪喝泥水的样子，心里忽然别扭，又冒出“这人真可怜”的念头，随口说：“这水哪儿能喝！”那男生也说：“太他妈脏了。”等他喝够自己站起，又往前走，我俩才随后跟上。进城路走了四五个钟头，他灰心木讷，一句话没说过，我俩没再推搡，没再催促。送到遣返站，我们问：“这人怎么处理？”答：“送回原籍。”把人交进去，取了收条，我们找食堂吃肉粉汤，坐下无语，半天，几乎同时说：“这人真他妈可怜。”

后来我总想起这事儿，总想起那人真可怜，总想起我们对他的虐待。这件事情上，我早已对自己嗤之以鼻，觉得那简直就是“以革命的名义”的青春施虐狂。但是，当我近年看到介绍南方文革屠杀事件的资料时，我忽然惊恐不已，又

想起了他。那个人的方言,恐怕就是广西、湖南什么地方的。而那会儿的他,能千山万水,远上陕北,昼伏夜行,潜入深山,远避人烟以隐身,偷吃饲料以果腹,可想而知,一定是面临着极为严酷的死亡威胁。我的天,他该不会是1968年屠杀的幸存者吧?或者,是“一打三反”镇压的幸存者?如果他是1968年就开始逃亡,那他就是灭门屠杀对象,被送回原籍,必死无疑。如果他是1970年才开始逃亡,那他就是“一打三反”枪毙对象,被送回原籍,也必死无疑。那是在文革杀人高潮期呀,而且可能他的故乡在屠杀。如果是这样,他极端艰辛,极度恐惧,便仅仅是为了苟延生命、残喘呼吸。可是,余家沟却成了他逃亡的终点。这时,我才惊问自己:我们做了什么?

谷志有还住在那个破旧的古窑洞里,白羊肚手巾还系在头上,已经沧桑老态、步履蹒跚。但他总算等来了我的道歉。等了半辈子,他终于听到了我对他说:“对不起”。他笑了,说:“嗨!运动嘛!你们那则会儿娃娃家,解下(懂)个甚!”他知道我喜欢陕北,就把年轻时婆姨给他细纳的一双精美遍纳鞋送给了我。50年了,一直贫穷的他,从没舍得穿过。

可是那个人——那个被我遣送的人呢,你在哪儿呢?你还活着吗?你还能听到吗?一个在你的逃亡终点虐待过你的人,一个最后指定了你的“敌人”身份的人,一个可能把你押送上了死亡之路的人,三十八年后,在向你道歉,向你谢罪。遣返站里也没人能懂你的方音吧?不知道该往哪儿送你吧?你就这样躲过劫难,至今安度晚年了吧?你有这种幸运吗?你该不是早已死于屠杀,成了冤魂饿鬼,听不见我的谢罪了?那么,只能等来世了,来世我们还会相遇。哪怕是地久天长,我也一定要你听见:对不起!

我们同样是人,为什么一定要划分敌我?多年以来,在否定自己有害他人的不道德行为时,我实际上一直回避这些事儿,对过错羞于启齿。直到明白人性的原则高于一切,我才懂得:必须道歉。回避过错,实际上还是在漠视曾经的人间苦难。以人性反思,我才觉得,我们每个人的忏悔都可能成为人类文明的经验。

文革年代,我也“忏悔”过。但那不是面对人性的忏悔。“灵魂深处闹革命”的结果,是决心献

身。经过时间证伪,那成了说谎。那时,人们面向专制的忏悔,有无知洗脑的感恩,有极权高压的被迫,也有趋炎附势的自觉,因为任何非毛泽东思想都可以成为罪行。在初识思想之光时,我也差点儿成为“反革命小集团”一分子。那时,忏悔是专制统治的工具。

面向人性的忏悔也使我知道了我们不得不承担的历史责任。这种责任就是建设一个限制暴力、诬告、陷害行为,使它们不能发生严重恶果的制度。和平年代里,用夸大阶级仇恨来制造敌人,用继续革命来迫害同类,用迷信和崇拜来挑起鄙视人权的自相戕害。这是为了什么?又为什么能搞成?忏悔和反思,才能找到并杜绝政治制度、社会价值和政治文化层面上的灾难根源,避免灾难重复。一个人性的、文明的制度应该是:毛泽东主席有权认为他身边出现了修正主义,但是制度能制约他的行为,能保证他以人类文明的方式进行他的战斗。

我问自己,为什么我可以几十年不认错儿?几十年后才想起来道歉?我想,是因为制度不需要我道歉。而在积极建设民主制度的今天,个人的忏悔反思具有反抗非民主的人性价值。

面对后代,我不愿意自己被看成精神侏儒般的长辈,不希望自己被看作害怕历史的矮人。我们不再“以革命的名义”了,但是能换成“以真诚的名义”吗?即使那会儿我真的只是被洗了脑,只是理想主义、革命狂热,我也应该把那种失去自我的行为恶果告诉孩子。让孩子思考:那是为什么?让孩子警觉:不要那历史重复。让孩子清醒:惟有一个文明的制度才可以避免发生那些事情。如果孩子们记住了,我们的个人经历就成为历史的经验了,我们曾经的青春才能有点儿价值。我对孩子说,不要放弃对灾难的记忆,否则灾难会降临于你。

我们从自己的历史中找不到回归之路,只能选择新事物的诞生。民主是所有人的共用,人权是所有人的共享,包括谷志有、郝祯有、那个人,和我。

人过中年,我明白了:没有敌人。

(责任编辑 杨继绳)

# 列宁时期党内民主是如何被破坏的

尹彦

俄国共产党原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它的“民主”、“社会民主”并非有名无实。后来走向斯大林个人“拥有无限的权力（列宁语），列宁逝世后，又进而走向个人独断专行，列宁时期党内民主被破坏殆尽。大致勾画它的历史过程，当不无好处。

## 一、民主的历史 民主的设计

十月革命前的十七年里，列宁有十五年是在侨居于西方的，有很高的民主素养、作风、习惯。所以终列宁的一生，虽然起初他强调党的集中制，但是党内民主的发展，基本上实现了“十二项可以”：

- 1、可以在党代表大会上作观点不同的副报告。
- 2、可以在适当的场合提出自己的动议、议案，发表自己的意见和主张。可以按党纲选举党代表。
- 3、可以将重大的分歧及疑而难定的问题交付全党讨论表决。
- 4、领袖、领导层可以和最高领袖争论并可以批驳他，向他提建议。
- 5、可以讨论和批评党的错误。甚至在激烈战争时期也要“创办报刊、争论专页等来更经常、更广泛地批评党的错误和开展党内各种批评”。（《列宁全集》第39卷，第288页。）

6、在党代表大会和党中央未作出最后决定时可以否定最高领袖的提案。

7、可以宽容那些曾经激烈反对过自己的同志，并与之亲密合作共事。

8、在可能发生决策重大失误时，下级党组织可以通过不信任中央的表决。

9、可以在党代表大会上及各种会议上递条子、提问题、提出质询、批评领袖。

10、普通党员也可以在规定的形式范围内和领袖辩论，维护自己的观点。

11、可以由党代表大会选出的专门委员会检查党中央委员的财务收支，并向大会报告审查结果。

12、可以而且必须监察、检查党的最高机关与高层领袖。中央及地方监察委员会，与同级党委委员会平行；中监委要监督中央的决策、决定；同时对总书记到各中央委员，都有质询权，检查文件权。

而俄国二月革命后和临近十月革命前，列宁所设计的政治体制，也可以说是“比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千百倍”的。比如：《四月提纲》、《国家与革命》就提出了：

- 1、直接民主制，官员选举产生，并能随时撤换。请注意“直接”二字。
- 2、官员的工薪不得高于工人的工资。
- 3、集中制丝毫不排除广泛的地方自治，这种地方自治一定可以消除任何自上而下的命令主义。因此必须取消由国家任命的一切地方和省的政权机关的官员。
- 4、甚至军队也彻底民主化，由选举产生自己的指挥员。
- 5、废除常备军，设想无产阶级所建立的国家是“立即开始消亡，而且

是不能不消亡的国家”，因而成了“半国家”。

6. 这个“半国家”要“使所有的人变为官僚，因此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

但事实很快证明，列宁这些设想是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相反，为了保住刚刚得到的政权，他不得不解散自己曾力争得来的立宪会议，镇压社会党人与孟什维克的反抗与叛乱，并且坚决采取一系列严厉的恐怖手段。这样一来，党外民主一再收缩，乃至无法实现。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只能体现于党内民主上了。尽管如此，党内民主已经面临巨大危机，但大致还属基本正常，尤其是党的上层是实行高度民主的。但是党外的非民主必然传染给党内民主。党外的恐怖有移植于党内的危险，何况还有客观局势对民主的种种限制呢？所以，列宁时期党内民主隐患严重。

## 二、从集体领导到个人拥有“无限权力”

列宁根本没有想到，要将无限权力集中到某个人手中，但斯大林却无意与有意地做到了这一点。

俄国二月革命前的俄共（布）前身——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从未设主席。在中央全会闭会期间，一切工作由全体会议选举的中央局领导；在国外活动的则由中央委员会委派的、由五个中央委员组成的国外局领导。这“中央局”、“国外局”，看来就是后来政治局的前身了，它也没有设主席。那时没有什么书记处，更没有总书记。如果说有的话，那么列宁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就是全部“中央书记处”，它的任务是：担负通讯任务；负责来往文件；党的财务，分发党费；为来访同志办理假护照，寻找住处等等。也就是“秘书”，在俄语中秘书与书记是一个词。二月革命后，有了正式的书记，即另一个老布尔什维克妇女斯塔索娃担任书记。她的主要任务依然是事务性的。

1917年8月举行六大，它所制定的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从自己的成员中“选出核心组处理日常工作。”这时还没有组成政治局。但是根据局势发展的需要，1917年10月23日，中央委员会选出了7人组成的武装起义政治领导局，但并未起作用。起义之后的第三天，又成立了党中央的

“四人小组”，成员为列宁、斯维尔德洛夫、托洛茨基、斯大林，他们有权在其他中央委员不在斯莫尔尼宫时，决定“一切紧急事务”。这就是最早的“政治局”——不过这是革命起义后的临时机构，并非常设机构，并且那时中央全会几乎三五天就举行一次，“仅在革命前三个月，中央就举行了三十多次会议”，所以十月革命前后，一直到1922年，俄共实行了地地道道的集体领导，不存在个人独揽领导权的现象。那时，党的领导人在党内没有任何官衔。中央全会和后来的政治局会议以至党代表大会，均由列宁主持。列宁不在时由加米涅夫主持，当时他们没有任何党内职务。

俄共七大（1918年3月）之后，党中央的直属机构只有一个，即书记处，它由五名中央委员组成：斯维尔德洛夫、斯塔索娃、捷尔任斯基、越飞、穆拉诺夫（前三人是列宁原追随者，后二人是托洛茨基原追随者）。其负责人为斯维尔德洛夫，应当说，这也就是“总书记”。此时书记处的职权大大扩大了，除了负责秘书事务外，还兼管组织工作，这就是总书记、书记处也掌管人事组织大权的由来。这里无意间为斯大林以后集无限权力奠定了基石。此为第一步。

按照十月革命前的设想，苏维埃包括各政党，自然布尔什维克党只是其中之一。十月革命后，也曾设想过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乃一切权力之本。或者如列宁所想的：“……全部政权归人民委员会。苏维埃代表大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监督它的活动，它们有权罢免各委员（部长）。”但是这些设想是多党制苏维埃或多党政府条件下的设想。由于解散立宪会议，确立一党制，苏维埃及人民委员会的领导职务统统由党员担任（个别例外），党员又必须执行中央的决定，因此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实权在党的中央委员会，而地方苏维埃又完全听命于同级党委会。最后权力自然集中在党中央和政治局。有人责备俄共（布）一党专政，1919年7月31日列宁回答说：“是的，是一党专政！我们就是坚持一党专政，而且我们决不离开这个基地……”（《列宁全集》第二版，第37卷，第126页。）后来季诺维也夫对“一党专政”作过解释：“党的中央委员会也是苏维埃、工会、合作社、省执行委员会和全体工人阶级的中央委员会，它的领导作用就在于此，这就是党专政”。（《马、恩、

列、斯研究》中央编译局,1999年第四期,第145页。)这就是“党管一切”的由来,也许“专政”二字用在这里太刺耳,姑且说是“加强领导”吧。这里为斯大林集权推进了一大步。此为第二步。

为了完成上述领导任务,党中央机构必须扩大,八大(1919年3月)根据季诺维也夫的建议,对建立党的机构作出重大决定:“设立1,政治局;2,组织局;3,书记处”(《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一分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66页。)在代表大会上,曾有一些人反对成立政治局。奥新斯基说:“请允许我谈谈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提案……政治局……有权决定一切紧急问题。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每月才开两次会,而且,如季诺维也夫小心地提到的,是为了讨论一般政策问题,……换句话说,中央委员会只不过是讨论讨论而已。这一切的实质是,由五人组成的政治局决定所有重要的问题,而全会只进行一般性谈话,讨论。这样一来,其他的14个委员都降为次要委员了。”这样,政治局会议取代了中央全会。“政治局后来不仅决定紧急问题,而且决定一切问题,只不过把决定通知中央委员而已。”同时十七大之后,中央委员会“不再是每月开两次,而是两月开一次;再则,全俄党代表会议不是每季开一次而是半年开一次。这就使政治局成了党的、因此也就是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国际的实际主宰机构。”(以上引文出自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第484、485页,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同样组织局五名成员,有三名成员持托洛茨基观点,另两名是斯大林、李可夫。1920年3、4月,用列宁的话说:“我们党每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由大会选举出的十九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领导全党,而且在莫斯科组织日常工作的则是更小的集体,即由中央全会选出的所谓‘组织局’和‘政治局’,各由五名中央委员组成。这样一来,就成为最地道的‘寡头政治’了,我们共和国的任何一个国家机关没有党中央指示,都不得决定任何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列宁选集》第三版,第4卷,第157页。)由此可见“寡头政治”在向“掌握无限权力”又进了一大步。此为第三步。

列宁及其战友异常重视党与国家机枢所在的人事组织工作。八大的组织局也由五名中央委员组成,斯大林同时进入政治局与组织局,兼管组织局。原来由中央书记处兼管的组织工作,现在转由

斯大林为首的组织局专管了。“指导党的全部组织工作”;“组织局至少每周开会三次”。(《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一分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66页。)这是斯大林集权的第四大步。

1920年4月的九大,决定“由三名中央委员担负书记处的日常工作”。这三名书记都持托洛茨基的观点。由于1920、1921年,俄共党内接连发生一系列争论,而在工会问题上,托洛茨基与列宁发生激烈争论,工人党员也不满托的“工会国家化”的主张,所以在党的十大,这三名持托洛茨基观点的书记都落选了,不再担任书记。书记处改由紧紧追随斯大林二十岁才出头的莫洛托夫负责。组织局的成员也发生了变化,再也没有托洛茨基的追随者了。这一来斯大林事实上不仅兼管组织局,而且也兼管书记处。到了1922年4月俄共十一大后,斯大林不仅同时进入政治局、组织局,并正式进入书记处,还成为书记处的总书记。此时,列宁早已抱病在身,很少工作。斯大林此时已经集三要职于一身,此外还另外兼任六部委的负责人。同时,党外的报刊已被查封。党内的批评自由也受到控制。斯大林的权力几乎不受监督、制约。所以,此事引发了列宁的忧虑:“斯大林掌握了无限的权力”。斯大林正向“个人独裁”走去。

### 三,直达独断专行的通道——任命制取代选举制

官员由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为人民服务,随时可以撤换。这是《四月提纲》《国家与革命》一再强调的“四部曲”。可是解散立宪会议后,否定全国实行的普选,而叛乱、内外战争、灾荒遍野、经济崩溃,此时谈何选举?相反,必须实行极端集中制。委派制取代选举制势所必然。只有在有限的范围内,比如列宁患重病前的几次党代会,还实行某些选举,其它则一律用委派制代行。列宁时期,委派了20—40万干部(计划60万)。九大时根据加米涅夫动议,“组织局有权毋须经过政治局批准决定有关组织方面的问题及有关不高于省一级干部人事调动问题……”,即从1920年开始,斯大林实际上得以任意指派他的心腹去担任州委书记而不受政治局其他委员的干涉。1921年1月23日列宁说:“我们既不放弃委派制,也不放弃独裁制。”

(《列宁全集》第二版,第40卷,第249页。)这个“独裁”是指共产党的独裁,并非个人独裁。当时人们小看了斯大林主宰人事大权与党中央机关这件事。集革命家、军事家、作家于一身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更不用说托洛茨基了,他们看不上这种掌管党中央各部委这样的“机关事务”,不愿多管这类“小事”。他们忙于准备演说,写小册子。其实,人事权是党和国家机关和整个党国运行的机枢中心。不谙权术的托洛茨基当时他还热衷于研究文学,过了许多年后才总结出:“从潜在力量上看,他(斯大林1919年之后)成了政治局,也就是党和国家的最强有力的统治机构中的最强有力的委员。”(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485页。)而热衷于权力的、自认为是列宁的接班人的季诺维也夫首先清醒,马上试图改变,他提议托洛茨基与他自己进入书记处,但为时已晚,斯大林羽毛已丰。1919年书记处的工作人员只有30名,1920年达到150名,1921年增加到600人,还不包括警卫、通讯人员、勤杂人员。下属的机关有组织分配部、宣传鼓动部、新闻出版部、妇女工作部、农村工作部、情报部、特别处、斯大林秘书处……书记处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实权机构了。按照党章规定,书记处从属于政治局、组织局,而这三者又都是由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也就是受制于党代表大会。但是,党代表大会、政治局、组织局,开会时成员们来,散会后又回到了各自的单位中去,只有书记处是实实在在无时不在的存在。政治局的议程、决议草案、以至处理方法,事先已在书记处的有关部委和书记处讨论、草拟了。因此名誉上书记处服从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组织局,实际上实权在书记处及其之上的总书记。斯大林运用庞大的书记处下属机构,利用任命、提名、审批权,选拔出有利于自己的地方党组织,在此基础上再选拔出容易听命自己的党代表大会的代表,进而取得中央委员会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大多数。“任命制”,作用神奇巨大,它是制造唯上是从的绝妙机器。形成层层依附群与强大的利益集群,他们绝对不会惟民是从,而是看提拔者之眼色行事,尽讨好、逢迎、吹捧之能事。环环相扣、相互依靠、互相利用、造神造假、神通广大。俄共十二、十三大的代表产生,都是在没有差额的情况下选出的,即根据省委书记的推荐选出

的,而省委书记又是根据书记处推荐选出来的,实际上是任命制。斯大林就是在十三次代表大会上,联合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否定列宁关于调离斯大林总书记职务的提议,击败托洛茨基,免去他的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此为第一步,1925年俄共十四次代表大会斯大林联合布哈林、李可夫又战胜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并通过亲信伏罗希洛夫,有效地控制了军队与保安机关,此为第二步。1927年俄共党的十五大,斯大林不费吹灰之力,打败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的联合反对派,逼使他们自啐自弃,尽力向自己脸上抹黑抹屎,也想方设法给斯大林脸上贴金贴银,承认他的正确、英明、伟大。此为第三步。最后则在1937至1940年把他们以及那些可能反对自己的潜在“敌人”统统送上断头台,一概斩草除根。它的起因在1932年至1933年,斯大林搞的农业集体化,700万人死于非命,因而1934年在俄共十七大选举中,斯大林得票最少,一些老布尔什维克代表纷纷议论列宁生前建议将斯大林调离总书记职位的建议,所以有300多人没有投斯大林的票,如果实行差额选举,斯大林连中央委员也选不上。斯大林与卡冈诺维奇合谋,隐瞒了300张选票。当时斯大林虽然不便发作,过了不到两年,十七大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中的98人和1966名党代表中的1108人被枪毙,或者关进了集中营。连潜在的“敌人”也加以消灭。被驱逐出境的托洛茨基,也派人暗杀了。被处决的3.5万名红军指挥员中不少是托洛茨基的故旧。到了此时,政治局取代中央全会、书记处取代政治局、总书记斯大林取代书记处,成了权力中心之中心。斯大林成了高居于党、国家、军队之上的神,不受监督,不能批评与议论。其权威是任何专制沙皇的权威也难以想像的。(《马列研究》1998年,第三期,第137页。)用毛泽东的话说:“其黑暗不下于历史上任何最专制暴虐的统治”。

#### 四、“令人气愤地背弃民主主义”

列宁之前与列宁之后,迄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放弃委任制,但这委任制必须是有前提有制约的,并且必定是依法的,而其总的委任者必须是经过普选选出、负责的、有任期的、能随时撤换的。

如果不是建立在普选基础上的,受到种种限制的委任制,那就是中国古代的郡县制,就成了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再说列宁早期设想的委任制、独裁制,仅仅是权宜之计,并非基本国策,绝不等同于斯大林的委任制、独裁制。在战火纷飞的1919年3月的八大,通过了党纲,其中有一段:“苏维埃国家要实现广泛的、无处可与之比拟的地方和区域自治,没有任何一个政权机关是由上级任命的”(《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一分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32页。)  
“苏维埃政权保证工农群众有更大的可能用最容易最方便的方式来选举和召回代表”。(《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一分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33页。)这些虽然当时还无法兑现,但它的诚恳、真实的初衷是不容怀疑的。俄共十大更明确了“排斥一切委任制度”。可惜的是在列宁时期,它只能是一纸空文。而

斯大林则将列宁时期的这一权宜之计固定化、恒久化、基本国策化。其变味也就势所必然了。如果说1918年1月5日解散立宪会议,党外民主宣告结束,那么联共(布)党的党内民主在俄共十七大之前,也就已经彻底宣告寿终正寝了。早在1918年10月革命刚完成夺取政权的时候,卢森堡就向列宁及其党人敲响了警钟:“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合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动因素。”这使人想起陈独秀所说的:“是独裁制产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有了斯大林才产生独裁制。”这话,对不对?值得认真思考。

(本文作者系中共厦门市委党校教授)

(责任编辑 杨继绳)

## 欢迎订阅 2008 年度《公检法办案指南》 欢迎订阅《刑法罪名适用指南》

《公检法办案指南》:由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和公安部法制局联合编辑的首套办案指导丛书、首套法律教学参考书。

该书2000年创刊,由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具有权威性、全面性、实用性、指导性和及时性等特点,每月1辑、全年12辑。

2000年—2005年每年定价120元,2006年—2008年每年定价144元。

《刑法罪名适用指南》:该丛书总计22册,是“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收录了建国以来现行有效的刑事法律300余个,行政法规

及法规性文件300余个,司法解释200余个,部门规章200余个,规划性文件500余个,判例400余个,裁判文书200余个。涉及刑事办案工作的方方面面。本书层次清晰、论证科学、查找方便,对于解决刑法罪名适用过程中涉及到的一系列热点、疑点和难点,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丛书是中国第一部刑事办案大型实务工具书,是公、检、法、司、律师刑事办案必备工具书,同时也是公安政法院校重要教学参考书。以其权威性、针对性、全面性和实用性在国内刑事法律图书出版领域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重大的指导意义。 定价:1950元 邮挂费:200元

### 其他图书:

《公安机关“三考”基本法律知识考试试题集》

定价:39元

邮挂费:4元/册

《人民警察常用法规选编》(2007年修订)

定价:111元

邮挂费:10元/册

《公安机关执法须知》(2007)

定价:48元

邮挂费:5元/册

《治安管理处罚法释义与实务指南》

定价:46元

邮挂费:5元/册

欲购以上图书请汇款至:

### 一、银行汇款:

开户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公安大学支行  
户名: 于秀芳 卡号: 6222020200011497654

### 二、邮局汇款: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路6号芳馨园西座706  
收款人: 于秀芳 邮政编码: 100028

### 三、邮政卡汇款:

北京市西区木樨地邮电支局

户名: 于秀芳 卡号: 6221881000041371824

订购电话: 010—86309189 87092868

手机: 13691390866

联系人: 于秀芳 电子邮箱: whyin686@sina.com

# 裴多菲俱乐部真相

侯凤菁

中国有不少人将裴多菲俱乐部误认为是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罪魁祸首”。实际上，那个事件是匈牙利社会矛盾长期积累爆发的结果，而裴多菲俱乐部只不过是个很普通的学术团体，其领导成员都是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根本没有能力发动和组织那样一次全国性的行动。不过，历史也让它在那个事件发生前的特定时期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 匈牙利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

苏联军队在1945年解放了匈牙利，长期在苏联流亡的拉科西·马加什等人回国领导匈牙利共产党。在此后几年由各政党联合执政的人民民主时期，国家政治生活比较民主，战争创伤迅速恢复。1947年斯大林改变了政治主张，要求东欧各国共产党尽快将国内其他政党排挤出联合政府，加速共产党一党执政的进程。匈共1948年取缔了其他政党，本身与社会民主党左翼合并建立了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独掌政权。拉科西·马加什取得了党和政府的最高领导权，“拉科西主义”在很短时间内形成并得以发展。

所谓“拉科西主义”，其实就是“斯大林主义”在匈牙利的翻版。其本质是在奉行个人迷信的条件下强行“全盘苏化”。它在政治上破坏民主与法制，将阶级斗争扩大化；在经济建设上不顾本国具体条件，机械地效仿苏联；在思想和文化上实行专制。“拉科西主义”的主要具体表现如下：

一、大搞个人迷信，独断专行；宗派主义严重，残害干部与群众。

拉科西这个具有丰富斗争经验和曾在反革命的法庭及监狱里大义凛然的共产党人，在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榜样面前失去理智。他被吹捧为

“英明领袖”、“匈牙利伟大的儿子”、“人民的领袖”、“杰出的思想家”和“斯大林最好的学生”等等。党和政府的文件、新闻媒体及文艺作品对他的歌颂达到肉麻的程度。这从为他歌功颂德的两句诗中可见其一斑：“风儿停止了喧哗，好让人们听清拉科西的讲话”；“最好的父亲拉科西，劳动人民热爱你”。

在那个时代，拉科西的指示在匈牙利就是圣旨。他伙同格罗·雷瓦伊和法尔卡什结成“四人团伙”，主宰着党内外一切事务的决定权，党的政治局、书记处形同虚设。后来拉科西还兼任总理，政府工作也在他的掌控之中。

“四人团伙”在清除了社会上的“阶级敌人”和制造了一系列冤案清洗了前其他政党的领导人之后，根据莫斯科的指示又把斗争矛头转向党内。他们首先清洗战时在国内坚持地下斗争的共产党领导人，捏造各种罪名把他们投入监狱。著名的“拉伊克案”就是这样的代表作。

拉伊克·拉斯洛曾是战时在匈牙利坚持斗争的地下共产党总书记，解放后曾任政府内务部长、外交部长等职，在民众中颇有威望。拉科西为消除对自己地位的威胁，1949年选中拉伊克作为打击对象，以提高全党的“警惕性”。拉伊克及其他几个“同案犯”在狱中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只能出庭承认被指控的罪行。据史料记载：“拉伊克站在扩音器前，脸色苍白，毫无表情，嘴里不停地念着捏造出来的口供：他是美国的代理人，也是为旧警察工作的告密者和‘南斯拉夫法西斯分子’的走狗；他准备搞政变，要谋杀共产党领导人。”其实早在1938年苏联就有过同样的场面，布哈林在法庭上也是这样“承认”自己是帝国主义的间谍。

审判的结果是拉伊克以“间谍”、“铁托代理



听众在裴多菲俱乐部研讨会上即席发言

人”和“托派”罪名被处死。斯大林的私人代表、苏联秘密警察头目费多尔·别尔金中将直接参与制造此案。拉伊克的妻子拉伊克·尤丽奥在这次审判中也被判处徒刑，直到1956年才获释。“拉伊克案”结束后不久，卡达尔·亚诺什等一批党的领导干部相继被捕，军队中一大批将领和中级军官也未幸免于难。

拉科西一伙还大肆制造群众性恐怖。当时告密风盛行，窃听成为掌握群众思想动向的重要手段。许多有不同政治见解的人被关进“古拉格群岛”式的“拘留营”强制劳改。一些“阶级异己分子”被强行举家搬迁到荒凉的霍尔多巴吉草原去居住。首都的“不可靠分子”被赶往外地，往往只是因为他们有国外社会关系。在农村，富农是主要打击对象，共有7万户人家被列入“富农名单”，处处受到歧视，然而其中至少有2.2万户人早已失去土地。警察和地方干部对不肯入社的农民随意殴打。对一般群众进行惩罚的最常见的形式是罚款，1950—1953年夏天，法院共审理了65

万起案件，对其中38.7万人课以罚款。1953年6月之前，在这个共有950万人口的国家，竟有150万人受到过起诉。

二、急于实行工业化和追求高指标。

按照斯大林“没有重工业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思想以及即将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预想，匈牙利从1948年起加快了工业化的速度，提出在5年内将这个农业—工业国发展为工业—农业国，进而将匈变为“钢铁国家”。于是，正在执行的三年恢复计划成了雄心勃勃的工业化的开端。1950年开始执行的一五计划指标在1951年2月平均提高了一倍。原定工业增长86.4%，改为增长200%；重工业生产从原定增长104%提高到增长280%；采矿业从原定增长55.2%提高到增长142%；冶金业从原定增长15%提高到增长162%。为了实现这些计划，生产中不顾产品质量，只追求数量达标。这种高速工业化的项目

还往往匆忙上马，普遍缺少必要的准备，其结果可想而知。

三、投资过度。

原定一五计划的总投资为280亿福林，1949年春天追加到350亿福林，同年底追加到510亿福林，1950年又追加到600亿福林。在工业投资中，90%的资金用于发展重工业，用于发展采矿业和冶金业的资金占工业总投资的2/3。用于轻工业和农业的投资则少得可怜，影响了食品和日用消费品的生产，造成市场供应紧张。与此同时，由于冷战加剧，军费开支大大膨胀，国防费用达到民用投资费用的一半以上。

四、急于改变生产关系。

从1948年起，国家对所有100人以上的工厂实行国有化，国营企业职工在工业部门所占比重很快达到83%以上。1949年12月又颁布国有化法律，对10人以上的企业也实行国有化。对小手工业进行的改造使小手工业工人的人数由1948年的18.7万减少到1950年的2.9万。在农

业上则急于实行集体化，确定在3—4年内完成这一任务。由于缺乏物质、社会和思想准备，只能依靠行政命令和暴力强迫农民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到1953年全国10%的耕地荒芜，农产品的市场供应量减少20%。

#### 五、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1948年秋到1951年初，由于投资不断增加，使国民经济的资金积累比重达到35%这一世界罕见水平，而匈牙利在战前1919—1939年经济平稳发展时期，最好年景的积累比重只有8%。这样，国民收入的大部分资金被国家积累所吸吮，人民生活状况不断恶化。一五计划规定居民生活水平提高50%，但到1953年工人和职员的人均实际工资反而降低20%以上，农民1952年的实际收入不足1949年的2/3。到1953年，居民的消费总额已由原来占国民收入75—80%下降到只占58%。

城市居民居住条件恶劣。1941年停止的民居建设解放后一直没有恢复，许多工人、职员家庭蜗居于斗室，有的甚至住在简易的棚户房。在这福利条件很差的情况下，工厂、企业还大力开展“斯达汉诺夫运动”，任意提高劳动者的生产定额，使劳动者的利益受到损害。

#### 六、在意识形态上严加控制。

拉科西一伙除严格控制新闻报道、文学创作和文艺节目外，还经常对不同于官方立场的学术观点展开批判，思想界长期处于压抑状态。为了加强“匈苏友谊”，当局进行许多不真实的宣传。例如，小学生们在学校里被告之，从蒸汽机到电灯泡和电话都是俄国人发明的。为了“全盘苏化”，当时匈牙利连国徽都改为苏式图案、取消了国庆节、军服采用苏联式样，大大刺痛了人民的自尊心。这样的思想禁锢、虚假宣传和崇苏媚外，是具有浓厚民族意识、求实精神和争取自由传统的匈牙利人所难以忍受的。

拉科西等人就是这样追随莫斯科，把一种陌生的斯大林主义制度强加在本民族头上。到1953年斯大林死后，“拉科西主义”已使匈牙利全国民怨沸腾，社会危机不断加深。在首都布达佩斯和外地的一些工厂、农村，反抗事件频频发生：工人企图罢工、农民抵制交售农产品。这时东欧其他国家也局势不稳，在东柏林、布拉格和比

尔森都出了麻烦。为了稳住匈牙利的政局，马林科夫、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在1953年6月亲自出马，撤销了拉科西的政府总理职务，只保留他作为党的首脑的职务，同时将具有改革思想的纳吉·伊姆雷扶上总理的宝座，要求他尽快恢复国民经济和消除社会危机。

纳吉上台后大力推行称之为“新阶段”的经济、政治改革，使“拉科西主义”受到严重打击。改革很快取得了一定成果，受到全国人民的普遍拥护。然而，拉科西等人不甘心自己的权势被削弱，抓住改革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向莫斯科告状。由于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出于领导集团内部权力斗争的需要，苏联领导人这时又转向支持拉科西。纳吉虽然得到匈党多数中央委员的支持，但在政治局势孤力单，1955年3月被迫辞去政府总理的职务。此后，由于他坚决拒绝做自我批评，先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后又被开除党籍。此后，“拉科西主义”又得以复活。

然而，这时的纳吉并非孤立无援。他的周围集结了一大批支持者。他们主要是党内一些作家、记者、科学家、艺术家、社会科学工作者等知识分子。其共同特点是都具有道德勇气，对“拉科西主义”不满和赞同纳吉追求的“有人性的社会主义”。他们大多是老共产党员，几乎都进过纳粹的监狱或曾被关进死亡集中营，也有些人是刚从拉科西的监狱释放出来的。这批党内知识分子把自己的命运同纳吉联系在一起，决心挽救“新阶段”改革。至于普通百姓，他们虽然不懂那么多深奥的道理，但对纳吉与拉科西之间的政策差别全都心知肚明。

## 苏共二十大加剧匈党分裂

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大”，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揭露斯大林生前种种错误和罪行。这次大会以后，苏联反对个人迷信、“左倾极端主义”、“宗派主义”、“斯大林主义影响”的火力越来越猛，直接催化了波兰、匈牙利事件的发生。

赫鲁晓夫的这个报告不仅对苏联国内，对全世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国外受它冲击最大的要属东欧各国，因为斯大林的错误在这些国家都不同程度地重复过。特别是匈牙利被推到了非斯

大林化的前沿,因为过去在“全盘苏化”和迫害无辜共产党人方面拉科西都冲在东欧其他国家的前头。拉科西的处境很艰难,因为他既要完成莫斯科交给的贯彻苏共“二十大”决议的任务,又要保全自己的威信和地位。苏联领导人也想保住拉科西。因此,匈牙利在贯彻苏共“二十大”决议方面一直迈不开步子。人们看到拉科西一伙不愿纠正过去的错误,仍想把国家固定在原来的轨道上,使反对派的阵营更加扩大。

当时反对拉科西的党内反对派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团结在纳吉周围的那些怒气冲冲的党内知识分子。他们不仅公开揭露“拉科西主义”的罪行,还曾打算向莫斯科甚至向联合国告状。另一部分人是以卡达尔·亚诺什、卡拉伊·久洛和麦泽·伊姆雷为代表的党的领导干部。他们也坚决反对拉科西的政策,但主张通过党内斗争解决问题,反对把矛盾闹到街上去,被称之为“民主反对派”。苏共“二十大”一方面坚定了反对拉科西的人的信念,另一方面也动摇了那些曾经顽强捍卫“拉科西主义”的人的意志,进一步加剧了匈党内的分裂,对拉科西政权形成巨大的威胁。这时,匈牙利已形成全国性的“民族对抗”。“对抗”的一方是党内反对派和奋起响应的广大人民群众,另一方是以拉科西为代表的匈牙利领导集团。

反对派阵营在日益壮大之时,极需要有一个可供他们公开发表政见和揭露拉科西一伙的错误与罪行的讲坛。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裴多菲俱乐部应运而生,登上了历史舞台。

## 裴多菲俱乐部的活动

裴多菲俱乐部原是一个知识分子学习小组,成立于1954年底,归属相当于共青团的劳动青年联盟领导。它的前身是解放前地下共产党控制的一个从事资助工农子弟上大学的慈善团体。将其改建成裴多菲俱乐部的原本目的是想在现行制度允许的范围内为党内年轻的知识分子提供一个讨论问题的讲坛。这个团体日常既研讨青年联盟的工作,也讨论一些社会所关心的问题。它只有一间办公室,设在劳动青年联盟中央。

党内反对派为推翻拉科西的统治而进行的

斗争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裴多菲俱乐部的活动成为在社会上进行舆论动员的有效手段。

从1956年3月中旬开始,裴多菲俱乐部活跃起来。劳动青年联盟中央甚至做出决议,要求扩大裴多菲俱乐部的活动和在外地也建立这样的俱乐部。在这以后的日子里,裴多菲俱乐部先后举办了一系列大型研讨会,讨论经济、哲学、历史、新闻等专题。参加这些研讨会的有全国知名的经济学家、作家、历史学家、教育工作者、科学家、哲学家等学者和社会名流,也有年轻的知识分子甚至还有人民军军官。很多解放前参加过党的地下斗争和抵抗运动的老战士也到会倾听和发言。

这些讨论会的会场总是挤满听众。座位不够,他们就站在走道、窗外或干脆在主席台上席地而坐。应该特别指出的是,裴多菲俱乐部的领导成员绝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全都主持和参加过这些研讨会。这不仅说明裴多菲俱乐部并非乌合之众,从中也反映出当时党分裂的严重程度。

5月以后,裴多菲俱乐部的活动更加活跃,发言者在研讨会上提出的问题越来越尖锐,情绪也越来越激动。

5月9日,裴多菲俱乐部举行研讨会讨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些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和匈牙利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导原则。许多人就这些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在会上发言。由于要求发言的人太多,研讨会不得不在5月20日再次举行,重点讨论在国民经济生产中如何正确利用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

在5月20日研讨会上做重点发言的都是一些在青年知识分子心目中享有威望、熟悉经济工作和有改革思想的党内代表人物。他们是国家计划局的司长萨波·道马什、著名经济学家纳吉·道马什和刚被恢复名誉的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多纳特·费伦茨等。做自由发言的无一例外都是党员,其中一些人解放前就已加入地下共产党。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认为社会主义经过认真改革,仍有振兴的希望。

在上述两次关于经济工作的研讨会上,与会者对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制订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们认为这个计划的制订缺乏民主,其指标不切实际和无法完成。他们指出拉科西一伙片面发展

工业造成的许多恶果，并要求当局不加掩饰地如实公布经济统计资料 and 改变现有的工资政策、福利制度等。

5月30日晚和6月1日晚，裴多菲俱乐部连续举办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研讨会。与会者严厉批判当局编写历史的教条主义做法和官方的历史观，同时谴责斯大林主义伪造历史的行为。他们指出，现政权不是把历史当作一门科学对待，而是将其变为政治宣传的工具及“实现政治目标的辩护词”。有些人在会上提出，匈牙利闻名于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卢卡契·捷尔吉1928年起草的所谓“勃鲁姆提纲”是正确的。卢卡契当年为匈牙利共产党起草的这个文件指出，匈牙利的迫切任务不是要搞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实行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卢卡契因这个观点与匈共的正统观念相背离而多年受到压制。发言者们认为，卢卡契当年的观点已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

会上还有人提出1948年是匈牙利历史的一次错误的转折，因为国家从此抛弃了民主社会主义而建立了“独裁制度”。

匈解放后的党史编写工作和学校的历史教学工作受到批评。也有些人就自己过去的历史著作的观点进行了检讨，表示从此将在新思想的指导下从事历史研究工作。

时任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科学和文化部长的安迪寄·伊丽莎白作为对立面在会上也发了言。匈牙利的历史学是她的管制领地，因此，她在发言中极力为党在历史学领域的工作辩护。

会后有报道说，在这次研讨会上，匈牙利历史学家们内心燃烧多年的要求民主与公开性的烈火“喷发”了出来。

6月14日晚研讨会的题目是《苏共二十大和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有1200多人参加。由于会场实在容纳不下如此众多的听众，会议不得不临时改换到经济大学的礼堂去举行。

71岁的卢卡契·捷尔吉也出席了这次研讨会，因而引起极大轰动。这是他多年来首次在公



匈牙利著名共产党员、作家戴里·蒂博尔在裴多菲俱乐部研讨会演讲

开场合露面。这位参加过1919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斗争的老共产党员因与斯大林主义的哲学观点相对立，被视作“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老牌修正主义分子”。他1949—1950年受到系统地批判后被逼迫进行检查，从此在哲学研究上无所作为。在这次研讨会上，卢卡契与中央党校教员鲍洛格·埃莱梅尔和哲学家塞盖蒂·约瑟夫一起先后做了重点发言，他们的观点受到听众广泛的赞同。从而，匈牙利哲学界的状况明显地展现出来：在这个学术领域存在的两个学派中，卢卡契派将哲学研究当作思想创造，将目光聚集在哲学的根本问题上；而教条主义派则将哲学混同于日常的宣传、鼓动工作，将哲学庸俗化。许多人在会上诚恳地表示将改变自己以往对待哲学的教条主义态度。会议参加者还强烈要求为卢卡契“彻底平反”和为所有受到迫害的无辜者平反，从而在会场上激起一片经久不息的掌声。

这个关于哲学的研讨会也触及到文学界的状况和作家们受压抑的境遇。与会者尖锐地指出，1948年以后，匈牙利的文化界专门对有进取精神的打棍子，对无所作为的则温情脉脉。

裴多菲俱乐部 6 月 27 日在人民军官俱乐部举行的那场研讨会会使它的影响达到最高潮。这天是 1953 年纳吉据以进行改革的“六月政策”确立 3 周年。那天晚上研讨会的题目是《新闻和报纸问题》，听众从下午开始就在会场外的街道上聚集。这次会议通宵达旦地进行，从下午 6 点半开始一直持续到次日早晨 4 点，共有 6000 多人参加。刚被释放出狱的拉伊克的夫人拉伊克·尤丽奥在会上要求为她的丈夫恢复名誉。她披露了自己在 6 年监狱生活中受到的非人待遇和拉伊克被处死前所遭受的骇人听闻的摧残。身为《匈牙利民族报》主编、优秀国际法学家的洛松齐·盖佐最后发言。这位戴着眼镜、别具学者风范的老共产党人面请公众谅解他过去犯的过错，然后讲述了所谓“纳吉事件”的真实经过。他说：“就在我们大谈党的民主、言论自由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时候，纳吉·伊姆雷却根本无权为对他的指控进行辩护。”听到纳吉的名字，听众自动起立又喊又唱，要求纳吉回到党内和政府中来，同时要求解除拉科西的职务。

裴多菲俱乐部这个时期举行的这些活动的影响远远超出在场听众的范围。听众将他们耳闻的事情向工作单位的同事和外地的亲友们广为传播，从而产生了连锁反应。甚至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几个奉命每次去会场监视裴多菲俱乐部研讨会的秘密警察有一天向上级表示，他们已无法再去执行任务，因为他们自己也赞同发言者们的见解。

首都以外的各大城市也纷纷效法裴多菲俱乐部，建立了类似的论坛，劳动青年联盟中央委员会还号召青年们参与这样的活动。在纳吉的故乡考波什瓦尔，春天就组织了以匈牙利历史上抗击外来侵略的军事家兹里尼命名的俱乐部；索姆鲍特海伊市组织了沃什瓦尔俱乐部；维斯普雷姆市成立了鲍特沙尼俱乐部；德布勒森市有科苏特俱乐部。南部的佩奇市行动较晚，但后来也成立了当地的裴多菲俱乐部。这样，首都和外地的这些俱乐部的活动促进了反对派力量的迅速壮大，反对“拉科西主义”的活动虽然还没走上街头，但已扩展到党外。苏共领导人米高扬这个时期到匈牙利考察政治局势后写给苏共中央的报告说：“政权日益从同志们的手中丢失，敌对分子的平

行中心正在形成……”拉科西也忧心忡忡地说：“我感到自己像坐在一只随时可能爆炸的火药桶上”。

就在裴多菲俱乐部 6 月 27 日最后举行的那次讨论会结束几个小时之后，波兰发生了波兹南事件，采盖尔斯基工厂的 1 万多工人罢工，走上街头举行示威游行。这使裴多菲俱乐部 6 月 27 日研讨会的性质显得更加严重。时任苏联驻匈牙利大使、后来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安德罗波夫事后在向莫斯科递交的外交报告说，裴多菲俱乐部的这些研讨会从本质上看已演变成对党的领导的示威，超出政权的容忍限度。他认为匈牙利这个时期的局势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发生的事情在性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帝国主义向社会主义进攻的一部分。

6 月 30 日，拉科西召开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会议，谴责裴多菲俱乐部的活动“反党、反人民民主制度”，并且断定是“主要由纳吉·伊姆雷周围所形成的集团所指挥的”。7 月 1 日，内务部下令禁止裴多菲俱乐部继续活动。这样，裴多菲俱乐部的活动便告一段落，直到 9 月在新的形势下才又恢复。届时，全国的政治危机已一触即发，以“拉科西主义”为特征的那个时代已经躺在墓穴中。不久后的 10 月 23 日便发生了匈牙利事件，布达佩斯的数十万群众举行示威游行反对拉科西政策并很快发展为武装暴动，最后被苏联出兵镇压下去。

总的来看，裴多菲俱乐部虽然不是 1956 年匈牙利事件的组织者，但对这个事件的发生起到了舆论动员的作用，就如同匈牙利 1848 年革命之前科苏特主办《佩斯新闻报》发动群众一样。它通过举办各种研讨会向民众指出社会面临的危机，使人们有机会公开表达不满和提出民主要求，从而匈牙利党内的反对派与广大民众汇合到一起，猛烈地冲击了拉科西政权的基础。与此同时，那些主张对社会进行实质性改革的人还全面阐述了他们的理念与设想，为国家勾画了社会主义改革的蓝图，鼓舞人们努力去争取实现它。

发挥了历史作用的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就这样留在世人的心目中。

（作者系新华社驻匈牙利原首席记者）

（责任编辑 杨继绳）

# 读 者 来 信 摘 登

## 关于“人定胜天”、“自作孽，不可逭”及其他

《报刊文摘》今年2月25日转载《炎黄春秋》第2期杨慎的文章：《人是不能胜天的——任仲夷同志的一幅墨宝》，文中引用了任仲夷写给作者的一段话：

“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何乐之有？到头来还是其苦无穷。从根本上讲，人是不能胜天的。天——大自然，大宇宙，只能与之和平共处，与之适应，绝勿做违天之事。违天，即违背自然规律和客观规律，违天，是自孽，古语曰，人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我说的自做孽是指做违反客观规律之事，教训太多了。”

任仲夷这段话有精辟的见解，如说人要与大自然适应，勿做“违天”之事。但也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对“人定胜天”的理解、诠释有一定的片面性，二是引用古语错了两个关键性的字。现分述于后：

一、“人定胜天”一语出处甚多：《史记·伍子胥列传》：“人众者胜天”。《逸周书·文传》：“兵强胜人，人强胜天”。宋·刘过《龙洲集·襄阳歌》：“人定兮胜天，半壁久无胡日月。”金·刘祁《归潜志》：“人定亦能胜天”。清·梁启超《新罗马》六出：“小生每念物极必反，人定胜天”。毛泽东有“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与天斗”、“与地斗”实际上都是指大自然，“人”，可以理解为阻碍社会发展、压迫人民群众的统治者、阶级敌人。在“奋斗”中是十分艰苦的，甚至会遇到挫折和失败，但只要人们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坚忍不拔，一往无前，就可能取得胜利，享受苦尽甘来的欢乐。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是能胜天的。但它又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对它的

诠释要适度、准确，不能超越一定的极限。如人们抗拒各种自然灾害，由于树立了“人定胜天”的信念，领导有方，尊重规律，顽强拼搏，往往能战胜自然灾害，缩小和减轻灾害造成的损失。但有时面对百年不遇的灾害，虽经主观努力，却未能取得理想的成果，造成不小的损失。不能因此就否定“人定胜天”的精神。“人定胜天”，从个人角度说，还可以理解为：树立坚强的意志，克服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与坎坷的命运抗争，不屈于邪恶势力，争取条件转化，达到预期的目的。

任仲夷告诫人们不要做违反自然规律和客观规律的事，本意是好的，但如果说过了就会导致片面性和绝对化。如认为与天斗与地斗“何乐之有”，“到头来还是其苦无穷”，容易理解为曲解毛泽东的论述，对亿万战天斗地、征服自然的人民产生“泼冷水”的作用。对“人定胜天”讲过了、超过一定的极限，会产生负面影响；同样，批评“唯意志论”过了，断言“人是不能胜天的”，同样是片面的，也会产生负面影响。

### （二）关于任文引文的错误

“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语出《尚书·太甲中》，“孽”，邪恶、罪恶；“违”，抗拒；“逭”，逃避。意谓天（大自然）造成的罪恶和灾难，人们可以抗拒；但人为的罪恶就难以逃避其带来的惩罚。由于“逭”字比较冷僻，其发音 huàn 与“活” huó 近似，故往往容易误写为“不可活”。任文将“活”印成“治”，可能因为“活”与“治”字形相似造成的。《报刊文摘》转载时将“治”改为“活”也是不对的。任文还将“天作孽”错为“人作孽”，这一字之差就会产生歧义，与“自作孽，不可逭”相矛盾。

江苏读者 马国征

《炎黄春秋》2008年2月号刊登了题为《奥斯特洛夫斯基：“我们所建立的，与我们为之奋斗

的完全两样”一文,在读者多数是早年参加革命的老人)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在短短不到一个月当中,就有10多位读者主动对作者表示支持、赞同。其中,熟悉作者的朋友们、同事们通过电话、电邮,与作者交谈感想、感触、感动;素不相识的读者则寄信给作者致意。为了使更多人读到此文,他们有的将此文上网,有的将此文扫描后加以复印,送给没有订阅《炎黄春秋》的朋友。

新华社老记者戴煌说:读了此文深受感动。这是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彭迪写道:“你的文章写得很好,对大家很有启发。”冯东书说:这篇文章影响很大,写出了一代人的心声。

作者的老友熊永年(《人民日报》老编辑)写道:“你的文章写得很好,观点鲜明,内容深刻、亲切,文字简练。我完全支持你!”

一位与作者无甚交往的友人自成都来信说:此文使我感到激动和敬佩。特别是文章最后一段“写得何等的真诚、动人和勇敢!”他举出李慎之、韦君宜、胡绳和健在的李锐、胡绩伟等这些领军人物,说“坚持追求真理的人总是这么纯朴、无畏的,即使年老了,仍然是年轻的,只是更理性了。跟随者浩浩荡荡,正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之谓也。”

安徽大学原副校长的老伴给编辑部打电话说: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是靠理想活着的,想不到我们奋斗多年而造就的现实与我们的理想距离那么远。这篇文章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我们老俩口共140多岁,我们一边读这篇文章一边老泪纵横。

(本刊讯)

我是贵刊的忠实读者,我之所以爱读贵刊,是因为贵刊实话实说,敢于直言。作为一名从事编辑工作多年的老人,我钦佩贵刊有错必改,决不文过饰非的求是作风。贵刊虽办得好,但却偶有千虑之失,即使这样,仍然是大醇小疵,瑕不掩瑜。

2008年第2期《阎锡山的最后岁月》中说:阎锡山于1950年3月6日辞去“行政院院长”,“离职前,‘行政院’召开了一个小型茶话会,为阎锡山辞行。会后,有人将老子《庄子·取筮》里的两句话‘绝圣弃知,大盗乃止’送给阎锡山……”

(2008年第2期54页)

该文以上这段话有三处讹误,其一,阎锡山离任时,“行政院”举行的茶话会,不是为阎辞行,而是为他送行。辞行是指行者辞别亲友,送行则是送者送别行者。其二,《庄子》一书,系战国时庄周及其后学所著,并非春秋时老子李耳所著。其三,《庄子》中没有《取筮》篇,该文所引“绝圣弃知,大盗乃止”,系《庄子·胠箧》中语,而“绝圣弃知”,则系庄子引自《老子》十九章语,其“知”音义同智。

此外,该期《张申甫:“我是一个宁折不弯的人!”》中说:“他来欧洲时,陈独秀已经让他全权负责招收党员。”(2008年第2期37页)招收应改为吸收。因为,这里所指的是党组织接受其人成为自己的成员,不是用考试或其他方式接收学员或学徒等,所以应该用吸收,不应该用招收。

湖南读者 胡渐逵

官员申报私人财产是反腐倡廉的一个好办法,许多年前就提出过,为何不见行动。对此,街谈巷议,意见不一。

愚见以为,要制定法规,规定官员必须申报个人财产。制定这个法规,会有些困难,但比制定物权法和别的法律要简易得多。从官员个人来说,申报个人财产也很简单。之所以未能实行,是不为也非不能也。

反腐倡廉事关党风政风的重大建设,党员和领导干部把申报个人财产开展起来,是顺理成章的事。

我指望,绝不是奢望,尽快制定相关法规,早日实行官员如实申报个人财产,并形成风气。

北京读者 李志国

贵刊登了不少宝贵的史料性的资料,使大家了解了许多历史的真实。文化大革命中,北京很多机关有一段时间也抓“5·16反革命集团”,整死了人,整病了不少人,最后也没有听说抓出来多少“5·16”分子。当时,正式文件把萧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列入了后台。此事的真相如何?最后也没有给出一个说法。希望贵刊能刊登有关此事的文章,让大家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

北京一读者

# 炎黄春秋网

# 6月面世

**炎黄春秋**  
YIHUANCHUNQIU
**实事求是 秉笔直书 以史为鉴 与时俱进**

2008年1月5日星期六
首页 | 日期4种 | 在线订阅 | 广告服务 | 读者来信 | 联系我们 | 读者留言 | 读者来信 | 关于我们

---

**经典文章**

- 经济改革是怎样起来的
- 对外开放是怎样起来的
- 迟到的陈伯达小平
- 农业集体化理论是怎样失
- 民主社会主义旗帜与中国
- 究竟谁领导的几点看法
- 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
- 关于私有化的一点思考
- 对国际十月革命的回眸与
- 纪念一周年几点反思
- 邓小平面对学术的影响和
- 改革第三次争论、稳定性
- 邓小平的绝对领导改革
- 言论自由是民主的必需品
- 建国初期“三大改造”考

**炎黄公愤**

2008年第1期已出版  
《炎黄春秋》是纪念性历史月刊，对古今中外的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注重翔实的史料，秉笔直书，善人不留其美，恶人不留其恶……

**核心作者**

白自夫 白石  
魏大斌 魏耀  
方实 方实  
丁守和 杜正宇  
杜润生 杜光  
廖亦雄 冯东吉  
高稼祥 蔡国福  
高全 官伟康  
廖宇寅 关山  
魏寅 魏林福  
程方 何耀  
熊独立 熊秉真  
江平 李哲  
金凤 金耀  
程华 程耀  
程白 程耀  
李楠民 李一兵  
凌云 李哲  
李锐 李丹  
李庄 李耀之  
刘志琴 廖耀  
马智旋 狄远方  
彭勤 彭耀  
任仲英 蔡高祥  
熊高 苏双春  
熊大平 田纪云  
王海武 王德扬  
温清译 吴江  
吴耀 吴耀  
吴家 吴耀  
廖卓 廖耀  
辛子 廖耀  
薛寿德 徐孔  
徐庆全 徐光耀  
晋人 廖耀  
阎长贵 廖耀  
杨瑞民 廖耀

**本期目录**

2008年第1期  
新的一年 新的期待  
《炎黄春秋》是纪念性历史月刊，对古今中外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注重翔实的史料，秉笔直书，善人不留其美，恶人不留其恶。在期刊之中，具有独特特色。

**本期目录**

【特稿】  
经济改革是怎样起来的……田纪云

【纪实】  
感悼与陈独秀关于中国主义的争论……廖 耀  
专访：民主与所谓“新柏拉图主义”……廖 耀

【一家言】  
关于解严《论与民权主义形成的历史来源》……黄道奇  
从康党来论说……廖 耀

【人物志】  
李富堂上所在文革中……廖 耀  
迟来的历史……廖 耀

【往事】  
感悼胡风与胡风运动……廖 耀  
《光明日报》“关系拜偶像”报道始末……陈 英  
陈小平《墓碑》不列载百科全……廖 耀

【历史】  
在上海海派……廖 耀  
王五卓事件始末……廖 耀  
不速而至的那一天……廖 耀

【观察】  
长白山地区土匪运动纪实……白毅明/整理

【林人真】  
陈独秀与胡风……廖 耀  
陈独秀与王德扬……廖 耀  
胡风与他的七位老上级……廖 耀

【古语】  
元曲与国……王明贤

【编读】  
读者来信摘要（五期）……吴耀耀

**人物志**

- 非理性建国初期人物纪实
- 邓希为入不出的二三事
- 张志新被“社论”勒死

**一家言**

- 为什么个人敢当道？
-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民主
- 上海社保基金案让我们明白什么

**历史**

- 三进共青城
- 南京的三年自然灾难
- 在一比反共派的斗争中

**往事**

- 潘在大陆到韩那一年
- 我在文革中的三年
- 我的父亲与中共老左派

**古今谈**

- 高华和太皇太后关系
- 海峡两岸的拜佛拜都文化
- 王安石对陈独秀日记

**海外**

- 纽约发生的一比反共事件
- 新近过世的华人社会
- 欧美同学会在海外

**文章排行**

- 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
- 究竟谁领导的几点看法
- 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
- 经济改革是怎样起来的
- 改革第三次争论、稳定性
- 读一读迟到的陈伯达
- 迟到的陈伯达个人所有
- 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
- 马思聪与毛和平反社会
- 北京四国社会构成的社会
- 我在千人大会上写革命
- 文革前不写革命和政府的
- 北京四国社会构成的社会
- 1948年中国运动的头头
- 我在解放战争中的三年经历
- 中共时期的民主主义
- 三次反共运动国家主席

**栏目**

特稿 春秋堂 人物志  
家言 纪实 观察  
林人真 吴耀 魏耀  
文苑 文苑 文苑  
文苑 文苑 文苑  
古今谈 古语 徐孔  
海外 编读

**炎黄论坛**

论坛

- 当代社会与党的权力
- 欧洲共产主义的再认识
- 民主宪政的再认识
- 改革争论的核心与边缘
- 中国政治是科学吗
- 我的新不存的个人政治
- 对政治民主的再认识
- “国自自”是一生一死
- 西单民主运动由何而来
- 我的老死与一生如无人
- 究竟谁有多少秘密
- 政府与政府与政府
- 应当怎样看待时代的文

**自叙**

- 重新认识社会主义
- 20世纪30年代的苏俄
- 斯大林时代的社会主义
- 三年国殇时期的民主
- 青年时期的胡风与陈伯达
- 我的一生与“包产到户”
- 王安石对陈独秀的总结
- 任何人是陈伯达的同行者
- 陈伯达与《行政法》
- 怀念陈伯达
- 吴耀先生与春秋

**在线**

想对本栏目有什么评价？

[意见反馈](#) [联系我们](#)

**《炎黄春秋》创刊15周年** 精品典藏（第1-5期）  
再版隆重推出！

编委名单：白自夫、魏耀、方实、丁守和、杜润生、廖亦雄、高稼祥、高全、廖宇寅、魏寅、程方、熊独立、江平、金凤、程华、程白、李楠民、凌云、李锐、李庄、刘志琴、马智旋、彭勤、任仲英、熊高、熊大平、王海武、温清译、吴耀、吴家、廖卓、辛子、薛寿德、徐庆全、晋人、阎长贵、杨瑞民

2\_email: 2008qq@vip.sina.com

炎黄春秋网：关于炎黄春秋 | 招聘启事 | 帮助中心 | 广告服务 | 合作加盟 | 网站声明 | 联系我们  
第137号 000000年 | 炎黄春秋网 0004号

炎黄春秋网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 精彩栏目

首 期 页  
往 线 回 顾  
在 告 订 阅  
炎 黄 论 系  
炎 黄 图 坛  
读 者 留 书  
关 于 我 们 言  
我 们 稿 们

## 特别推出

核 心 作 者  
经 典 文 章

## 特别开办

刊 外 稿 区  
炎 黄 论 坛  
读 者 调 查

**炎黄春秋** YANHUANGCHUNQIU 2008年第**5**期

**“迎丰公社反革命事件”始末**

**李政道与江青的一次辩论**

**毛泽东号召“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

**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的大饥荒**

**我打谷志有**

**列宁时期党内民主是如何被破坏的**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定价: 5.80元